凤凰周刊文丛

222

個你不知道的歷史秘密

222 History Mysteries

微史記合集

凤凰周刊 编

《鳳凰周刊》授權浙江出版集團數字傳媒有限公司榮譽出品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凤凰周刊文丛

222
個你不知道的歷史秘密

222 History Mysteries

微史記合集

凤凰周刊 编

《鳳凰周刊》授權浙江出版集團數字傳媒有限公司榮譽出品

目录

序

第一章 名人还有这一面

第二章 教科书都是“骗人”的

第三章 差点以为是段子

第四章 爱科学还是“黑”科学

第五章 军事儿

第六章 文化圈不文化的事儿

版权信息

222个你不知道的历史秘密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

《凤凰周刊》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2015©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2015

本书版权为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所有。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在亚马逊平台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CFP-00110177-0138-151102

最后修订：2015年 11月07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5

序

《凤凰周刊》是一本关注历史文化的杂志，在历史档栏目下增添子栏目微史记，让严肃、沉重的历史变得轻松活泼。

它向您揭示名人不为人知的一面，教科书“欺骗隐瞒”的真相。历史其实充满了“奇趣”：都说段子来自生活，而有些历史比段子更“段子”；有的人说爱科学，可是做的事儿却更像是在“黑”科学；
本来是严肃的军事儿，听起来却一点也不正经；而文化圈里头，不“文化”的事儿也不少！

虽然看起来不正经，不过作者秉持专业精神，222个历史小故事绝对没有以讹传讹的内容、互相抄袭的段子，也没有众所周知的大路货内容，每一篇微史记短文都建立在广泛的阅读、精确的题材角度选取上。

第一章 名人还有这一面

韩复榘爱审案



军阀韩复渠主政山东时，有一个极大的爱好，那就是审案子。甚至不能说是爱好，简直是上瘾。有时候，省城的案子审完了，而他又恰好时间充裕，他就会下到各县去审，审完一个县，再到下一个县……

韩复榘审案有两大绝招。第一招是相面，嫌犯带上堂之后，韩大老爷并不开口，而是面色深沉地盯着嫌犯的脸，上下打量，从额头到下巴，从左耳到右耳，皆不放过。看完后，立即下令，要么拉出去杀了，要么立即释放。至于为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第二招是用刑，嫌犯上堂，先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刑伺候，如果此人一点大刑都受不了，立即招供，韩大老爷就会露出鄙夷的表情，示意左右拖出去毙了。如果此人是个硬骨头，任凭什么大刑，就是不招，韩复榘就会露出敬佩的表情，

命左右把人放了。

总之，韩复榘审案的原则就是：皆与法律无关，全凭心情而定。

最幸运的”家教“



1963年6月13日，尼克松与长女特里西娅于白宫合影。

特里西娅•尼克松，是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女儿。1959年的一天，她正在为翌日的犹太教考试而复习功课，仍然有许多问题无法理解。正巧，以色列国父、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来访问美国，他去时任副总统的尼克松家登门拜访。

就这样，本-古里安临时给特里西娅做家教。他讲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共同历史遗产，解答了为什么犹太教的安息日是星期六而非星期日、犹太教堂大烛架的含义等。特里西娅在第二天的考试中获得“优”，这段授课也成为难忘的时光。

陈独秀后代在动乱年月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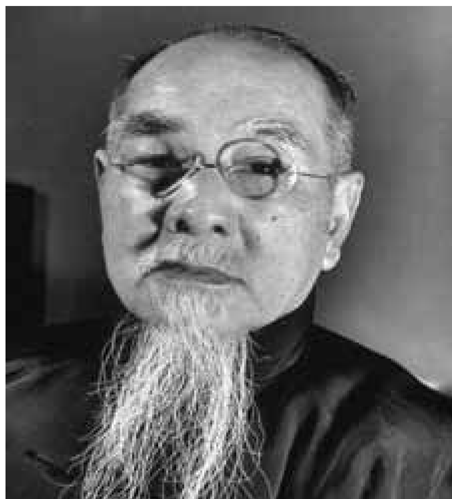


“你祖父是陈独秀，父亲在香港，如果党不开除你爷爷，你父亲现在可能至少是中央的一个部长，你陈祯祥想上哪个学校就上哪个学校。党开除了陈独秀，你现在只好上北京师范学院，因此你必然对党不满，对党怨恨！”“你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阶级根源、历史根源的”……

陈独秀的孙女、陈鹤年的长女陈祯祥，在反右时遭到围攻，被打成二类右派。她在文革时被批斗、关押、抄家，丈夫被打成“三家村”成员后自杀。二女陈祯荣在向红卫兵汇报思想时说“对祖父陈独秀也要一分为

二”，被打成反革命。三女陈祯庆，在买毛泽东像章时说了句“六角钱贵了些”，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幼子陈祯祺因出身原因，参加红卫兵不到两月被剥夺政治权利，后写血书去内蒙古插队，仍一直是专政对象，三次参加高考都是政审不合格被大学拒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全被落实政策平反。

”三不主席“林森



在民国历史上，有很多政治名人以“不”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著名的“六不总理”段祺瑞，讲究“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还有“四不将军”吴佩孚，终生坚持“不纳妾、不积金钱、不留洋、不走租界”。

而不为人熟知的，还有一位“三不主席”林森。林森为国民党元老，1868年生人，原名林天波，字长仁，号子超。同盟会成立时便是主要成员之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历任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职。1931年，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

林森做事低调，奉行“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的“三不原则”。27岁时原配郑氏夫人去世，发誓不再续弦，独身终生。收侄子林京为养子，可这位养子却在1937年太原会战撤退中被乱兵所害。1943年，林森因车祸去世，遗产仅有六万元，加上政府颁给特别费共50万元作为林森奖学金，但因战乱未能遂愿。

丘吉尔与甘地是冤家对头





丘吉尔与甘地这对冤家对头，只在1906年见过一面。丘吉尔说甘地：“他曾是一个妨害治安的律师。现在在东方作出苦行僧的样子，半裸着在总督府前游行，却出名了。”到1942年，甘地提出要英国“退出印度”的口号，在演讲时被当局逮捕。七天后，甘地的秘书因心脏病去世，引发外界猜测，印度爆发反英运动。这场运动使250个火车站被毁，500个邮电局受袭击，150个警察局被攻打。

1943年，狱中的甘地开始绝食，只喝盐水和橘子水。丘吉尔“赞同让甘地饿死”，并对其他内阁成员说，“我会把他关在那里，让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你们因为他绝食而打算释放他，那么现在就放他好

了。”丘吉尔盼着甘地赶紧死，先后两次询问下属：“那人到底死了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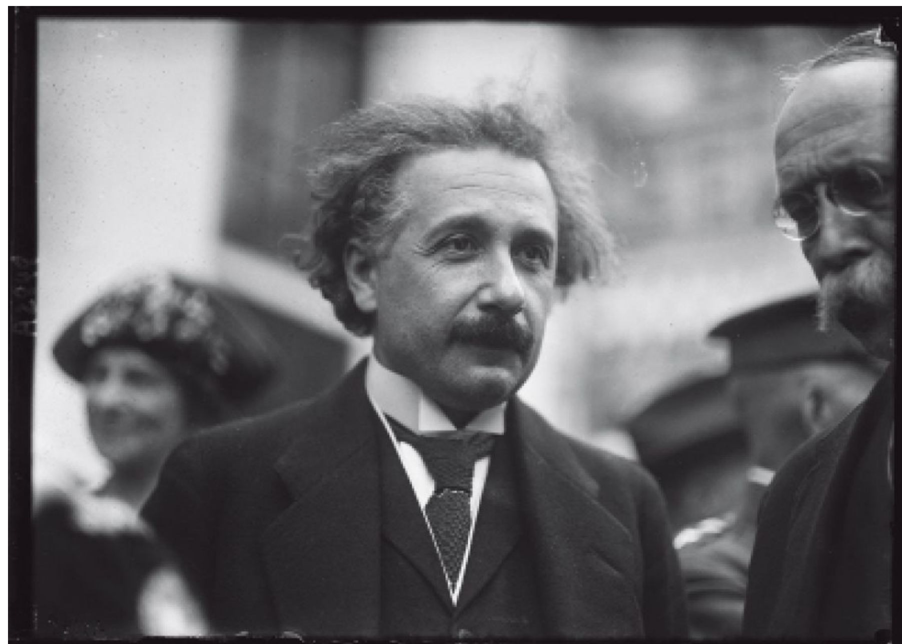
1944年4月，甘地健康情况恶化，丘吉尔不想在战争胜利到来时，让他死在狱中，只好将其释放。在甘地获释后两个月，丘吉尔还在追问：“他怎么就没死呢？”

杜聿明：我现在最听毛主席话了

1960年，沈醉被特赦后，与杜聿明、宋希濂等老朋友相见。沈醉把杜聿明拉到一个屋里，悄悄问：“你特赦时，有没有人问过你投不投降的问题？”杜聿明听后一笑，拍着沈醉的后背说：“我相信也没有人问过你。”他一边说着，一边指着自己的脑袋，后又指指沈醉的脑袋：“这里不老早投降了吗？”

不久，沈醉带着女儿沈美娟又去看望杜聿明。在“毛选”上读过《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的沈美娟，一见到杜聿明就说：“杜伯伯，你最不听毛主席的话了，他让你投降你不投降……”沈醉很尴尬，赶忙拦住女儿，让她不要再说了。谁知杜聿明哈哈大笑道：“这正是小孩子天真可爱的地方，想说什么便说什么，一点没有假。”说到这里，他转脸对着沈美娟说：“我过去的确是最不听毛主席的话了，可是现在我是最听毛主席的话了。”

爱因斯坦对钱没兴趣



1933年，爱因斯坦因反对纳粹，被迫离开德国，到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任职。他向研究院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要聘用他的助手迈耶尔；二是他的年薪只要3000美元。爱因斯坦还说："如果在普林斯顿维持一年生活，不需3000美元，工资还可以再低一些。"研究院的负责人弗莱克斯纳觉得这个要求太低了，费了很多唇舌，才说服爱因斯坦接受16000美元的年薪。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曾将一张1500美元的支票当书签用，后来丢了也不知道；有人请他做演讲，1分钟给1000美元，爱因斯坦说自己不需要钱。

到了1944年，有个美国人提出要买第一篇相对论的手稿，但那手稿早就被用来生炉子了。最后爱因斯坦一个字一个字地将论文重抄一遍，卖了650万美元。这笔钱被爱因斯坦全部捐给了反法西斯事业。

刘文辉为穿衣服犯难

1949年，"西康王"刘文辉率部起义，一度出任新政权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文革开始后，刘文辉即被抄家。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刘文辉也受邀参加。毛泽东身穿布料军装，见刘文辉依旧穿着"呢料子中山装"，对他说："要穿的和我们一样嘛。"刘文辉回到家，为难地对儿子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他们都是穿的军装，总该不会让我也穿军装吧？"刘文辉已脱离军队二十年，当然不敢穿军装。刘家人几经商量，决定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理解为"要穿和我们一样的布衣服，不要穿呢料衣服。"

刘文辉于是定制了一件灰色布料的中山装，以备参加活动时穿。后来天气变冷，毛泽东自己换上呢子军装，刘文辉才敢穿回以前的衣服。刘文辉的孙子刘世定下乡时，带走了这件布料中山装，一直穿到上世纪80年代。

杀人狂张献忠



张献忠生性暴烈，嗜杀成瘾。他杀人的花样也是令人目瞪口呆。为了杀掉大西国（今四川）内的读书人，他假装宣称要开科取士，等读书人齐聚西京（今成都）的青羊宫，张献忠却下令把他们全部杀掉，因为杀的读书人太多，导致“笔墨成丘冢”；大臣们上朝时，张献忠突然放出十几条大狗，让这些大狗从跪在地上的大臣们身边穿梭而过，谁要是被狗嗅了一下，就拖出去杀掉，名曰“天杀”。

张献忠不仅杀外人，对自己的家人也同样下得去手。大顺三年（1646年）七月，张献忠被迫放弃四川，北上陕西。离开成都前，张“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为什么连儿子都要杀掉呢？他对自己的心腹部将，亦是他的养子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

袁世凯的洋顾问



袁世凯有个美国宪法顾问，叫古德诺。古德诺教授当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长，在学术界地位极高。1915年7月，袁世凯请古氏就当时世界各国所采取的共和制与帝制的优劣写篇论文，供他参考。古氏用尽平生所学，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万字大文章。这本是个密件，仅供袁一人参阅。不曾想，此文很快被“帝制派”的杨度等人翻译成了中文，

名曰《共和与君主论》，并大肆宣扬文中的观点，所谓“君主制优于共和制”。从此，这篇文章成了“帝制派”的理论《圣经》。

事实上，古德诺这篇文章的真正观点是，“继承式的寡头制，优于非继承式的寡头制”。但被杨度等人别有用心地译为中文后，就变成支持帝制了。古德诺不甘心被利用，于8月17日召开记者会说明真相，并在《京报》英文版发表原文。但遗憾的是，当时“君主制优于共和制”的口号已经响彻全国了。

愚忠的国学大师



国学大师王国维是个旧派人物，他曾经担任过清朝逊帝溥仪的老师，官居五品“南书房行走”。后来，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王国维的“帝师”生涯也就结束了，从此赋闲在家，著书为业。1925年，在胡适的举荐下，清华校长曹云祥决定聘请王国维到清华的国学研究院执教。胡适受曹云祥所托，亲自将一封非正式的印刷体聘书转交给王，并将研究院的性质和教授程序作了一番讲解。王国维本来不想就聘，但胡

适用自己的小汽车载着他到清华园转了一圈后，他才有点动心，后又经吴宓亲自登门拜访，王终于决心就聘。

但王觉得，这事儿自己做不了主，应该先禀报溥仪，看“皇上”是否“恩准”。于是，王国维悄悄地跑到天津张园拜见了老领导溥仪，好在溥仪没反对，终于，王“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不久后举家搬进了清华园，正式就任国学研究院教授一职。

徐树铮对“五四学生”



“五四”运动中的学生手持“唤醒国民”等字样的标语。

1914年，北洋军皖系将领徐树铮在北京与人合办私立学校正志中学，效仿德国实行军事化教育，学生习德文。徐树铮希望该校为自己培养干部人才。五四运动兴起后，该校高班学生列队喊口号，与教官发生龃龉。徐树铮赶到学校说，大家站着又冷又累不如回宿舍睡觉，要同我交谈者可留下。学校翌日相安无事，留下交谈的高班生吐出原委，“我们说不过徐校长，怎么讲都是他有道理，的确他是有道理的。”

因此，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到处宣传正志中学的学生是冷血动物。至夏天，校方宣布学费和吃住全免费，学生还可领到津贴，于是外面的学生更加无法鼓动正志中学的学生。正志中学发展至今，成为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梁实秋谈吃狗



梁实秋说自己没吃过狗肉，也从来不想吃。说不想吃，是因为嫌狗恶心。抗战时期，他的房东一家养一只狗名为“汪子”，人吐的骨头、漏在地上的菜饭残渣，“汪子”都舔个一干二净，所以梁实秋觉得“像这样的狗，其肉岂足食乎”。

不过，一谈到西方人对中国人吃狗肉行为的指责，梁实秋还是愤而反驳道：“中国人祭宗庙，奉‘羹献’的时候，西方人尚在茹毛饮血。羹献即是犬牲。”为理顺逻辑，梁实秋解释说，“狗和人一样的可以分门别类”，《本草纲目》分狗为食犬、打猎的甲犬和守门的吠犬，后面两者不能吃，吃食犬则没什么大不了。

蒋介石在日记里骂人



1858年，八二三炮战时，准备弹药的国民党军士兵。

蒋介石脾气不好众所皆知，但实际上，他在人前一直在极力克制自己负面情绪的流露，到了写日记时方才将这些负面情绪一股脑发泄出来。

最让蒋介石在日记里恼火的是屡屡让他失望的美国，自然，美国也是他最需要控制个人情绪去面对的一个对象。如八二三炮战时，美国担心冲突扩大，不允许台湾对进攻的中共空军基地做报复性攻击。蒋介石向协防司令史慕德抱怨美国“残忍”、“太不平等”、“太不人道”，警告说这会让台湾军民“对美国增加无穷反感”。这些话被他记入日记，并自我评价道：“此乃极端情感不良之下，仍能以理智控制，并不现激昂之色，此或修养之效。”

的确，与这类外交辞令相比，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外国政要就“任性”多了。他管国共内战期间一直跟他作对的马歇尔叫“马下儿”，而“媚共”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被他称为“泥黑路”，赫鲁晓夫是“黑里雪夫”或“黑魔”，倾向“两个中国”的美国国务卿鲁斯克叫“鲁丑”，与中共建交的尼克松则为“尼丑”。

冯玉祥死亡之谜



1948年冯玉祥带全家从美国绕道苏联，回国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7月，苏联客轮“胜利”号抵达纽约，大陆出资为冯全家包下了头等舱的四套包间。400多名苏联登船人，多是准备回国念书的苏联驻美外交人员的子女。到埃及亚历山大港时，3000多名被埃及政府驱逐的苏联亚美尼亚人登船，他们在格鲁吉亚巴统下船。

离终点站敖德萨剩一天行程时，船上起火，电报室、医务室、驾驶

舱首先遭殃，冯玉祥被烟熏死。经调查，违规携带超过额定数量的电影胶片及胶片起火被认定为火灾原因，但破坏论的说法一直不断。起初中国大陆流传着两种说法：上船的亚美尼亚人里有美情报人员；国民党特务暗杀冯玉祥。冯夫人怕影响中苏关系，未向苏联提出详细调查、公布一切的要求。冯的后人在今日认为是斯大林欲清洗同船的4名苏共中央委员，他们最终3死、1重伤。不过解密的苏联档案中找不到破坏论的证据。

季羡林的比较地狱学



在撰文回忆“牛棚”生活时，季羡林打趣称自己“曾有志于研究比较地狱学”。

他的比较对象是《神曲》和中国的《玉历至宝钞》。一对比，他发

现西方地狱“实在有点太简单、太幼稚、太单调、太没有水平”，“一点想象力都没有……读了只能让人觉得好笑”；而印度的地狱则“真正是博大精深”，再加上“中国人的扩大与渲染”，“地狱简直如七宝楼台，令人目眩神驰”。

接着，他才点出他在“牛棚”里待过以后的认识：“‘革命小将’在东胜神州大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建造起来的牛棚，以及对牛棚的管理措施，还有在牛棚里制造的恐怖气氛……远远超过印度的原版。”

这一整套“比较地狱学”，或许是季羡林写文章的手法，但若真是他在“牛棚”之日的“研究”，那也算是别出心裁、独此一家的苦中作乐了吧。

吴佩孚的“耶稣”手书



清末民初，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在中国勃兴。这些宗教大多含有儒、道、释、耶、回五教归一的教义，将五大宗教的神或教主容纳在它们道教色彩浓郁的体系中。如中国红字会（本身也是一个五教归一教义的民间宗教）会长颜惠庆在自传中描述救世新教会的教堂活动：“在此教堂内，五大宗教膜拜神位一律平等。而事实上，道教的观念与法式最为浓重，突出的一点就是设置了沙盘扶乩。”

颜惠庆还提到，1934年，吴佩孚隐退在北京时，担任了救世新教会

的教统。于是乎，吴将军的客厅便滑稽地高悬着“耶稣”所赐手书中文匾额，“更有奇者，这神书之笔竟还在签名落款之后加上了‘学书’一类的谦辞。”

津巴布韦的社会主义纲领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自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以来，一直掌握该国政权。它的前身是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1987年底，并入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形成了现在的政党。

民族联盟在1964年通过的章程中规定，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泛非主义”的民主共和国，但要首先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73年，民族联盟重申，它“选定了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包括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因素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津巴布韦独立后，民族联盟宣称要“开始第二个革命，即社会经济革命”，要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措施”；但坚持不久，数年后，又声明要促进私人经济发展，争取吸引外资。

与人民联盟合并后，穆加贝做报告称，党的基本原则是建立“以马列主义原则为指导的，具有津巴布韦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剧变后，穆加贝又声明：“我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不讲马克思，犹如基督教不讲上帝。”

勃列日涅夫只会读讲稿



提起勃列日涅夫，给他做过翻译的苏霍德列夫说：“他的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学识，懒于读书，把书送到他手上也不读。”勃列日涅夫在对外活动中只会照本宣科，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那些材料也会交给苏霍德列夫一份。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和卡特会谈，不知如何念一份需根据问题灵活处理的材料。卡特提问后，苏霍德列夫就把讲稿中不需要的部分划掉，再交给勃列日涅夫。他开始念讲稿，念到划掉的地方，转头

问苏霍德列夫："下面还要念吗？"苏霍德列夫告诉他："不要念了。"这一切被卡特的翻译看在眼里，当时苏霍德列夫自觉"害臊极了"。会谈结束时，勃列日涅夫念了一长段事前准备好的讲稿，也根本不理会卡特说了些什么。

黄维自诩"龙""虎"



1975年3月19日向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宣布特赦释放。图为向原蒋介石集团第12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前右）发特赦释放通知书。

黄维在战犯管理所，瞧不起那些"靠拢政府"的积极分子，埋头研究"永动机"，因此没少挨批。批评黄维的很多是他的旧部，在这些人说完话后，黄维总是能用力放出一串响屁。批评他的人当然很生气："这是什么态度？你迟不放屁、早不放屁，一定要等人家的话刚刚说完，你的屁就来了。这不等于在讽刺人家对你的批评是在放屁！"黄维若无其事地回答："我放屁是生理上的关系，谁也控制不住它，你硬要把我放屁和你发言联系起来，那我也没有办法。"有一次，黄维挨批后，在桌子上写下："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不巧，被原阎锡山手下的梁培璜看到，就质问他："你是龙，你是虎。谁又是虾，是犬？"黄维没好气地说道："谁愿意当虾就当虾，谁愿意当犬就当犬，我管不着！"

蒋介石爱吃盐笋蘸酱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饮食习惯相差很大。蒋介石爱吃中餐，平时一顿饭五道菜，由厨师变换花样。无论菜肴怎样丰富，水煮笋头、酱菜、小黄瓜等几样家乡菜，蒋介石都是每日必吃。他尤其喜欢用盐笋沾着芝麻酱吃，以至官邸中每年都要制作几十斤的腌笋。有时蒋介石看到夫人吃生菜沙拉，就开玩笑说："你真是前世羊投胎的，怎么这么爱吃草呢？"宋美龄也不甘示弱，"回击"道："你把笋尖蘸上黑黑的芝麻酱，又有什么好吃呢？"说完话，两个人就又各安其食了。

蒋介石饭后喜欢吃一些水果，但很节俭。有一次，他和孙子蒋孝武、蒋孝勇在高雄吃饭，侍从给他们每人上了一片西瓜，蒋介石一边拿起水果刀把其中一片切成两半，分给两个孙子，一边说："东西不要随便浪费，小孩子只要够吃就可以了。"

毛泽东谈"中西医结合"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和负责医疗工作的黄祖炎、傅连聊天，建议“把中西医结合起来”，因为“西医治表不治本，中医治病缓慢繁复，两者要取长补短。”黄祖炎说：“城里的知识分子相信西医，乡下农民相信中医，我们国家现在是两个极端。”毛泽东说：“中西要互相学习，联合诊疗，就像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一样，走一条中国医学的新道路。”过了一会儿，毛泽东看着傅连说：“你也是外国人培养的洋大夫哟。”傅连回答道：“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教堂里洋大夫的帮助，我当不了医生。”毛泽东不由感叹：“传教士的献身精神一点也不比我们差。你们看，陕北多荒凉呀！山沟沟里有多少教堂啊。”

毛岸英刚回国时闹过的笑话



1946年，毛泽东与毛岸英合影。

1945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不久，毛泽东发现他对中国农村的实际很不了解，连小米都不认识，决定送他到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吴满有那里参加农业劳动。联系妥当后，由警卫部队派了一名战士牵了一匹马，把毛岸英送到吴满有家里，随行还带了一斗小米。

路上，毛岸英看马又要驮他又要驮粮食，生怕把它累坏，非要把小米背在自己背上。战士向他解释，这样马驮得一样多，他才搞明白。这个笑话传回警卫部队后，大家笑了好一阵，夸毛岸英是好心的后生，更体会了主席送儿子去农村深入实际生活的良苦用心。

http://pan.baidu.com/s/1sjvA9Rn



作家、翻译家施蛰存抗战初期曾歇宿湖南沅陵，夜里睡不着，到外边散步，同住的四川商客劝他不要走太远，因为“会碰到死人”。

商客跟施蛰存解释说，湘西这一带，从前交通极为不便，如果有人死在外乡，无法运棺材回故乡安葬，唯一的办法便是请祝由科（古代医学十三科之一）带死人走回家。祝由科画一道符，贴在死人额上，念了咒，摇着一个摄魂铃，死人就会跟着他走。带死人回家，必须在深更半夜，不能给生人看见，一看见他就倒下，也不会走了。所以祝由科一边走一边摇铃，叫人让开躲避。商客怕施蛰存不知道躲开而碰上，才刻意来劝。

后来，施蛰存找湘西籍贯的学者请教此事是否可信。物理学家田渠说：“按科学的理论来说，这种事是不可能有的。但是，天下还有许多事，不是科学能解释的。”沈从文说他相信是有的，“也许过去确实有

过，因为湘西人都不会否定。”历史学家向达给他的回答则是：“古书上记载的巫术，尽管现代人已不信其为真有其事，但也不能绝对否定。难道古代的学者都是说谎的人吗？”

本·拉登第一次参战成笑话

1987年4月17日，本·拉登带领一支120名阿拉伯志愿者组成的游击队，去袭击阿富汗政府军在霍斯特省的一个据点。这是他第一次参战，为此策划了几个月。然而这群抗击苏联的战士缺乏训练，毫无组织性。一位当年的参战者回忆，预定攻击时刻到了，弹药因为道路堵塞未到阵地，许多人为紧急抢运弹药而累瘫，还有一些人直接溜回基地睡觉去，留下来等待进攻的人则已吃完了干粮，现场混乱不堪。

当游击队的一位领袖发表动人的战前动员演说时，被工事里的政府军士兵听到了。这位士兵迅速操作一挺苏联的旧式重机枪，把游击队压制得抬不起头。直到夜幕降临，本·拉登才率队逃离，他们一人死亡、两人重伤。一百多人被一个人击败，一时间成为各路反抗组织中盛传的笑话。

斯大林欣赏地图



据斯大林时期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访谈录记载，他从格鲁吉亚第一书记姆格拉德泽那里听来一件事：二战后，有人把一张标有新国界的苏联地图送到了斯大林的别墅，斯大林就用图钉把地图钉在墙上，对着身边的人点评欣赏了一番地图上的新疆界。

“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情况吧，”斯大林说，“我们的北部地区现在一切正常，平安无事了。芬兰大大地得罪了我们，所以，我们把边界

线从列宁格勒向前延伸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自古就是俄国领土！现在又回到我们手中，在我国，白俄罗斯人现在可以生活在一起了，乌克兰人、摩尔达维亚人也都生活在一起了。西部地区也已经平安无事。”

至于东部边境，斯大林的感想是：“千岛群岛现在归属我们了，萨哈林岛（库页岛）全是我们的了，瞧，这有多好！旅顺和大连，都是我们的。”斯大林还特意拿烟斗在中国境内扫一下：“就连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都平安无事。”唯一让他还不满意的，是高加索以南地区。这本访谈录曾在中国数次公开出版。

“信访办主任”加加林



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首次进入太空后，顿时成为世界名人，他被包装成“和平大使”推向西方国家。加加林在他辉煌的几年里收到来自国内外的一百多万封信件，苏联专门成立一部门处理信件。有趣的是，10%-15%的国人来信是普通人提出各种请求，如要求更好的居住待遇、增加供水点、增加养老金、增加幼儿园设施、因犹太血统被大学拒收、请求预订病房……甚至有囚犯要求重审自己的案子。热心的加加林亲笔回复了很多人，当然对于苏联人民的绝大多数请求是爱莫能助。

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视加加林为赫鲁晓夫在全世界的代言人，而且他更迫切发动军备竞赛，于是，加加林失宠了。

王国维的辫子



1927年，王国维在清华学校任教。那时候，整个社会中革命气息浓厚，大家纷纷割掉象征腐朽清朝的辫子，仿佛以此明志，奔向新时代。唯有梁启超和王国维不为所动，整天拖着一条长辫子，大摇大摆地行走在清华园，完全不顾忌别人异样的目光。由于这二位德艺双馨，名声太盛，师生们也都表示理解，没人为这事儿去找他们的茬儿。所以，他们的辫子就一直留着。

但是，辫子太长，头发太多，卫生状况一定得搞好。所以，每天早晨，王国维洗漱之后，都得由其妻子给他梳头。时间一长，妻子就有点不耐烦。某日，正好碰上王夫人有急事要办，就忍不住发了点牢骚，意思是：大家都剪了辫子，为啥你偏偏留着，每天早上还得费时费力地打理它？王国维也不生气，只是淡淡地说道：“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卫立煌空手慰问林彪



1938年，卫立煌到访延安，临时决定去看望一下正在养伤的林彪。作为第二战区的副司令长官，他不能空着手去慰问下属，但找遍随行人员，也仅凑出600元。卫立煌觉得这点钱实在拿不出手，只好作罢。

离开延安后，卫立煌对身边人说：“没给林彪送点礼，太不像样

子，太寒了。到了西安再补送，有没有这个规矩？”卫的秘书、中共党员赵荣声乘机说：“我看这份礼送不送都不要紧，他们不是说八路军急需枪弹、医药和夏服吗？只要这上面帮他们点忙，就比送林彪几千块钱有用多了。”

回到西安，卫立煌果然下令：“即发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发。”卫立煌对面有难色的军需官说：“第二战区的军队受我指挥，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样看待。十八集团军打得很好嘛，我们就要充分供给。”随后又问还剩多少牛肉罐头，命令拨给八路军180箱。

撒切尔夫人强硬应对罢工



1984年6月，南约克郡，防暴警察与示威的焦煤工人发生对抗。

撒切尔夫人当上首相时，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组织是“全国矿工工会”，其领袖斯卡吉尔是一名希望在英国扩张社会主义的极端左翼分子。这个矿工工会与撒切尔政府的对决爆发于1984年，当时斯卡吉尔号召全国矿工罢工，在几十个矿井同时展开激战。尤其在约克郡的一处煤矿，发生7000名纠察队员与1700名警察对峙事件。

斯卡吉尔将这场罢工描述为英勇的工人与反动政府间的斗争，而在撒切尔夫人看来，她所面对的是“企图用暴徒规则取代法律规则的行为”。面对各种非议，撒切尔夫人没有妥协，几个月后，工人们被迫陆续回归矿井。另外，当矿工们得知斯卡吉尔接受利比亚领袖卡扎菲的资助，同时苏联已宣称要将阿富汗矿工工会、苏联矿工工会的资金捐助给他们时，矿工们进一步动摇了。矿工们知道，卡扎菲是全球恐怖分子的赞助者，而在阿富汗与苏联，工人并没有罢工的权利。

这场罢工为英国工业带来极大损失，但是撒切尔夫人的强硬应对，使英国为之受益。如她后来总结的那样，“从1972年—1985年，传统观点认为，没有工会的认同，谁也无法管理整个英国……罢工的失败证明……左翼法西斯不可能使英国陷入混乱无度的困境。”从此，管理者能更加放心地管理企业，而无需太过屈服于工人的罢工威胁。

段祺瑞财产知多少？



段祺瑞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清贫”。民初国务总理的月薪是1500大洋。当时一石（约140kg）米是10元，一斤猪肉是0.14元。按今天米5元/kg、猪肉19元/kg的价格计算，1银元大约相当于70元人民币，那段祺瑞当总理期间，月薪约合人民币10万元。当然，这只是参考方式之一，不能按房价来计，当时鲁迅在西二环花800大洋就买了套四合院。

工资以外，段祺瑞还和老同事王士珍一起，在直隶、山西边界处的井陉县，开了一家“正丰煤矿有限公司”，由段祺瑞的三弟段启勋经营。段、王两人都是做过陆军部长、内阁总理的人物，他们开公司，谁敢不买账。如后来接手煤矿业务的段启勋之子段宏钢回忆，“正丰煤矿有上述政治背景，资本较为雄厚，所以业务发展较快。”到1920年时，正丰煤矿的日产量超过千吨，并修了一段18公里长的铁路，接上石太线，方便原煤外运。

段祺瑞在同袍里不算巨富，但产业也不少。他投资有龙烟铁矿、吉林省的未垦荒地、中日合办的汇业银行、中美合办的懋业银行等，总值20万大洋——人民币1400万元。此外，段祺瑞还有一处房产，即由部属们在东直门内捐资营建的府邸，市值40万大洋，相当于人民币2800万元左右。

山本五十六的“不在乎”



山本五十六在1939年8月30日出任联合舰队司令，他翌日即从东京坐火车赶赴舰队驻地。豪华车厢里，记者们问到日本时下推行的新生活运动，政府号召男人剃光头，女人禁止烫发。

山本对此回答：“那可能不成为问题。我向来都是留着小寸头，十分省事。留短发和长发对新生活运动有什么相干呢？海军航空队的军人大都留长发，在头上遭到打击时，伤也不会重。此外，不管头发剪得多短，废物总归还是废物，所以头发的长短是无关紧要的。烫发也是一样。烫发从经济上来说比较合算，日本发式也不错，所以在这种问题上不必小题大做。”

张作霖卖包子



张作霖的祖父张有才好与人争吵，并沉迷赌博，因此与一同村无赖王某结怨。一个夏夜，正在乘凉的张有才被王某用镐打死，乡里管事者用盐腌尸体，并去90里外的海城县报案。衙役来验尸，并通缉凶手，最终无果。时张作霖年仅14岁，母亲靠做针线活辛苦养育二子一女。

16岁时，张作霖做小贩卖包子，生意不理想，卖不掉的包子只能自己食用，还常拖欠供应商货款。一个小雨天，他还剩半篮子包子，看到几个乡里老太在赌马掌纸牌，他想参加，众人因担心他输了拿不出钱而回绝。他用包子做抵押，得以参加，然恰巧仅他一人大输。张作霖耍赖，提上篮子，抢钱就跑，还转身做鬼脸。老妇们自然追不上，只好望着他的背影咒骂。

待张发迹当督军后，他当年的包子供货商老头来沈阳要钱。老头与门岗卫兵争吵，张闻讯后问：“你认识我吗？”老头说：“我不认得你，我找张作霖要欠账，听说他阔了。”张作霖便将他留在养马处看门。

杜聿明考黄埔军校之趣闻



1924年3月初，杜聿明在内的11名陕西青年从天津搭乘英国公司的轮船南下广州。他们原准备在北平报考大学，他们一代人多受时代影响而亲近革命，当杜聿明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黄埔军校招考消息，决定投军报国，遂拉了一干老乡。大家身上没多少钱，买了最便宜的通舱票，船票包括米饭供应，11人靠两罐咸菜从天津吃到广州。船在香港停靠，杜聿明一行人身着皮袄和皮帽引得当地人嘲笑，一些店家还禁止这些土包子入内。他们进餐馆点阳春面然后拼命加醋，希望省却菜钱，谁知加醋是要额外加钱的，他们只好在讥笑中忍气吞声付款。

11人在4月3日抵广州，得知报名者众多，便决意“走后门”。他们给国民党元老、陕西同乡于右任写信，请求疏通关系。等半月才有回信，期间他们在广州人生地不熟兼不会粤语，度日如年。于右任很赏识家乡青年不远万里参加革命，问寒问暖，同时给蒋介石写信。4月底揭榜，11人全取得入学资格。于右任说，国民党拟北伐，为在北方打开局面，故对北方学生放低标准。

阿登纳耍小聪明



康拉德·阿登纳，在73岁时当选为联邦德国的第一任总理，他重建了德国，被视为战后德国最伟大的领导人。他在二战前担任科隆市市长十余年，因反对纳粹而被踢出政坛。

1926年，他在科隆市市长任上时想建立一座横跨莱茵河的吊桥，市议会多数人却主张建拱桥。阿登纳灵机一动，他召集议会中的共产党员，随口编造说，正是吊桥赋予了列宁格勒罕有而特殊的美丽。事实上，阿登纳对列宁格勒及其桥梁情况一无所知，但他深谙德国共产党人对苏联满怀羡慕之情。通过争取市共产党议员，阿登纳如愿得到了他想建的吊桥，也收获了精明的政治实干家的名声。

蔡廷锴从戎赚钱记



“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率部迎战日军，成为华人世界的大英雄。广东罗定人蔡廷锴出身贫穷，为谋生计学会缝衣，但收入无法养活一大家人。他瞒着父亲进入清廷新军，当最低下的二等兵时，每月薪水扣除掉伙食费后能攒大洋三元多，是上门缝衣工钱的两倍。两月后升上等兵涨薪，给军官做了一套衣服获得三个大洋，他从没见过这么多钱。

部队调防，蔡廷锴回乡告别部队，在乡收入微薄，终复出当兵。这次加入专事剿匪的警卫军，收入没新军高，他不久离职。剿匪时作战英勇受奖5元，且在土匪尸体上搜得二十几元。他此前为买27元的耕牛到处借钱，遍尝辛酸。

蔡廷锴很快第三次从军，每月可积9元，但部队被他部吞并，他把步枪卖了80元。蔡廷锴此后担任过警长、办过民团，最后又去当兵，他任冲锋队队长攻城有功，被师长奖励300元，升少校连长。他将所有积蓄1000元寄回家，他家终成乡里的中等人家，再不需要向人借钱受气。中原大战时，他以战功升任十九路军军长，蒋介石一次性奖励该军一百万元，蔡廷锴得数千元，蒋额外奖励他数万元。从此，蔡廷锴成有钱

人。

孙殿英的“麻将相术”

在古今中外的盗墓贼中，孙殿英大概算是最明目张胆的一个——他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动用军队把慈禧“老佛爷”的清东陵翻了个底儿掉。然而，孙将军的爱好不仅仅是盗墓，对于麻将也是堪称精通。他的家里、办公室里，总是放着各式各样的麻将牌，玉石的、象牙的、玛瑙的、竹木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闲暇时，总要拿出来把玩一番。

更神奇的是，他还发明了一套识人的“麻将相术”。所谓“麻将相术”，就是通过打麻将来相人。孙殿英精通赌术，但他从来不通过赌博来挣钱，而是通过赌博来交朋友、识朋友。不管是上司还是下属，文人还是武将，只要他跟你打上几圈麻将，立刻就能对你的脾性、好恶、优点、弱点有了全面的了解。也许正是靠了这个识人的本事，孙殿英才能够左右逢源，栖身在当时的各方势力之下，太太平平地当了二十多年的民国小军阀。

沈醉见义勇为打红卫兵



1966年9月下旬，沈醉去后海钓鱼，见三个中学生红卫兵在训斥一个钓鱼的老头。红卫兵折断了老头的鱼竿，不停打骂老头。沈醉好心上前劝阻，也遭红卫兵殴打，他施展出军统时期掌握的基本搏斗技能，瞬间把三人扔入后海，随后把他们的三辆自行车也扔下去。

自知惹了大祸的沈醉骑车带着那老头飞速逃离现场，老人感激地问

他姓氏，他不敢以真姓告知，只说姓牛。待回到家，沈醉将经历告诉妻子，并在日记里记下此事，妻子立即撕毁纸张并警告他："这是留罪证，要家破人亡的。"直到1980年代初，沈醉才将此事告诉政协工作人员汪东林，不过此事无证人。

柴可夫斯基毕业时被视为庸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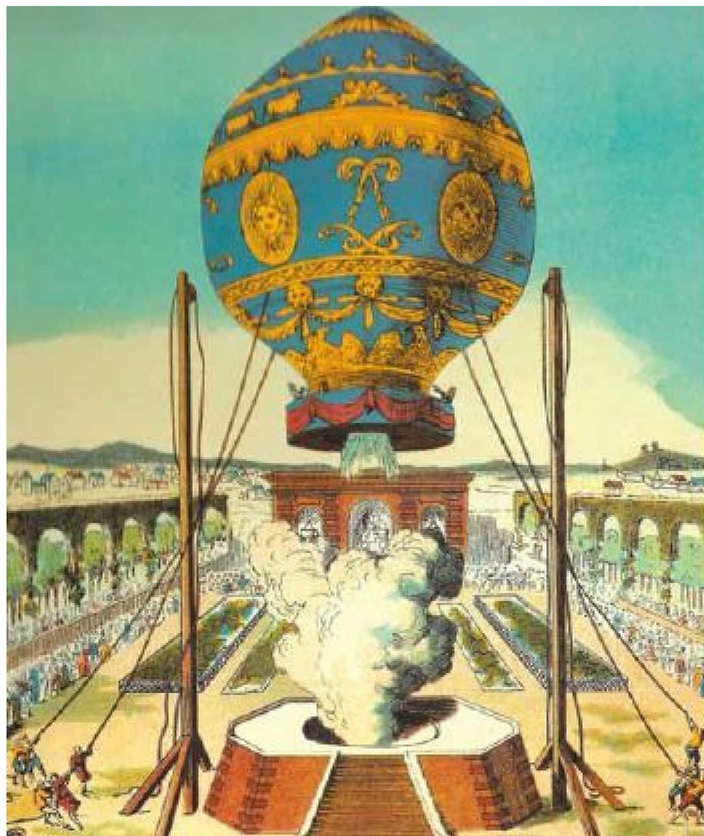


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毕业前，作为毕业考试题目，柴可夫斯基被要求为席勒的诗歌《欢乐颂》谱曲。由于时间有限，柴氏又执著地想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一较高下，导致他最终没能好好完成作品。

学院在颁奖典礼上演奏了缺席的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结果完全就是一场灾难。学校和媒界恶评如潮，其中以策扎尔·居伊的批评最为刺耳："柴可夫斯基先生绝对是个弱者，就算他的作品确实是在最不理想的情况下作出来的，但哪怕有那么一点点天赋，也理应至少在某些地方有所显露。"

柴可夫斯基深受这些评论的打击，读到评论后的一整天都在喃喃自语："我太没用了，今后也会一事无成。"不过，也有人在当时就看出了他的才华——他的朋友埃尔曼·拉罗什就评价他为"俄罗斯最具音乐天赋的人"，并预言等柴可夫斯基拿出真正的原创作品，就会成就斐然。

拿破仑放弃世界第一支空军



1783年11月21日，法国巴黎，第一次载人热气球飞行。

热气球是大革命前夕，巴黎造纸商孟高飞兄弟发明的，当时英国攻占了军事要塞直布罗陀。孟高飞试图发明一项载人飞行器，组成空军越过西班牙，夺取直布罗陀。热气球发明后，法国政府资助研发，建立了世界第一支空军。在1794年，法国革命者反对外国干涉时，使用气球部队，士兵可以提前一小时观察到敌人的调动情况，指引地面部队。法军获胜后，一些大胆、前卫的军人甚至想搭乘热气球，进攻英国本土。

奥地利人对新式武器大感震惊，提议禁止这种器具，因为它破坏了传统的骑士规则。真正扼杀这项技术的是拿破仑，他远征埃及时，也调用了气球部队，但是在尼罗河口战役中，英国人事先捣毁了所有的气球，拿破仑一气之下解散了空中部队。此举耽误了航空事业两代人之久，直到50年后的南北战争，气球才重新回到了战场。

慈禧喜好洋房



清末最高统治者慈禧，一面推行顽固保守的政策，另一面又喜好西洋玩意儿，她在接受西式建筑方面是一个带头者。八国联军侵华之时，慈禧逃到西安，当地官员以条件最好的房舍供她居住，慈禧并不满意：“其建筑太老，湿重，且易致病。余寓其中，如入地狱。”回北京后，清朝与列强和好，美国使节夫人等受邀游览颐和园，慈禧讲道：“吾国虽古，然无精美之建筑如美国者。”

1902年清政府筹建“海晏堂”，设计师专程到法国取经，慈禧太后选择路易十五风格，除了御座仍随旧制外，其余都是西式。1908年，北京西直门外行宫“畅观楼”落成，这是欧洲巴洛克式的两层楼，慈禧参观了一次，很是欢喜，表示还要再去，但不久便去世了（此楼仍存，现属一家俱乐部）。

清朝灭亡后，大批遗老跑到上海、天津、青岛当寓公。这些人曾痛斥火车、铁路等西洋器物违反祖制，现在住了洋房、洋楼后，并没觉得不舒坦。

痴迷围棋的段祺瑞



北洋军阀段祺瑞，是个怪人。怪在哪儿呢？与他的大部分同僚不同，他一不爱钱，二不好色，除了当官外，最大的爱好就是下围棋。

段祺瑞对围棋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平日里，来的客人只要会下围棋，他多半要让别人陪他杀几盘。另外，段祺瑞还在府里养了几个围棋清客，专门陪他下棋。据说，后来的围棋大师吴清源，就是当时段府里年纪最小的清客。而正是段祺瑞看中了他的天资，才支持他东渡日本学习围棋。

虽然段祺瑞的棋瘾很大，水平却一般。但他自己却觉得棋术高明。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是赢。来的客人，多是有求于他，自然想把他陪舒服了；府上的清客，本就是陪他玩的，自然也会让他玩舒服了。这样一来，段祺瑞自然就觉得自己难逢敌手了。

王莽的绝招



新朝末年，起义军蜂起。政府军杯水车薪，平叛无力，眼瞅着首都长安就要被攻陷。在这紧要关头，大司空崔发向王莽提供了一个平叛的绝招：哭。

他的理由是：在古代，当国家遇上大的灾难时，就用向天大哭的办法来请求苍天帮助。王莽一拍脑袋：对啊，《周礼》中对此有记载啊。于是，王莽率领文武百官，来到长安城南郊，一起对着苍天大哭。一面哭，王莽还向苍天陈述了自己称帝的过程，并把当初天降祥瑞的事情一一列举。王莽不仅带领群臣哭，他还动员老百姓也要聚在一块哭，政府提供早餐和晚餐，哭得最投入的，王莽还授予其官职。据史书记载，当时因此而获得擢升的官员达五千人之多。

可惜，仅仅几个月后，王莽就被攻入长安的起义军割下了头颅。

汉景帝刻薄寡恩

汉景帝以“文景之治”彪炳史册，事实上，这完全是沾了他爸爸汉文帝的光。汉景帝自己是个刻薄寡恩的皇帝。早在做太子时，他与吴国太子下棋，因一言不合，竟然用棋盘把吴国太子活活给打死了，这也成为后来爆发的“七国之乱”的一个隐秘的诱因。

大臣晁错，很得汉景帝的信任。为了加强皇权，晁错主张削藩，汉

景帝接受了晁错的建议。但当削藩引起吴国、楚国等藩国的强烈反弹后，他眼睛不眨地就把晁错给杀了，结果七国还是叛乱了。

周亚夫是西汉开国功臣周勃的儿子，为平息“七国之乱”立下了不世之功，但汉景帝对待这个大功臣依然是毫无恩情。周亚夫年老后，他儿子买了五百副甲盾，想等亚夫去世后作为陪葬品，但此事因涉嫌谋反而被告发，汉景帝立即派人调查此事。最后，周亚夫竟以“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入狱。亚夫不堪此辱，绝食五日，吐血而亡。

斯大林灌醉松冈洋右

1941年，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访苏，斯大林亲自出马，又是灌酒，又是送行，为苏联换来了《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

据莫洛托夫回忆，斯大林给松冈的待遇是绝无仅有的，“因为斯大林从不迎送任何人，日本人、德国人，都深感震惊。”为这次送行，火车的发车时间推迟了一个小时。斯大林挽着松冈洋右的手臂，和莫洛托夫一个劲地给他灌酒，在场记者也帮忙劝酒，“把他灌得差点没让人抬着上火车。”

松冈洋右登车离开时，搀扶他的人应该是莫洛托夫。在车站上，松冈都快站不住了，却还是酒兴未消，与莫洛托夫一起唱了俄罗斯民歌《芦苇沙沙响》。“这次送行的价值就在于，日本将不同我们开战。”莫洛托夫评价说。

“华尔街的女皇”是个吝啬鬼



美国纽约的华尔街以“美国的金融中心”闻名于世，产生了大量具有传奇色彩的巨商、财阀和大富翁。而传奇中的传奇，是一个名叫海蒂·格林的女人。

海蒂·格林是美国著名的豪兰家族的一员，1835年出生。在1865年她父亲去世后，她继承了100万美元的资产。这在当时虽是巨款，但也算不上多么惊人。但她有着极为出众的理财能力，用最稳健的方法进行投资，并不希求高利润，但一定要保证财富的稳步上升。到她1916年去世时，资产已经达到一亿美元之巨。因此，她被誉为“华尔街的女皇”。

不过，这位“女皇”还有着另一个外号：“华尔街的巫婆”。这个富可敌国的女人可谓极为吝啬，总是穿着破旧而肮脏的黑裙子，每天的饮食几乎都是极为普通的燕麦粥。她从不聘请会计师，巨额的财产总是自行打理。而对于被称为“吸血鬼”的律师，她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从不让他们钻自己的空子。她甚至随身携带手枪，为的是对付强盗、小偷和律师。如果仅是如此，还不算什么。但她对于金钱的热爱几乎超越了一切，友情、爱情、亲情都不足以和日益增长的财富相比。她因为丈夫投资失败而和丈夫离婚，自己的小儿子膝盖受伤，她带着儿子去看医生，总是拒绝付钱，结果换了几位医生都没能治好，最后儿子的腿被截肢。

可以说，海蒂·格林几乎就是现实版的葛朗台。以至于百年之后，她非凡的理财能力和吝啬的传说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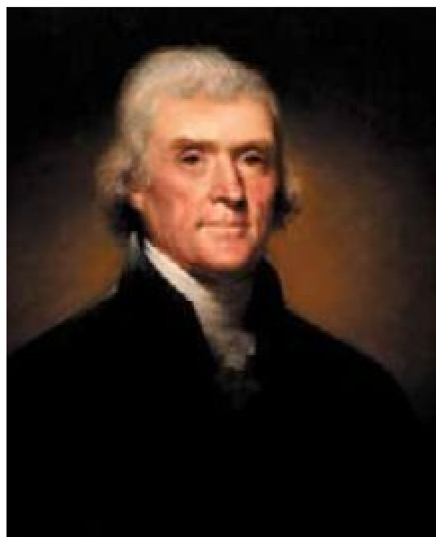
傅作义在西安事变中



绥远省省长、35军军长傅作义听到西安事变消息时，顿觉不安。12月15日，张学良发电报给傅作义，简要陈述兵谏理由。傅作义判定张学良和杨虎城没有杀蒋的直接意图，决定亲赴西安去说服张、杨放人。傅作义的资本，是他红极一时的身份。不到一个月前，傅作义率军击溃伪蒙军队，收复绥远北部的百灵庙，一时名震全国。

为避开关东军设在绥远的耳目，傅作义对外宣称自己去太原见晋绥军老长官阎锡山。12月22日，傅作义搭乘的飞机导航有误，找不到太原来降落，燃油耗尽之际，飞机强降在河北易县城外，傅作义险丧命。他徒步进城发电报给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宋哲元派人连夜把傅作义接到北平，傅作义随后搭车返回。待回到绥远，蒋介石已回南京。

热爱冰淇淋的美国国父们


托马斯·杰斐逊

美国国父之一托马斯·杰斐逊是一位冰淇淋爱好者。1785年至1789年驻法国从事外交工作时，他迷上了冰淇淋，回国时带回一份香草冰淇淋的配方。杰斐逊随后创造出了一份冰淇淋食谱，称之为“特制冰淇淋球”，享誉全国。今日，有厂家照这份食谱制作产品，唯一的差异是鸡蛋经过巴氏消毒。

不过冰淇淋在当时是奢侈食品，因为制作冰淇淋是一项很费时间、精力的活儿，无论是在自然界采集冰块并放入地窖保存，还是用手长时间搅拌冰淇淋使其凝结成型，成本很大。杰斐逊是富人，他14岁时就从父亲手中继承了约5000英亩土地，超过20名黑奴。所以，杰弗逊有能力为满足口腹之欲而修建冰窖。



另一位国父乔治·华盛顿，也热爱冰淇淋，而且他比杰弗逊更富裕。为追求美味，他同样是在庄园里挖冰窖。华盛顿于1788年2月的日记里记载，连续采了6天冰块，动用不少人力和车。1790年的夏季，总统任上的他为购买冰淇淋共计花费约200美元，这笔开销折算在现在约有3000美元。华盛顿拥有两个装冰淇淋的白锅，体现了一个吃货细腻而高雅的品位。围绕华盛顿和冰淇淋，有一个以讹传讹的民间传说，他的妻子玛莎·丹德里奇·卡斯蒂斯·华盛顿将奶油放在阳台上，隔夜后变成了美味的冰淇淋，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哈耶克的大兵生涯



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出生于传统君主派的家庭，一战爆发后，入选候补军官。哈耶克智商出众，在军官训练班里经常排名第五、六名。等他受训完毕时，战事已经打到最后一年，哈耶克被分配到意大利前线当通讯官。

这个兵种并不比作战人员安全，在战争中哈耶克和死神打了四回交道：一次冲锋时，他完全暴露地攻击南斯拉夫的机枪阵地；他搭乘侦察机时，遭到意大利战斗机的猛烈开火；从观测气球往外跳伞，由于忘了摘耳机，差点给勒死；有次战斗中，弹片割开了他的头盖骨。

在休战期间，哈耶克阅读经济学著作，大战结束后转到维也纳大学就读，日后成为一代经济学大师。假使哈耶克在战场上不幸牺牲，恐怕就没有现在的奥地利学派了。

吉鸿昌曾是光身上阵的勇猛怪将



二次北伐时，时任第二集团军前敌政治工作团主任的简又文回忆属下吉鸿昌是一员“怪将”，是历朝历代野史小说中都见不到的形象。时任师长的吉鸿昌满脸长着浓黑的胡须，如同家喻户晓的古代猛将张飞、王彦章。早期军阀混战中，吉鸿昌习惯在作战时脱光上阵，全身肌肉横

生，非常显眼。

吉鸿昌还招募了两名身材魁梧的汉子陪伴在身边，这两人也裸体上阵，一人手持大刀，一人挥舞大旗。他们三人一起冲锋陷阵，一起声嘶力竭喊叫，这鼓舞了己方的士气，有效威慑了缺乏训练的敌军。因此，当吉鸿昌带领的西北军遇到羸弱的对手时，仅仅凭借主帅的勇猛表演就能一举击溃敌人。

李宗仁不知何谓“壮族”



1948年的李宗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依据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在全国范围

内进行了“民族识别”与“民族划分”，于是“壮族”、“回族”等应运而生。但事实上，人们对自己被划归的民族不甚了然。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召开成立大会，一个名叫潘德茂的代表说：“我去参加开会是以瑶族身份为代表……其瑶族的根据，我也不懂，以后我做代表回去，也跟着宣传是瑶族。”还有人说：“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族，政府给我们定什么民族，我们就是什么民族。”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唐德刚对李宗仁说：“广西今日已不是个省，而是‘壮族自治区’了。”李宗仁听后茫然，唐德刚就给他写了一个繁体的“僮”。谁知这位“广西王”看后，还是不知道“壮族”是什么族。

胡适因何与宋庆龄决裂



1932年12月，宋庆龄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张“释放一切政治犯”，参与营救陈赓、廖承志、邓中夏等人。胡适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出任同盟北平分会主席，与杨杏佛等一同考察陆军反省院。政治犯们向胡适等诉说了最大的两项痛苦，即“脚上带锁与饭食营养不足”。回

到寓所不久，胡适收到史沫特莱转寄的“控诉书”，备谈反省院中对政治犯施以的种种酷刑。宋庆龄要求北平分会立刻发表抗议。

收信第二天，胡适就见英文《燕京报》上刊发了这份“控诉书”。他急忙给同为盟员的蔡元培、林语堂写信，说“孙夫人的文件，乃是一种匿名文件……岂可不经查考，遽然公布于世?”胡适指“控诉书”为“捏造”，而宋庆龄此举“大足以破坏本会的信用”。胡适与宋庆龄的冲突公开化后，被开除出盟。他在日记中写道：“此种人自有作用，我们当初加入，本是自取其辱”。

萨达姆酷爱清洗空军



萨达姆执政时期的宣传画。

伊拉克空军卷入了1941年以来的每次政变，萨达姆在掌权后就不信任空军，他觉得难以控制飞机上天后的行为，便不断清洗人员。两伊战争中，空军的任何主要军事行动都要交萨达姆报批，直到1986年伊朗军队攻势凶猛，他下放权力。战争结束，大批空军中高级军官被处死，含许多战斗英雄。

空军在海湾战争中惨败，萨达姆亲自用手枪击毙其司令。1992年到1993年，空军中只有对复兴党最忠实的军官幸存下来，许多富有作战经验的军官被处死，飞行训练一度中断。“9·11”事件后，空军军官在内的很多体制内人士再次拟政变，2001年10月萨达姆先下手逮捕并处死了2名空军军官在内的22人。翌年9月，空军一架战斗机在训练时挂弹飞向塞尔萨尔湖湖畔的萨达姆行宫，萨达姆正在宫内，飞机未及投弹就被击

落，萨达姆随后烧死了跳伞成功的飞行员，该机所在基地的军官都被杀。伊战前一刻，萨达姆下令把飞机都拆解后埋掉或隐藏起来，短暂的伊战中遂见不到伊拉克飞机。

伍廷芳虚张声势吓坏墨西哥



1896年11月16日，清廷敕封伍廷芳为出使美日秘国大臣，第二年4月2 4日到达美国华盛顿，5月1日正式就任驻美公使。

美国通过《排华法案》后，墨西哥也想效仿，限制华工入境。身兼清政府驻美国、秘鲁、墨西哥、古巴四国公使的伍廷芳，赶往墨西哥进行交涉。谈判中，墨外交部长蛮横无理，伍廷芳拍案而起：“下旗回国，再电中国政府调兵船来，与汝等周旋。”墨西哥政府急忙请美国国务卿出面调停。

当时美国各报纷纷报道其事，并绘制漫画，一边是发怒状的伍廷芳，一边是驶向墨西哥湾的大清巡洋舰。经美国调解，墨西哥最后屈服，不再推出排华议案。

伍廷芳回到美国，被中国留学生视为英雄。有人问他：“中国兵船何在？”伍廷芳回答：“予知墨国政府昧于中国情形，故毅然为此言。”又有人问：“老博士何毅然敢言绝交？”伍廷芳笑道：“在华盛顿出发赴墨时，美国务卿与予最善，予与彼密谈，如在墨西哥交涉决裂，彼已应允负责调停矣。”

冯玉祥早年当兵被人欺



冯玉祥的父亲是武秀才，在淮军中刚当上队官就遇军队整编而被编余。此时冯家住保定，经济困难，拟回老家安徽巢县。路费不足，父亲走后门让冯玉祥在保定冒名顶替当兵，当时入伍非易事。冯玉祥饱受老兵的欺负，如吃饭时分不到菜。冯玉祥夜间学习识字，老兵们禁止他出声和使用公用油灯，他自购小油灯放在硬纸盒或被窝里照明。冯玉祥练字，他们故意摇晃桌子，并说“只许你写字却不许我们摇晃？”冯玉祥作为新人只能逆来顺受，唯有同屋的谷良友常出来打抱不平为冯辩护几句。时间一久，老兵们也不难为冯了。

冯玉祥对谷良友甚为感激。谷良友后在冯部里任团、旅、师长等职务，日常生活不检点，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且骄横到无人敢惹。冯玉祥治军很严，禁止部下喝酒、嫖娼、赌博，但对谷良友睁只眼闭只眼。1934年谷良友死于胃癌，冯玉祥写挽联：“想当初咱同心同德同革命音容俱在，看今朝你先生先死先超升豪气长存！”

张献忠政权里的传教士



张献忠农民军建立大西政权时，两位天主教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正在四川传教。张献忠称王后，在礼部长官吴继善竭力推荐下，把两名神父也召到了成都，“待以上宾之礼，请两位司铎驻成都，以便顾问。”每月每人拨给库银十两，并赐“天学国师”之号，受领袍套。张献忠还曾当众对两人许诺：“尔等现居蜀中，将来吾当为尔等建筑教堂，奉祀天地大主。”

张献忠很看重传教士的学识，他让两位神父用红铜造了天球、地球各一，另造日晷配合，置于宫中，视为异宝。但他那喜怒无常的诡异性格同样令传教士吃尽了苦头。有太监向其密报，说传教士藏有天学之书未报，张献忠一听就“咆哮如虎，怒骂之声远近皆闻，欲置二司铎于死地”。后又因为神父制造天地二球有功而未加伤害，却迁怒于告密太监，要把他处死，幸好神父从旁劝解才赦免其过。自此以后，张一直怀疑神父们“外顺诚而内叵测”，他决定离开成都前往陕西抗清时，将传教士羁押在其军营里。直到他中伏身亡，清军将领肃王才把俘获的两名神父送回了北京。

陈济棠迷信“高人”

20世纪30年代主政广东的粤系军阀陈济棠，十分迷信。当初，他心比天高，总觉着自己不该只是屈居广东，应该可以身居更高的位置，于是就请了个风水先生指点一二。风水先生说，问题出在祖坟。洪秀全家的祖坟风水非常好，不妨把祖坟迁到那里。陈济棠深信不疑，就把洪家的老祖宗挪了窝，把自己家的祖坟迁了过去。

1936年，接到桂系军阀的联络，陈济棠准备公开反蒋，以实现自己“飞得更高”的理想。但限于实力差距，陈济棠心里没底，举棋不定。按照惯例，他又找来一位“高人”指点一二。“高人”为他卜了一卦，得出的结论是：机不可失。这把陈济棠高兴坏了，他立即决定公开反蒋。可惜，不知是风水先生出了问题，还是卜卦的“高人”出了问题，总之，陈济棠的反蒋大业很不顺利。没多久，就落入了众叛亲离的地步，只好灰溜溜地跑到香港，躲了起来。

“孙大炮”侃不晕杨度



杨度是清末著名的“立宪派”，他留学日本时，就在留学生中极负盛名。当时正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听闻杨度的大名后，专程从横滨赶到东京，希望把杨度拉进“革命派”的大营。杨度的寓所里，向以口才著称的孙中山有着“孙大炮”的外号，使尽浑身解数，大侃了三天三夜的革命道理，但很遗憾，未能说服杨度。杨度内心不认同孙中山的理论，但拒绝的话说得很客气：“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已久，难骤改……”

不过，孙中山这趟也没白来，虽没说服杨度，却意外收获了黄兴。而黄兴正是杨度推荐的。杨度的原话是这样的：“度有同里友曰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辅公无疑，请得介见。”离别前，杨度又对孙说道：“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爱美人不爱江山的爱德华八世另有隐情



爱德华八世与辛普森夫人。

1936年12月11日，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宣布自愿放弃王位，与一个曾经两次离婚的平民妇女辛普森夫人结婚。这段传奇被称为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经典案例，爱德华八世也以“情种国王”之名名留后世。

辛普森夫人并非倾城倾国的美人，而且在遇到爱德华八世时，已经35岁，且离过两次婚。这样的爱情遭到英国王室乃至政治上层的强烈反对，辛普森夫人也一度打退堂鼓，想斩断情丝。但爱德华八世却表示：“即使我独自一人同你在一起，也比一顶王冠、一根权杖和一座御座更令我心悦。”最后坚持放弃王位，以温莎公爵的身份与心爱的人结婚。夫妻二人从此相依相守35年，直到1972年温莎公爵去世。

不过，爱德华的爱情传奇也许另有隐情：他的退位，并非因为爱情，而是源于他对纳粹的态度。爱德华继承王位以后，对德国纳粹非常钦佩，而且对此不加掩饰。年轻国王的这种偏爱，使得英国政府高层非常不安，担心他继续留在王位上，会影响英国的对外政策。甚至辛普森夫人也对纳粹人士十分赏识，与德国驻英国大使、后升任德国外交部长的里宾特洛甫关系密切。

正是爱德华八世的种种亲纳粹表现，才导致英国政治人物向他施加压力，迫使其退位。

老实人加斯贝利



阿尔契德·加斯贝利，是意大利二战后首任总理，他的任期从1945年到1953年。他带领的天主教民主党在1948年的第一次国会大选中，战胜当时西欧最大的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改变了战后意大利的政治进程。他让意大利加入北约，获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振兴意大利的成绩使他与吉田茂、阿登纳齐名。

战后意大利极端贫困，连粮食供应都无法保证，加斯贝利只好过着简朴的生活。刚上任时，他为买一套新衣服而预支薪水。上任总理后的好几年里，他们夫妇及四个女儿仍旧住在他在梵蒂冈当职员时的小公寓房，家具是分期付款购得。一个年迈的伯爵夫人住他对面，她把君主政体的消失归罪于加斯贝利，于是想法设法跟总理过不去。她把垃圾桶放过道希望绊倒总理，晚上大声弹钢琴不让对方休息。加斯贝利仍然和气对待，并不在乎。后来，加斯贝利一家的生活逐渐改善，但一直谈不上富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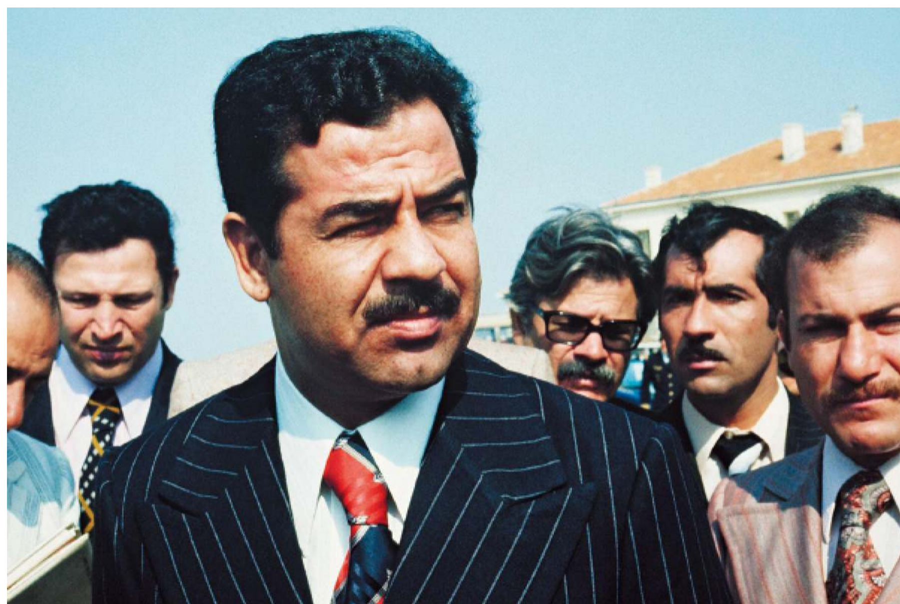
黄克诚在失联期间的苦日子

1928年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部队整编后，黄克诚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第12师35团团长，很快因体弱改任团内的营党代表。黄克诚部下山作战，在湘南被击散，士兵都跑回湘南老家。从此，他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达一年。

黄克诚和同仁李卜成辗转到达上海，一路上备尝艰辛。在沿途的武汉、南京，他们找了同乡、老同事、旧日黄埔校友求救济，老友都在国民党军任职，通常是非常谨慎地送上一笔钱，便不敢再交往，幸好也不举报邀功。到沪后，他俩仍然靠这些关系艰难度日，然熟人都知道他俩身份，通常只敢送一次钱。黄克诚忆最窘迫时“我们尝尽了厚着脸皮求人告助的难堪滋味”，走投无路，房东逼房租。因只看不买，他们一度被书

店店员怀疑是偷书的，后明白是揩油白看书，便任其翻阅。1929年1月，他们终和党取得联系，组织关系恢复，每人拿到三十块钱，结束了饥寒交迫的日子，回归职业革命生涯。

萨达姆滥打共济会



1974年，伊拉克复兴党政府逮捕了160多个知名的企业家、学者、专家，他们的罪名是参加共济会。政府的证据来自一个被破获的保险箱，仅仅是一位叫查德威克的人在1942年邀请这些人参加晚会的请帖。查德威克本人在1958年卡塞姆政变后逃离伊拉克。

这些被捕者的年龄平均超过70岁，其中92岁的主犯于1908年在印度孟买参加了共济会，不过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卡塞姆政权期间的共产党或共产党支持者。萨达姆认定参加共济会等同于为境外势力服务，不过他没公示证据。其实，这些倒霉者是否属于共济会都不重要，这是复兴党和萨达姆清洗异己势力、巩固权力的借口。政府之前已经借美国间谍、犹太复兴主义者、叛徒、第五纵队等罪名清洗了诸多政治群体。

“打工皇帝”李明博



早在成为首尔市市长前，李明博已是韩国人民的励志对象。他被称为“打工皇帝”、“李明博神话”、“工薪族的神话”“韩国传奇”等。自传《没有神话》自2005年出版后，一年内销量超过70万册。

李明博在1965年24岁时进入现代集团旗下的现代建设，不到两年被提升为韩国承建泰国一处高速公路工程项目的负责人。项目完工后，李明博回国任重机所管理科长，全力支援现代建设承包的京釜高速公路。他随后力排众议进入尚未兴起的地产业，成立韩国城市开发株式会社，大赚一笔。1970年他被提升为现代建设的理事，1972年升管事的常务理事，1975年任副社长，1977年任执行总裁，1988年任董事长。李明博的火箭式上升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他家早年过着节衣缩食、忍饥挨饿的日子，他高中时做街头小贩，还靠清理和搬运垃圾积攒大学学费。

安徒生可能是国王私生子



被誉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的安徒生虽然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童话作品，但他的童年并不美好，是在贫穷和劳苦中度过。他出生于欧登塞城一个贫穷的市民家庭，父亲是鞋匠，母亲是洗衣妇，童年的他无缘接触教育，总要帮父亲母亲做活。闯荡世界的过程中，他更是饱受世态炎凉，险些饿死。不过，有人指出，这位出身贫苦、命运坎坷而一直保持赤子之心的大作家，很有可能是国王的私生子。

历史学家延斯·约根森写了《安徒生——一个真正的童话》一书，说安徒生其实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和劳尔维格伯爵夫人的私生子。出生后，王室把他安置在了一个欧登赛鞋匠的家中。作出这种推论的根据是，安徒生是一个鞋匠的儿子，身份低微，可是后来竟能进入上流社会，出入于皇家剧院，甚至在皇家宫殿阿马林堡宫居住了一段时间，如果没有王室的暗中帮助，这些是不可能的。丹麦作家皮特·赫固也支持此说法，并提出了另一种根据，一位海军上将的女儿亨丽艾特·吴尔芙1848年给安徒生的信中曾提到，安徒生自己也发出自己是“王子”的慨叹。

欧洲各国王室都坚持一夫一妻制，但享有权势和财富的国王们总会有很多情妇，留下私生子众多。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自然不能免俗，他确实有不少情妇，并有私生子。丹麦著名历史学家塔格·卡尔斯泰德翻阅了大量有关克里斯蒂安八世的档案，确认了国王有多位私生子。克里斯蒂安国王还曾专门照顾自己的一位私生子，将自己与一位挪威妇女的私生子弗雷德里克·里德安排在王室猎场掌管狩猎工作。那么，安徒生受到王室暗中帮助便是有可能的。当然，很多人并不认可这样的说法，认为安徒生足够伟大，没必要再寻找什么王室光环为其增光。

悲催的纳粹二号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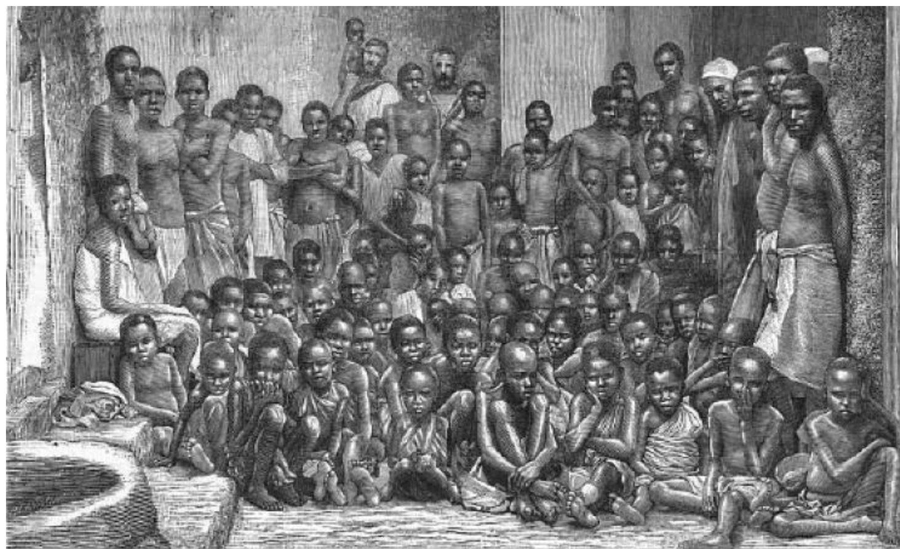
风光时刻的纳粹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挥手致意者）

执政德国时期，纳粹各大佬可谓风光无限，从希特勒算起，无论希姆莱、戈贝尔还是戈林，在败亡之前无不都权势熏天，不可一世。凡事总有例外，有一位纳粹党的大佬，且曾是仅次于希特勒的二号人物，却在纳粹党还是鼎盛时期便陷入了悲催的命运。这个人就是鲁道夫·沃尔特·理查德·赫斯。

1894年，赫斯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德国商人家庭。1920年7月赫斯参加纳粹党，成为该党的第16名党员。1923年11月，赫斯追随希特勒进行了著名的“啤酒馆暴动”。暴动失败后，赫斯和希特勒一起坐牢，笔录了希特勒的名作《我的奋斗》。1925年纳粹党重组后，赫斯成为希特勒的私人秘书。1932年12月，赫斯被希特勒任命为纳粹党中央政治委员主席。同年，赫斯成为德国国会的纳粹党议员，晋升为党卫军上将。继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纳粹党登上国家权力舞台之后，1933年4月21日，赫斯被任命为纳粹党副元首，成为纳粹党仅次于希特勒的二号人物，进而在1939年被希特勒指定为自己的继承人。

顺风顺水时，赫斯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二战全面爆发，英德两国大打出手之际的1941年5月10日，他独自驾机飞往英国，着陆后声称要完成一项和平使命。英方并没有将他视为和平使者，而是将他监禁，并在1945年把他与其他战犯一起审判，判处终身监禁。即使一些和他一起审判的重量级人物如邓尼茨、斯佩尔、席腊赫得到释放后，他仍被关押。直到1987年，已经93岁的赫斯在狱中自杀身亡，整整坐了46年的牢。赫斯为什么飞英，已经成为谜案，要等到2017年英国相关档案解密才能大白于天下。

美国的黑人奴隶主


船舱内的黑人奴隶们，男女皆有，还有许多儿童，他们正被运离家乡。这幅木刻制成于1884年。

南北战争结束美国奴隶制前，有少部分奴隶主是黑人。据1830年的美国人口调查，全国共有3775名黑人奴隶主，他们集中在南方，拥有12760个奴隶。当时全国的黑人自由民已超过30万人，他们或者生而是自由民，或者是被解放的，或者赎买到自由。黑人奴隶主的蓄奴动机，多数出于商业需要，毕竟南方的农业生产流行使用黑奴。极少数黑人奴隶主会出资赎买自己的家庭成员，当时的法律环境下，购买处于奴隶地位的亲属的所有权比使他们获得自由要更容易。

绝大多数黑人奴隶主，认可奴隶制是一种合理的制度。南卡罗来纳州的种植园主、扎棉机制造商威廉·埃里森，是一个实力雄厚的黑人奴隶主，他有100多名奴隶。埃里森对待自己的同肤色同胞非常冷酷，决不允许他们将自己的地盘作为“通向自由道路”（逃到北方）的落脚点，甚至禁止他们谈论自己的经历。声名狼藉的马里兰州黑人奴隶主内特·布特莱尔，假装为逃亡的黑奴提供藏身处，同时假扮成追捕者去联系这些奴隶的主人，试图让对方将逃亡者折价卖给他，他赚取颇丰。

不乏有黑人奴隶主在战时坚定支持南方邦联，埃里森便是其中一员。1860年年底，几个居住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黑人奴隶主，联名在新奥尔良《三角洲日报》上发文声明：“路易斯安那的自由的有色人……拥有奴隶，并且深深地依恋着他们的故乡的土地……他们已做好了流血的准备以保卫自己的家园。”

希特勒“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希特勒和两位艺术家在埃菲尔铁塔前合影。

1940年6月23日，法国投降第二日，希特勒来到巴黎。艺术爱好者希特勒对巴黎仰慕久矣，刚抵达这座城市时不断惊叹。在市区内旅游，希特勒只带了几个顾问、一小队卫兵、两名他最欣赏的艺术家——建筑师阿尔伯特·斯皮尔和雕塑家阿尔诺·布雷克尔。

一行人来到巴黎圣母院，曾仔细研究过它的希特勒十分得意，临时客串导游。他一度停下来宣布有一个房间消失了，工作人员解释这屋在维修时被墙堵住了。“你们瞧，我对这里有多熟悉。”希特勒洋洋得意地说。在埃菲尔铁塔前，希特勒与随同的两位艺术家合影，成为一张著名的照片。来到荣军院里的拿破仑墓时，希特勒对拿破仑的棺材注视良久，自言：“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这一天，希特勒花了三小时完成巴黎之旅，他在圣心圣殿结束了旅程，直接去戒备森严的机场。

希特勒所言不假，击败法国正是纳粹德国侵略事业的最辉煌期。尽管希特勒珍爱历史名城巴黎，但当西线德军节节败退时，丧心病狂的他毫不留情下令摧毁巴黎，无论博物馆和教堂。巴黎城防司令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思考再三后违抗了元首的命令，他下令投降，拯救了巴黎。

陆荣廷的从匪逻辑



陆荣廷，生于1859年，1894年被广西提督招抚，1904年任广西边防军统领，手下的4000多人部队成为日后桂军的核心力量。他风云一时，最终被新桂系和沈鸿英击败，只好于1924年10月在湖南发表下野宣言。1928年11月6 日，他在上海病逝。

旧桂系领袖陆荣廷，出身土匪，并对当匪时期的犯罪行为津津乐道。他声称自己行盗的地方是安南（法国殖民时期原越南阮朝领土被分为东京、安南保护国及交趾支那），不是中国，他杀法国人是替安南人打抱不平，也是为祖国报仇。“诸君呀！法国鬼子把我们的兄弟之邦夺去，还不应该杀他吗？”他时常在麻将桌上为自己辩解。

陆荣廷的故事大致如下，二十三四岁时在龙州二府当亲兵，虽得老爷信任，但因薪水微薄而终日愁眉不展。他最终辞职回家种地，生计依然艰难，最终横下心去杀人越货。陆荣廷擦亮鸟枪，装上土铁钉和火药，大呼一声“我陆阿宋连做贼都不会吗？”便背枪进入黑松林。太阳逐渐下沉，他看见一个同胞唱着情歌经过，终不忍下手。不久，一个戴二道划线袖章的法国兵经过，他想起曾被法国兵的狗咬伤，便一枪打死法国兵，抢走对方身上的48元法币、一块金表、一把双筒猎枪。陆荣廷从此落草为寇。

第二章 教科书都是“骗人”的

“流血星期日”，沙皇和工人都冤大头



１９０５年1月2２日，沙俄军警向示威群众开枪，史称“ 流血星期日”。

1905年1月22日是星期日，在俄国圣彼得堡，由加邦神父领导的“彼得堡工厂工人大会”组织彼得堡15万工人去冬宫向沙皇和平请愿。当队伍到达冬宫入口处时被封锁住了， 军警突然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射击,死伤达4600多人。这就是有名的“流血星期日”，成为俄国1905年革命的开端。

这场著名的流血事件，后世一般归之于沙皇的残暴以及加邦神父的阴险。然而，后来有证据表明，沙皇和工人其实都是这一事件中的冤大头。

1996年，一位名叫伊·阿·伊萨柯夫的人，爆出了一位见证人玛丽娅·加芙里洛夫娜·普拉斯季尼娜的一段

自述：

“我当时19岁，是一个纺织女工。我是1905年1月9日‘流血星期日’的见证人。在拥挤的人群中， 我被挤到了前面几排， 直接面对着士兵的防

线。混乱中大群工人走近了冬宫。这时候， 一位军官穿过士兵的队伍走过来。我们这些工厂的姑娘都瞧着这个年轻、精力充沛、表情严肃、穿着笔挺的军人，特别欣赏他整齐的小胡子和不高的军官帽。看起来，他不满意人群太靠近军队。但一切都很安静与平和。突然， 人群中有一个穿戴齐整的人很快地向那军官走去，军官停下来并抬起头，看来好像等待来人说什么或有什么请求。但来人迅速拔出手枪向军官射击。军官倒下了，与此同时士兵向人群和空中开枪。而我竟幸免于难。”

“所发生的这一切，晚些时候，在30年代，我曾讲给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俄国女革命家,十月革命后曾任公共福利人民委员)， 那时我和她很熟。她很仔细地听我说完， 说:‘玛莎， 此事对任何人都不要再讲, 弄不好, 这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麻烦。’”

此后， 玛丽娅一直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 直到1961年她才向伊·阿·伊萨柯夫秘密地讲述了当年经历的一切。

苏军在旅大禁止公开反蒋



1946年，中国东北，苏军张贴的中苏友好海报绘上了镰刀斧头与青天白日的标志。

1945年8月22日，苏联红军进驻旅顺、大连，开始了旅大地区近五年的苏军军管时期。

当年10月，在苏军支持下，中共旅大党组织在当地建立了党政警群机构，但受当时形势所限，中共大连市委也不能公开运作。苏军对中共在旅大的活动设定了很多限制。他们针对中共办的报纸派了新闻检查官，凡是庆祝解放军前线胜利或骂国民党蒋介石的文字一律删除。

中共召开群众斗争大会，苏军有时也出面干涉，驱散开会的群众，甚至扣押主持会议的人。

苏军的做法惹得中共基层干部普遍不满，有人还抱怨道“以苏为

主”实际是“以我为奴”。殊不知苏军的做法是怕中共行动超出《中苏同盟条约》允许的范围，惹来外交麻烦——尤其是同美国。暗地里，苏军不但帮中共落脚，还支持他们在此从事军工生产，装备大量“武警”开赴前线，只不过这些情形不能让普通党员知晓。直到国民党日薄西山的1949年4月，旅大区党委才将莫斯科最初内定的大连市长迟子祥从政权里清除出去，此人在1951年以美蒋特务罪被处决。

战斗在国民党监狱里的党组织

1928至1937年，黄埔四期的共产党员李逸民在国民党监狱里捱过十年，以独特视角见证一段历史。他们在上海的监狱内建组织，1929年元旦前发动绝食要求改善伙食，每周供应二两肉和一个咸鸡蛋；允许每两周给家人写一封信，每周允许亲友探监一次。

政治犯和刑事犯一起喊口号、敲打各种物件，半夜党员齐唱《国际歌》。翌日 记者群涌而至，国民党很难堪，派宪兵用棍子镇压。不久，监狱伙食和生活条件改善不少，允许购买国内出版的任何书籍。实际上，地下党一直以互济会名义通过送物资和接见时机来传达指示，还能把每期地下党刊物送入监狱。狱内不禁止马克思主义学术书籍。他被转到苏州的监狱，物质生活水准下降，党组织仍活动有效。1931年他 们再次发动绝食并获胜，监狱立即供应充足的新鲜蔬菜。他们在此遇到托派分子郑超麟等人，与之对骂，以众击寡获得胜利。李逸民随后被转到南京的监狱，他读了大量古籍、马列主义著作、国内外进步主义的小说，还学会了英语。他根据英文报刊描绘出红军长征路线，被国民党发现后遭罚打5下手心。国共第二次合作，李逸民在内的所有人获释，他感慨监狱真是一所学校。

法国大革命改变巴黎餐营业


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攻陷巴士底狱。

一定程度上，法国大革命催生了法国餐营业的繁荣发展。1789年前，受同业公会的保护或曰限制，只有特定的包办伙食的人、小酒店老板，才有资格为家里没有厨房的巴黎人送餐。巴黎的餐馆只供应肉汤和浓菜汤，这两种汤被用于提神、治疗呼吸道疾病。人们都说，出门去餐馆撮一顿是为了恢复元气。

大革命破坏了社会旧秩序，同业公会的不合理规定被推翻，巴黎餐馆们去掉了最大束缚。新市场蓬勃发展，一方面是各有特色的外省厨师涌入首都；另一方面是贵族们手艺精湛的家庭厨师失业了，他们纷纷投身为大众服务的餐营业，巴黎一时间落成许多新式餐馆。不过，汤仍然是主菜。大革命的思潮赋予汤新的意义，汤代表民主，所有人从共享一种食物开始进食。

三千日本卫生技术人员在四野

3000多名日本卫生技术人员，在战后被东北民主联军留用。他们大多来自日伪时期东北的铁路医院、工矿医院、市和县立医院、红十字会医院、农业开拓团的医院、医科院校、制药厂、卫生技术厂、关东军的医疗单位。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政治部为稳定人心，除了做大量安抚和说服工作，在生活上给予很多优待，甚至禁止中国人和日本人结婚。

野战军卫生部成立后，设立民族科，日本人任科长，在日本人多的单位设立民族干事。日共的日本人解放同盟，对留用的所有技术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仅仅是卫生领域的日本人，就为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在东北的精锐部队立下大功。1948年11月，1400多名日本卫生技术人员随东北野战军入关，他们参加了平津战役，此后一路南下华中、华南，直到海南岛。在湖南和江西，四野大军发生了大批传染病和中暑现象，日籍人员出色完成工作。回国后，许多人成为促进两国友好的积极分子。周恩来在1956年接见日本红十字会等团体时说："我们很感谢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人员参加了解放战争"。

国民党的民主专政

1938年，一位署名"孔圣裔"的作者，发表了一篇名为《一党专政与民主》的文章。

文章称，苏俄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治，乃是用强迫的手段来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而过渡到"民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唯一手段。与之相应，国民党的专政，乃是由封建专制的社会转移到真正的民主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必需手段。作者还提出，国民党的专政不限于这个党，而是由赞成三民主义的一切国民来实现。"所以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就是国民的民主专政，就是国民革命的民主专政。"

至于其他党派的价值，作者说："在抗日救国战争的时代，它的一党专政，则是打倒帝国主义实行民族主义所应然而且必然的民族革命专政。"救国要紧，而救国又是国民党的任务，那还有哪个党能有与此不同的任务呢？因此，作者认为在国民党之外的"各党既没有特殊的任务，就无特殊组织之必要"。

中国为轰炸东京付出惨重代价



1942年4月18日，大黄蜂号航母满载B-25轰炸机准备对东京进行轰炸。

1942年4月，杜立特率16架B－25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发动了对东京的空袭。日军情报部门后来获知，美军B－25轰炸机以往都在衢州、丽水、玉山三个简陋机场加油。为摧毁美军在华空军基地，也为报复帮助美军的中国人，日军发动了浙赣战役。日军动用4723名工兵、34461名步兵，以及17072名苦力、39993名俘虏，对机场进行了两个多月的破坏。在衢州机场，日军挖了32000米长的壕沟，引入河水，使机场变成了烂泥塘。在丽水和玉山机场，日军分别挖了4300米、676米的壕沟后，又将全部泥土运走，以防中国回填壕沟。

更大的报复行动是针对中国平民的。当初美军飞行员为答谢中国人，赠予他们的匕首、太阳镜、手套等礼物，都成为日军追索的目标。日军对持有这些物品的中国人严刑拷打，要求他们交代飞行员的去向。曾收留过飞行员的马英琳（音译），被日军士兵用毯子包裹起来，绑在椅子上。日军给毯子泼上煤油，让马英琳的妻子用火点燃。在整个浙赣战役中，共有约25万中国人被日军杀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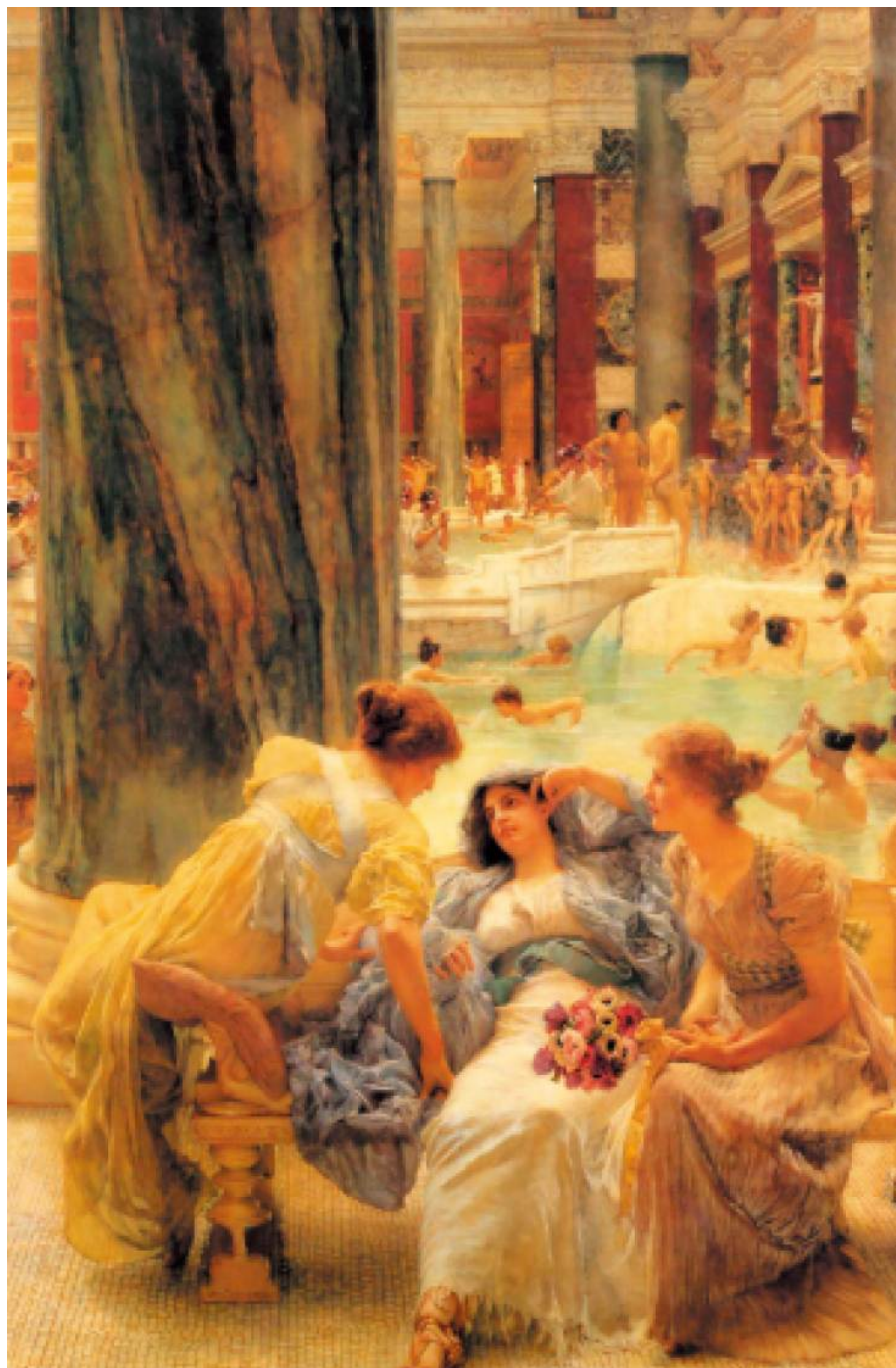
波兰骑兵砍坦克的真相


1939年9月，二战中对抗德军的波兰士兵。

1939年9月1日，负责掩护波兰军队向东撤退的波军第18波美拉尼亚骑兵团发现了一批正在休息的德国步兵，其指挥官当即决定：带两个中队，约250人的兵力突袭，以出敌不意的反击来打乱敌军进攻的套路。这次作战是成功的，德国步兵被冲散，德军的前进步调也因此放缓，波军的两个营都抓住这一机会撤到了后方；而德军军营的慌乱甚至要德装甲兵第19军军长古德里安亲自出马整顿。

德国人在战场上的不利，意大利人在宣传上帮他们超额挽回。一名意大利记者妙笔生花，描述波兰骑兵是“挥舞马刀，举着长矛冲向德国坦克”，他刻画的滑稽形象为后来的纳粹宣传部门多番完善，比如声称发现波军宣传资料上说“德军坦克只是表面包了金属片”。二战后，纳粹的宣传成果又为苏联宣传部门直接利用，“骑兵砍坦克”的传说就这样又被续命几十年，直到90年代，美国一些历史教材上仍能看到它。

欧洲中世纪的男女混浴



《古罗马温水浴室》，阿尔玛·塔德玛作于1881年

公共浴室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象征，以至于令人们普遍抱有一个错误观念：帝国覆灭后，公共浴室在西欧消失了。这种观念流行到了丘吉尔也相信的地步，他认为在罗马灭亡到近代之前的漫长岁月里，“甚至最幸

运和最显贵的人们也无法摆脱肮脏和寒冷之苦”。

事实上，中世纪并非没有公共浴室，教会也并不禁止人们洗澡，教宗格里高一世还专门答复过他对此的态度：“如果是出于保护身体的需要，那我们甚至在星期天都不应禁止沐浴。”1292年，巴黎一城内便有26个公共浴室。

不过，公共浴室的形象确实在中世纪逐渐走向败坏。一个原因是泛滥的男女混浴，让浴室慢慢地被等同于妓院；另一个原因是公共浴室的经营者还顺便行医，拔火罐是几乎必备的手艺，有的还做外科手术，低下的医疗成功率让他们中的大多数被视为骗子。真正毁掉公共浴室的还是传染病，15、16世纪梅毒盛行，公共浴室正是一个主要传染源，当时的人们认为，疾病会从洗澡水通过皮肤进入身体，便开始禁止洗浴，直到启蒙运动兴起。

英国近代的“卖妻”风俗

在近代英国，可以见到丈夫用缰绳或丝绢套住妻子，拉到集市公开拍卖的奇怪现象。这种“卖妻”风俗的真实意味并非将女人视为财产，而是中下层英国人实现离婚的一种手段，名为“拍卖”，实际买家早已定好——就是妻子的新情人，他花几先令或几便士的象征性价格，把原来的夫妻关系“买断”。

之所以采取这种折衷做法，原因在于宗教改革后的英国圣公会仍没有允许离婚，连1720年国王乔治二世的离婚案也以不了了之收场。当时，唯一可行的法定离婚途径是通过议会判决，但程序繁琐、费用高昂，整个18世纪，全英国只有130起离婚案，其代价远非一般人可以承担。

有趣的是，“卖妻”离婚被广泛应用成为一种惯例后，也就成了人们拥有的权利。某地方官员曾试图阻止这种买卖，却因为“理由不充分”失败了，他的解释是：“它建立在人民保持着的一种习惯上，或许剥夺他们的这种权利将是危险的。”

伦敦曾是肮脏都市



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伦敦早期风貌的版画。

与同时期巴黎一样，14世纪的伦敦也是一个肮脏的都市，动物内脏和腐肉、人畜粪便在内的各种垃圾堆满在马路上，空气充满恶臭。这一幕主要是人口暴涨促成的，位于泰晤士河口的伦敦是一个贸易集中地；同时国王颁布特许状允许伦敦城外的农奴一旦在城内住满一年零一天，就能成为自由人。当伦敦人口从1700人升到10万人，城市的公共卫生措施却无法同步发展，居民又缺乏卫生意识，如习惯把屎尿倒窗外。

居民开始不满肮脏的环境，市政府创造了垃圾工、路面检测员和掏粪工这三种职业，亦有法令惩处危害公共卫生的行为，但无法彻底解决。直到1348年席卷欧洲的黑死病带走一半伦敦人口，还逼许多人逃往农村，人们才开始重视城市卫生。市政府在骤降的人口密度上重新规划城市发展、加强管理机构的建设、健全有关法律、加重惩罚违法者……伦敦的城市卫生终于脱胎换骨。

座山雕被捉时手下只有二十几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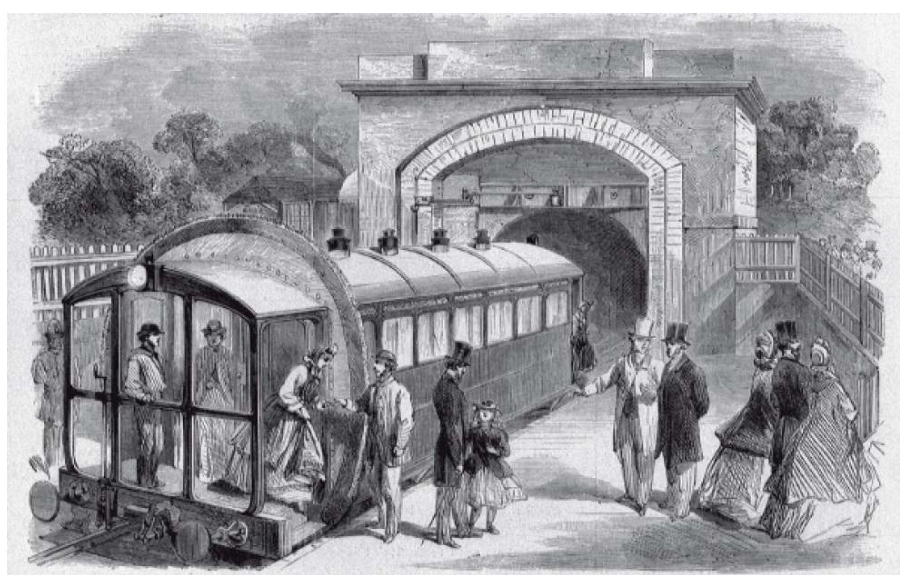


电影《智取威虎山3D》中座山雕剧照

座山雕本名张乐山，在东北当了四十多年土匪。他先参加抗联，后投靠国民政府，当上了“东北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国民政府许诺，若座山雕打下牡丹江，就由他做卫戍司令。此后，他“极残忍地杀害我干部和积极分子，破坏土地改革，经常利用夜间突然袭击，包围我村镇，抢掠、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并“妄图同其他股土匪一起，配合国民党的正面进攻”。

1947年，中共在东北的剿匪工作已近尾声。座山雕被杨子荣活捉时，住在山上的窝棚里，手下仅剩24个人，以及6条枪、640发子弹、1000多斤粮食。经大会公审，座山雕被判处死刑。但是死刑尚未执行，座山雕就因肺炎死于狱中。据说死前他对看守所长说：“我的罪恶实在大呀，还给我请医生看病，我有愧啊！”

最早的拥堵和最早的地铁



这张1864年的版画描绘了伦敦市民在水晶宫地铁站乘车的情景。

1850年，伦敦人口超过了250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其中，150万人是在短短50年内增长产生的。稠密的人口使伦敦变成了历史上第一个交通拥堵的大城市，尽管当时还没有发明汽车，堵在伦敦街上的，是公共或私家的马车们。人为立法也是造成拥堵的原因之一：由于议会禁止在伦敦市中心修建火车站，伦敦几个车站都建在了郊区。

一位名叫查尔斯·皮尔森的律师觉察到伦敦市区工人对乡村居住环境的向往，并敏锐地意识到降低公共交通成本的意义与商机。他决定修建一条“运作于地下管道的铁路”，在花了数年时间说服议会批准后，皮尔森又用了近10年来筹资和建设。1863年1月，世界上第一条地铁，从伦敦市帕丁顿到法灵顿的线路通车了，当天，38000人搭乘了它。这时，电力还没有被商用，伦敦地铁使用的照明设备为煤油灯，车厢是木制的，动力则是一路喷发烟雾的蒸汽机车。

澳大利亚情报首长之死

澳大利亚情报局是情报界的小字辈，但自上世纪50年代成立以来在亚太地区颇有表现，曾参与制止印尼与马来西亚冲突、打击菲律宾“新人民军”武装等行动，并在英美无法出面的地区建立情报站代替军情六处、中央情报局开展情报工作。

和其他情报机关一样，澳大利亚情报局也发生过至今未破案的暗杀事件。1970年，曾任该局局长8年、卸任不久的澳军少将考素恩被发现死在墨尔本的一家土耳其浴室里。他没有将去浴室的事情告诉家属，在

浴室里登记的也是化名。年初，他曾在街上遭到野蛮袭击，被殴打住院却不知行凶者是谁，而这一次他为什么会化名到一家浴室并死在那里？至今还没有破案。

汪精卫之死

伪政府首脑汪精卫早在1944年3月便因健康恶化，“发热五十余日，不能起床”，前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诊治，经过半年多治疗，病情始终不见起色。1944年11月9日，美军空袭名古屋，汪精卫被连人带床塞进升降机急降到地下防空洞内躲藏。洞内没有供暖设备，寒气彻骨，汪精卫病情因此恶化。第二天早晨，汪精卫“高烧达到40.6度，脉搏增至每分钟128次，呼吸困难，食欲全无，人亦陷入昏迷状态”，到下午4时20分撒手人寰。

11月12日，汪精卫遗体被护送回国，所搭乘的“海鹈”号飞机在南京明故宫机场降落前，又遭遇美军侦察机掠过，一时防空警报大响，最后还是安然降落。事后有人评论，如果“海鹈”号被美军击落，那可真是“精卫填海，终成冤禽”了。

现代史上亲手杀人最多的人



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布洛欣

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布洛欣少将，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首席行刑员，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列为“现代世界历史上亲手杀人最多的人”。他前后亲历雅戈达、叶诺夫、贝利亚执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三个阶段时期，共亲手处决了9000多人，他还处决了雅戈达和叶诺夫。“卡廷事件”中，他在28天内用手枪杀了7000多人，为此在1940年被最高苏维埃授予红旗勋章，达到人生的辉煌点。

在超高强度工作的“卡廷事件”里，布洛欣工作时总是围着屠夫用的

皮围裙，戴着长及肩膀的橡胶手套，用德国PPK手枪重复射击动作。1953年贝利亚被捕后，他被强令退休并被剥夺军衔。受重大打击的他从此消沉不起，整日沉迷于酗酒，1955年自杀，时年仅60岁。

爱尔兰民族英雄死于内战



迈克尔·柯林斯于爱尔兰斯基伯林发表演讲，摄于1922年4月至5 月。此时距他被伏击阵亡不到半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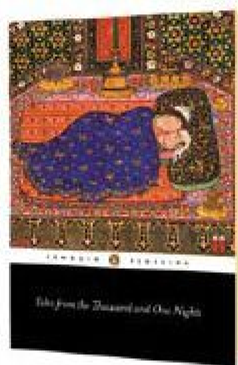
迈克尔·柯林斯，1890年出生于爱尔兰科克郡一个富裕农民之家。从16岁起，柯林斯加入了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和爱尔兰新芬党，1917年成为新芬党领导人之一。柯林斯改变了爱尔兰独立运动曾经所遵循的以鲜血警醒国人、盲目发动起义的行为。他组织了“飞行纵队”，用游击战、暗杀、爆破等方式打击英国人。

1919年，英爱战争爆发，柯林斯是爱方主要将领。战争结束后，他参与对英谈判并签署协议：爱尔兰南部26郡成立自由邦，仍向英王宣誓

效忠，北方6郡则归属英国。这是爱尔兰独立的开始。这一协议虽被爱尔兰议会通过，却遭到爱尔兰共和军大部分成员的反对。于是，在1922年，爱尔兰内战爆发。

柯林斯被迫和自己的同袍们作战。1922年8月22日，他在自己的家乡遭到伏击，在战斗中，他成为唯一的阵亡者，年仅31岁。虽然死未得其所，但柯林斯受到了自己的国民的爱戴和敌人的尊敬。他去世后，有上万人自发送葬。2012年，英国曾有一次“最伟大敌方指挥官”评选，他名列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国父华盛顿。1995年，好莱坞推出了由连姆·尼森、朱莉娅·罗伯茨主演的展现柯林斯传奇一生的电影《迈克尔·柯林斯》（中文名《傲气盖天》）。

《一千零一夜》曾是黄色作品



阿拉伯童话集《一千零一夜》是一本老少皆宜的书，很少有人知道，它最初是部黄色作品。作为一部集体创作的民间文学，它汇集了当时商贸繁荣的阿拉伯城镇里流传的荤段子。18世纪初，法国东方学家加朗翻译了一部叙利亚的手稿，同时加塞了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一千零一夜》第一次传入欧洲。在一个流行童话的年代，来自东方的故事从贵族沙龙走向全民，它还在欧洲社会掀起了阿拉伯文化热，人们从穿着打扮到家装、肖像画、饮食上，纷纷模仿阿拉伯范儿。

西方对此书的批评从来没歇停过。如1711年一位欧洲贵族批评它对女性读者诲淫诲道，激起了女性崇拜一个推崇黑魔法的神秘民族。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书里有关性的内容让保守的英国人震惊不已。于是，英国的阿拉伯文化研究学者爱德华·蓝恩制作了一份最早的洁本。在原产地之一的埃及，书受到更多争议，甚至在1985年还一度被道德法庭宣布为淫书而遭没收。埃及文化界强烈抗议，指责这是亲手摧毁本民族的文化遗产，禁令最终被撤回。

清廷悬赏杀洋人



法国《小日报》的版画描绘了义和拳冲入教堂杀死神职人员的场景。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1900年6月21日），北京城内的义和拳闹得正凶，慈禧太后突然假借光绪之名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匈等十一国同时宣战。宣战后不久，大学士徐桐等人奏请慈禧下诏，“无论何省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为了鼓励大家多杀洋人，清政府还给出了赏金，据北京街头的官方告示，赏金的标准是，“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

时任山西巡抚的毓贤，杀洋人十分积极。某日，他以“集中保护”的名义，把山西省内的外国传教士四十余人全部“请”到了他的府衙内，然后将他们剥掉上衣，在府衙前的广场上一一砍头。这次屠杀，毓贤一共杀死外国传教士及其家属共46人，其中包括15个男人、20个女人和11个孩子。

日本专家保障四野的油料供应

国共战争初期，挨着朝鲜和苏联的延边根据地需要尽一切力量为前线提供物资。延吉化工厂开始生产机步枪的润滑油、汽油、灯油，全提供给林彪部队。但技术薄弱导致事故不断，最大一次意外是整个延吉市都能听到的干馏炉大爆炸，三个正在炉边的日本工程师身亡。中方举办了追悼会，中方厂长致悼词："他们是新中国建设事业中值得尊敬的烈士。我们一定要继承日本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生产出更好的产品，支援前线，建设新中国。"

随后，20多名日本专家和技术员从大连被招聘过来。工厂的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各车间和研究室的技术主任多为日本专家。中日紧密合作，经过技术攻关，他们成功开采了桦甸的页岩油，产量大增，有力帮助了四野胜利攻占整个东北。在工作之外，日本专家还在夜校里为中国职工讲授化学和数学知识。

中世纪贵族的斋戒

中世纪的欧洲教会规定了相当频繁的斋戒，大斋期的六个星期，每周星期五、星期六——对于某些家庭还包括星期三以及某些重要节日前夕，都禁止食用肉类。

对于穷人而言，这不算什么艰苦的任务，反正肉食也不是天天能吃上；但享受惯了的贵族，绝不愿意轻易就断了口福。于是，无论僧俗贵族，除了奉行苦修的人，都将鱼类默认为"素食"，以充作斋戒日的主菜。亨利五世和他妻子凯瑟琳的餐桌上更是包含了鲤鱼、螃蟹、鳟鱼、龙虾、狗鱼、大马哈鱼、鳗鲡、海豹、七鳃鳗、鼠海豚，从日常鱼食到奇珍异味应有尽有。

因此，拥有淡水鱼塘，在中世纪的英格兰会被视为身份的象征。作家乔叟笔下的暴发户富兰克林，为招摇显摆，掩饰自己出身，不但修建了华丽的庄园，还特地挖出一个大鱼塘并炫耀自家养殖的昂贵淡水鱼。直到15世纪，贵族开始将鱼塘承包给专业养殖户，这层身份意味才逐渐淡化，又过了约两百年，它才从人们的观念里消失。

闭关锁国的早期巴拉圭



弗朗西亚

1814年，巴拉圭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其国父弗朗西亚建立起独裁统治，并把这个国家与外界隔离，使之成为美洲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隐士王国。

弗朗西亚的统治基础是占该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印第安人对他的崇拜。印第安人称他为“至尊”，对其盲目服从；他也像慈父一般关心着印第安人的生产、生活，极力鼓励印第安农业和手工业，引入小麦、棉花教他们种植——这也是巴拉圭顺利减少对外贸易所必需的。另一方面，他把教育看作印第安人中间的一种捣乱行为，不让印第安人学习任何文化知识。

白人和教会则被弗朗西亚视作潜在威胁，巴拉圭的闭关锁国政策也正是为了防止这些群体获得外援来颠覆他的政权。他没收教产，禁止巴拉圭天主教会效忠罗马，也将白人的农场收归国有。弗朗西亚还组织了秘密警察来逮捕审讯那些反对他的人，为节约子弹，他处死的大多数受害者都是用刺刀刺死的。

建国初期的苏联花布

上世纪50年代初，中苏关系极为亲密，中国各地政府不仅大肆宣传“中苏友好”、“向苏联学习”，连苏联花布要行销中国市场，也尽力推广营销。

推销苏联花布的主要手段是干部带头，发动群众购买。也有一些地方强销意味很浓，山西汾阳青年团与中苏友好协会动员团员、会员，不分男女老少，每人至少要买一件苏联花布衣料。若有不肯穿花布者，会被批评是“跟不上形势发展”、“没有国际主义精神”，有些不愿穿花布的男性，被冠以“思想落后”的帽子。

一方面要推销苏联花布，一方面又要抨击美英日等国倾销纺织品破坏民族工业，为了将其中逻辑理顺，1952年第五期《时事手册》还专门分析了其中区别：“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发生生产过剩的病态，因此也不需要向国外倾销商品……如果我们多穿了一尺苏联花布，苏联人民就会少穿一尺花布，苏联人民这种克己助人的精神，是十分令人感谢的。”

太平天国“王爷”泛滥



太平天国草创时，除了天王外，仅有“东、西、南、北、翼”五王。后来愈封愈多，昭王黄文英供称，“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后来就乱了，由广西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以至四五年间封了“二千七百多王”。可笑的是，太平天国中有几千个王爷，但没有一个姓王的百姓。原来《钦定避讳字样》规定，“不得单称王

姓”，于是姓王的人只好改姓汪或黄。甚至“周文王”都被改作“周文狂”

在太平天国，这种改写比比皆是。“唐太宗”成了“唐太侯”，把“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子不远千里而来，将以有利于我国乎’”，改为“孟轲见梁惠相，相曰‘叟，不远千里而来，将以有利于我郭乎’”。由于洪天王禁酒，古书里的“酒”也改为了“茶”。

大清官员：征讨日本必胜

甲午战争前，曾有不少大臣主张“征日”。如日本侵略台湾时，江苏官员陈其元献“围魏救赵”之计，请朝廷出兵日本本土，使其自救不暇。日本吞并琉球，时为甘肃学政的陆廷黻上“请征日本以张国威折”，称日本仅“海东一小岛耳”。

上面这些人堪称“爱国”，但对中日两国国情都缺乏了解。他们有的人甚至将幕府将军当做日本国王，想象“自美加多（即天皇的音译）篡国，废其前王，又削各岛主之权。岛主失柄而怀疑，遗民念旧而蓄愤，常望有事而蜂起”。张佩纶还说，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债山积，以纸为币；每兴劳役，物价翔贵，众怨沸腾”，断言“其贫寡倾危，国势若此，实难久存”。

在他们看来，日本革新后崩溃在即，一旦“天威所至，有不倒戈相向者乎？”不久后甲午战争爆发。

学运领袖如何对付学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各大中学校纷纷罢课，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政府兴兵抗日。在南京还发生了学生捣毁外交部、殴打部长王正廷的事件。国民政府要求各学校拿出办法来，中央大学教授何浩若挺身而出，发起“义勇军十人团”，号召学生为抗日做准备，以十人为一组开展军训、长跑、野营等活动，得到学生热烈响应。

但中央大学地下党员汪季琦回忆，发动学生运动的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和中大党支部开会时认为，“自从何浩若提倡搞十人团以来，原来运动的矛头指向国民党，现在不同了，不但游行没有了，连上街宣传抗日也少了。大家忙着搞操练、搞野营，十个人一团，互不通气……这样，学生运动要无形瓦解”。殊不知，何浩若是五四运动时的清华学校学生代表，在组织学运上早有丰富经验，用来破解学运自然手到擒来。

八国联军占北京时的国人心态


1900年11月28日，北京城内的八国联军军队。

从1900年7月攻破京城，到次年6月撤离，八国联军在北京城内驻扎了近一年时间。光绪、慈禧两宫出狩，京城的治理系统也为联军替代，由各国分段而治。对这种统治，京师普通民众多以实用主义心态处之，从最初的惊惧，变得对英、美、日等军“莫不同声感颂”。有民众集资，捐送万民伞给三国统帅钦差，“以表谢忱”。美国军官特尔森赠予小米若干石请绅董赈济贫民的善举，更为他获得一“美界知府”美誉。

京城士人的心态则要复杂得多，他们既为外人统治感到屈辱，却又不否认部分联军的治理。翰林高记载过一场典型的士人争论，最能反映他们的心理。争论因传闻“美官将归”，美军辖区将并入德管，区内居民集体挽留美军而起。士人黄石生觉得“留美官即背本朝”。士人乔茂萱则认为：“如洋兵要走，而留美兵，尚得谓为背国；若畏德人将管美界，而留美以拒德，则未为非也。”另一位称“九愚”者亦附和乔说：“如美界将

还国家而留之，则大不可；如要让德，留之何不可，况为商民乎？”

匈奴王子冒顿的“洗脑术”



描绘冒顿的左国顺油画作品《草原雄鹰》。

冒顿是匈奴单于头曼的儿子。当初，他还是太子时，头曼单于为了给宠爱的小儿子空出太子之位，就把冒顿送到邻国月氏国做人质。冒顿前脚刚到月氏国，头曼就出兵攻打月氏。好在冒顿比较英勇，硬是从月氏国逃回了匈奴。头曼比较意外，但也赞叹儿子的英勇，就给了他一万兵马，让他当起了将军。为了报仇，冒顿发明了一种叫作“鸣镝”的响箭，并下令道：“我射哪里，你们就射哪里，否则斩首。”

打猎时，冒顿射野兽，有不跟着射的，立即被斩；在训练场，冒顿突然射向自己的坐骑，有人恍惚了一下，没射，立即被斩；一天，冒顿的响箭射向了自己的宠妾，有人以为冒顿疯了，没射，冒顿照例杀了他们，这一次，对将士们的震动比较大。所以，后来冒顿射杀头曼单于的

坐骑时，大家都跟着射了。冒顿觉着洗脑成功，于是在打猎时，射杀了自己的老爸。部下们也跟着射，万箭穿身，头曼单于立即变得如同刺猬一般。

中世纪英国农民的伙食



中世纪欧洲农村集市。

14世纪是英国农村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世纪，这一百年里，出现了肆虐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不断上涨，英国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因此加速提升，吃细粮、吃肉、喝酒，对他们而言不再是太过奢侈的享受。

一处名为塞吉福德的庄园保留着这时期收割雇工的伙食记录。这份记录显示，13世纪到14世纪初，雇工的面包还基本是大麦烤制的；此后，小麦和黑麦的比例逐渐增高，到1387年，大麦就完全地消失了；接着，小麦又开始挤占黑麦的成分，直到1407年，面包完全由小麦烤制，账单上外购的面包也被称作了“白面包”。

肉的地位也与日俱增。13世纪，庄园为雇工提供的荤食还以乳制品为主，肉只占很小的比例，并且是腌肉。进入14世纪，肉的花销从不足10%增加到了30%左右，新鲜肉也出现在雇工的餐桌上；相应地，乳制品所占比例则越来越小。不过，到15世纪初，肉的花销比例又开始下降，因为酒变成了伙食里最花钱的东西，记录的最后一年1424年，41%的费用是用于雇工喝酒，刚好跟记录的第一年1256年的面包费用占比相同。

黑死病往往被认为是农民生活改善的根本原因，但塞吉福德的记录

显示，改善在那之前就已开始，黑死病造成的劳动力锐减只是进一步加速了这个过程。

谁编造了元朝初夜权的传说

自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各种元末农民起义的传说被编造出来作为反清宣传。“以月饼密传反元讯息”、“除夕杀鞑子”、“十家养一鞑”的传说都成形于这一时期。然而，比较令人发指的说法，如“剁掉汉人男婴的右手拇指使之不能挽弓”和“蒙古人享有汉族女子初夜权”这两种，则是清朝后期的蒙古人自己发明的。

这两个传说的最早文字版本见诸天主教传教士、蒙古学家田清波在鄂尔多斯的记录。在蒙古人的民间故事里，奴役、压榨汉人的是蒙古喇嘛而非军人，“每十个汉人的家庭都安插一位喇嘛”，这十户人娶新媳妇时，得先把她送到喇嘛那里过一夜，而后才归她丈夫。这样的耻辱和伤痛成了汉人奋起反抗的动机，而喇嘛的头颅和肝脏则最终被汉人拿去祭拜了月亮。

这套说法当然不是历史事实，元明两代官私史志随笔均无记载。不过，它也不算凭空捏造，喇嘛教和婆罗门教曾将童贞视为邪恶之物，西藏、西夏、印度和东南亚都曾有过婚前需请僧侣挑损处女膜去邪的习俗。这虽然是神圣的宗教仪式，但也不乏僧侣违规行交媾之事的流言。处女权一说，即是蒙古人附会这类流言，又将它安到了汉人的头上。

被删除记录的雍正遣使俄国

在沙俄的外交档案中，有两次雍正年间遣使俄国的记录，出使规模甚大，商讨的问题也相当重要。但蹊跷的是，这两次出使记录在清朝官史只字未提，连民间记述也是到了清末才有出现。

从俄方记录看，清使非常慎重谦逊，完全把俄国当做一个平等邻国在尊重。清使到莫斯科，携带珍贵的银貂、锦缎等礼物，使节还对安妮女皇行三跪九叩大礼；俄方也不怠慢，同样回赠锦缎、貂皮多件。双方商讨的问题解释了清朝的这等态度：清使一是希望俄国在清军对准噶尔的讨伐中能够合作或中立；二是希望能接触迁居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落。俄方对清朝前一个要求表示谅解，对后一个则婉拒。除此之外，还有希望通过俄国中介出使土耳其等奇怪请求，后来并无下文。

清朝官方抹消这段历史的理由自然不可考证。比较合理的推测是，乾隆在位期间，终于击溃了准噶尔这个历经康、雍两朝讨伐都未灭的心腹大患；土尔扈特也已经回归，再留着这些过去有求于人的记录，实在

于乾隆的“十全武功”有碍，何况与俄国也长期相安无事，索性就把那些“无价值”的档案抹掉了

苏武成为忠诚典范源于政治斗争



刘大为作品《苏武牧羊》

苏武牧羊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其志节不屈的精神千百年来为人所称道。然而，苏武作为忠诚的典范，却是源于汉朝宫廷的政治斗争。

苏武在匈奴二十年持节不降，算得上惊天地泣鬼神。但当他回到汉朝后，并没有得到很大的表彰，朝廷对他甚为冷淡。这是因为此时汉武帝已死，霍光辅助昭帝执政，正要一改武帝穷兵黩武的政策。苏武虽然忠诚可嘉，但却并不受当权者重视。而武帝所指认的另外两位辅政大臣上官桀和桑弘羊不满霍光专权，欲将其扳倒，于是大造舆论，为苏武鸣不平，苏武这才被赐予典属国官位。而霍光很快对反对派进行铁腕镇压，处死上官桀、桑弘羊，苏武被牵涉其中，也差点丧命，其子被处死。终霍光执政期，苏武几乎被人遗忘。

直到汉宣帝即位，霍光病故。宣帝为修复被霍光所破坏的君尊臣卑的秩序，修正霍光时期的政策，更为突出臣子忠节的可贵，才将苏武抬出立为标杆，将其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

卡帕摄影名作“战士之死”系摆拍


罗伯特·卡帕的名作《战士之死》。

美国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的名作《战士之死》，捕捉了1936年西班牙内战时一共和军士兵中弹倒毙的瞬间。照片翌年登在《生活》杂志上，激起欧美左翼力量与佛朗哥战斗的意志。卡帕有名言："真相是最好的照片，最好的宣传。"然而，这一名作在问世之初就被质疑真实性，因缺乏底片而死无对证。

今天，卡帕在同一地点拍摄的共43张照片已被公诸于世，后人在此基础上利用计算机CG技术、卫星数据结合实地查看，证实了照片并非卡帕那台相机所摄，该士兵只是被绊倒在地而已。43张照片里共有十多个士兵，《战士之死》的主角也生龙活虎在其中，他的白衬衫还尤为显眼。它们皆非摄于战斗中，因为人们站立射击的位置违反常识，步枪都未做好射击准备，该地在拍摄当天未发生过战斗。通过精确的建模和计算，好事者发现原来是卡帕的女友拍下这幅名作，当时她离卡帕1.2米，拍摄时间比卡帕所拍的另一张照片慢0.86秒。

留恋帝制者终成笑柄



辛亥革命后，留恋帝制的人还大有人在。山西举人刘大鹏在日记中称，辛亥之变后，“今处无主之世，逆贼纷扰，窃据神器，置我皇上于闲散之地，共举贼臣为大总统，号令天下……”革命党是刘大鹏眼中的乱臣贼子，袁世凯则是大清叛徒。他还瞧不起那些“变节”做了民国官的人：“乃何以素有声望之人，位至二三品大员，亦忘君，竟随袁贼争权夺利”，这些人“赞治民国，廉耻之道丧，可谓极矣”。

民初拥护帝制的人，无不想要清帝复辟，甚至有人寄希望于袁世凯“还政”。劳乃宣很“贴心”地说，“袁之中心，未忘清室，彼对故主，以优待之，不敢冒渎尊严”，只是因为“约法既存，不能昌言复辟，且幼主

年方冲龄，不能亲视万机”，袁世凯才暂任大总统，等待“大政奉还”的时机。谁知没过多久，袁世凯不仅自己当了皇帝，还让溥仪废除帝号，降为“懿德亲王”，让出紫禁城。劳乃宣等人的一番苦心，最终成了笑柄。

驱逐溥仪 意在夺财

1924年，鹿钟鳞、张璧奉冯玉祥之命，驱逐溥仪出宫。曹汝霖在回忆中说，他们趁机在紫禁城“劫掠宝物，以军用大卡车，运载而出，万目睽睽，人所共见，无可掩饰。”据说张璧见桌上有一个钧瓷花盆，里面种着菊花。他知道钧瓷珍贵，就对随行的警卫说：“这菊花是好种，给我带回去。”鹿钟鳞则看上一个翡翠瓜，故意把帽子盖在瓜上。随从会意，就捧着翡翠瓜和帽子对鹿说：“您忘了戴军帽了。”鹿钟鳞回答：“很热，我不要戴，你拿着吧。”

李鸿章的孙女婿杨圻也在其《江山万里楼诗词钞》中记叙，冯玉祥驱逐溥仪“意尤在得皇室财宝，命张璧、鹿钟麟勒兵入宫，露刃逐清帝后妃下殿，而籍其宫室财货。于是元明以来，三朝御府珍储，十代帝后珠玉宝器，以至三代鼎彝图书，九州百国方物，天府，宇宙韫闷，希世之物，无虑几千万万亿，至是尽载以出。荷戈断行人于道路，六日夜不绝，盖不知其纪极。”

英国19世纪缘何发生人口爆炸？



19世纪末，伦敦街头的繁荣景象。

1801年英国人口是1590万人，1901年为4150万人。英国人口在19世纪上半叶增长了1倍，在19世纪下半叶增长了75%。因下水道修建的普及，霍乱在1866年被扑灭，其他借助水传播的疾病也很快销声匿迹。天花在1853年被消除，因为国家实行强制接种疫苗。医疗技术、公共卫生的改进极大降低婴儿死亡率，延长人们的平均寿命。

随着化肥和休耕法的普及，农业产量增长迅速。北美谷物和澳大利亚冷藏肉类的进口，更是丰富了英国人的营养。茶叶、咖啡、蔗糖原先在英国是奢侈品，随着产量的提升成为大众消费品，同样增加了人们的营养摄入量。英国人每日卡路里的摄入，随着食品的多元化、低消费而普遍提高。饮食进步，使人更健康、强壮，这也有力促进人口增长。

道光初年的禁烟官员怎样看美国

1800年，清朝禁止鸦片输入，并宣布对敢于违法抗令者，最高可处死刑。尽管如此，鸦片贸易在地方官吏纵容默许之下，仍然在黄埔与澳门两地进行。有些官吏还亲自监视鸦片搬运，以便按箱收钱。1821年，两广总督阮元知晓这种地下贸易后，没有逮捕受贿官员治罪，反而上书奏请摘去广州总商伍敦元的顶戴，因为“夷船私带鸦片即能瞒臣等之耳目，断不能瞒该商等之耳目”，所以经理洋商的伍敦元“责任尤专”，“殊为可恶”。

接着，阮元又颁布示谕，说中国的鸦片吸食者、走私者及受贿官吏“依理而论，自然应负一部分责任”，但过错主要还是出自葡、英、美等国商人身上。他告示称这些商人若是公平守法之徒，远涉重洋前来中国，必得天佑，而“私贩毒物之辈，王法所不赦，鬼神所不容。”其中最可恨的是美国商人，因为“独美利坚国内少国王钤束，竟系船主自带鸦片来粤”。

“王莽改制”中的形式主义

王莽尚古，言必称《周礼》，代汉后进行了一系列复古改革。他尤其喜欢改名——以《周礼》为范本，把已经通用了几百年的官职、地名改成上古时的名字。比如，在中央官职中，他把大司农改名为羲和（后又改为纳言），改大理为作士，太常为秩宗，大鸿胪为典乐，少府为共工，水衡都尉为予虞，光禄勋为司中，太仆为太御，卫尉为太卫，执金吾为奋武，中尉为军正；在地方官职中，他把太守改为大尹，都尉改为太尉，县令改为宰；在地名上，他改得更加疯狂，据统计，全国103个郡国，王莽改名75个，1587个县，他改名730个。这些生僻的地名，连官吏都搞不清楚，以至于王莽在诏令中提到某地时，必须在新名字后面注上原名。

王莽还把改名的瘾发作在了外交上，他把“匈奴单于”更名为“降奴服于”，把“高句丽”国改名为“下句丽”国。其结果是，“东北与西南夷皆乱”。

明成祖生母问题背后的民族主义



明成祖朱棣自称为马皇后所生的嫡子，但这一说法争议颇多。从清朝到民国，后人针对他生母之谜的诸多说法，并没有停留于事实讨论，

往往为民族意识而左右。

最早利用朱棣生母问题做文章的是清末的蒙古人。《蒙古源流》等书籍皆称朱棣为元顺帝的遗腹子，说明军攻破大都后，朱元璋将顺帝宠妃收为己有，却不知此女已有身孕，后虽起疑心，仍钟爱如己出。这种说辞极为荒诞，但鸠占鹊巢的桥段恰能迎合蒙古人对元朝速亡的遗憾心理。

到了民国，傅斯年总结谈迁等前人研究，得出朱棣生母为妃的结论，非汉姓，或为蒙古人，或为色目人，傅斯年更相信她是高丽人。傅的文章引来了老师朱希祖的批评，却也持续得到了吴晗、李晋华、王崇武等多名明史专家的支持，在论战里占了上风。因为被刺激到民族主义情感，朱希祖一度怒斥傅斯年此说，与陈寅格“李唐为胡姓之说”，“同为诬辱之尤，淆乱种族，颠倒史实，杀国民自强之心，助眈眈者以张目，此不可不重为辩驳者也”。傅斯年的言辞则更有风度，他一直称朱希祖为先生，并引用亚里士多德之“吾爱柏拉图甚于余物 ,吾爱真理甚于吾师”。

洋商眼里的买办



武汉美国益生洋行员工与买办合影。摄于1910-1915年。

作为洋商与中国人之间的代理人或中间人，“买办”从来就不被视为一个光彩的职业。但实际上，根据洋商自己的记载，他们对中国买办的

品德是极为钦佩的。

买办对于洋商而言是不可缺少的，洋商与中国人之间的一切雇佣合同、洋行及其职员们的私人账目都由买办掌管，而洋行银库里的现银及贵重物品，也由买办管理。当时，中国还没有银行，在淡季里，洋行的银库可能需要存放百万银元以上现款，均归买办保管。身负如此重任、随时可以监守自盗的买办们几乎从未辜负过洋商对他们的信任，1800-1844年的近半个世纪里，仅1823年曾发生过一次买办挪用洋行款项的案件。

不过，诚实工作的买办很容易发家致富。虽然他们的年薪不过300银元，但从经手的业务中都能拿到抽成，只要工作勤奋有方，最后总是能攒下可观的财产。

清朝末年的西餐流行

清朝国门被西方炮舰打开后，西餐也随之进入中国，到光绪年间，在各大商业城市已颇盛行。当时，西餐尚属于奢侈品，食客主要是贵族和官员，如《淞南梦影录》记载上海西餐馆道：“比来贵游子弟，喜食英法大菜……下箸万钱，岂让何曾独侈者！”《京华慷慨竹枝词》中描述北京“六国饭店”说：“海外奇珍费客猜，西洋风味一家开。外朋坐上无多少，红顶花翎日日来。”

西餐潮流流行以后，国人亦仿效开设“番菜馆”；为迎合中国食客的口味，北京的西餐馆也纷纷引入了中式佳肴，如《京华百二竹枝词》吟道：“菜罗中外酒随心，样式高楼近百寻”，“华洋饮撰任人餐，到此随心有两般”。

后来，成都的食肆更是产生了中西合璧的菜品，在一份中餐菜单上出现“奶汤XX”、“如意X卷”等中菜西做或西菜中做的产物并不稀奇。而在晚清食谱大观之《调鼎集》里，“洋炉鹅”这种明显的西菜也被收录。

中国茶叶在印度


印度阿萨姆地区采茶人。

英国人迷恋上中国茶后一直试图引进种植。乾隆年间来华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被允许带走了一些茶树和种子，但移种到孟加拉后却没有成功。此后英国人多次在印度试验移植，都因为气候、土壤不佳和缺乏炒茶技术人员而失败。

直到19世纪20年代，英国人将气候适宜且有原生茶叶生长的缅甸阿萨姆地区纳入印度管辖，在此地种植中国茶树，并从广东请来茶叶工人种植和炒制，才生产出满意的茶叶。1838年底，12箱印度茶叶被送到英国，得到广泛的好评，拍卖价格从惯常的每磅1-2先令一路升到5先令。最后一批茶叶甚至以每磅34先令的高价被一位上校买了下来。到21世纪初，阿萨姆茶叶年产量达到20亿磅，是1839年产量的40万倍。

外蒙独立后欺压汉商

1926年，马鹤天前往已宣布“独立”的外蒙古考察。他看到，外蒙当局处处为难中国商人。如各旗向汉商摊派钱款，修建戏台，上演中国官吏陈毅（曾任北洋政府库仑办事大员等职）欺压外蒙百姓的剧目。外蒙地方政府强迫汉商去看，去看的交茶砖30块，作为门票；不去的和中途退场的要罚60银元。

有一个汉商，赶着2000头羊去上税，不知道自己的弟弟收账又赶回500头羊。外蒙税务部门来查，发现数目不符，罚了10倍税款。又有汉商买了1000斤马鬃毛，每斤价值不过3角，却要求按每斤5角上税。这个汉商被逼得险些自杀。马鹤天分析此中原因时说，“汉商从前太自由，蒙古革命后，关税自主，图增加财政收入，并仿效俄国，限制资本家，所以特别痛苦。”

苏联高官为维护权力，发动“八一九”政变



1991年7月12日，会议主席台上的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左）与戈尔巴乔夫。

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国防部长亚佐夫等发动政

变，软禁戈尔巴乔夫，宣称要“保卫联盟”。此前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的一次谈话，被亚纳耶夫等窃听。在这次谈话中，戈尔巴乔夫提出，“让纳扎尔巴耶夫出任内阁首脑……还谈到必须大力更新权力机构的上层领导班子——几位副总理，特别是要害部门的领导人。提出了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的具体问题——他们的退休问题。”因此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些人发动政变的原因，乃是“对失去个人权力的担心”。

以色列人的恐怖主义黑历史



1946年大卫王酒店爆炸案现场。

在当代阿以冲突中，阿拉伯武装时常会以恐怖袭击来给以色列人造成伤亡。然而，今天的恐怖主义受害者以色列，在建国前也曾实施恐怖主义，犹太民兵组织伊尔贡更是制造了阿以冲突史上伤亡最多的一次爆炸案——大卫王酒店爆炸案。只不过，他们针对的是英国托管当局。

伊尔贡策划爆炸案的目的在于报复英国当局对犹太代办处和犹太民兵组织的搜捕，同时销毁落到英国人手中的机密文档。1946年7月22日早上，炸弹被安置在英国当局秘书处及军方使用的大卫王酒店南翼。其后，在爆炸前约15分钟，犹太人按计划向酒店方面打去了警告他们撤离的电话。

遗憾的是，大概是因为那时假警报太多，一开始的警告电话直接被酒店总机接线员忽略了。爆炸前六分钟，才通过《巴勒斯坦邮报》以及警察通知到了酒店经理，但现场人员仍然没有撤离，直到他们发现炸弹，一切都晚了。爆炸共造成91人死亡、46人受伤，成为了现代以色列建国史上一个抹不去的污点。

改种姓的印度人



2009年，印度泰米尔纳杜邦，在棕榈树上作业的纳达尔人。

纳达尔人是印度南部泰米尔纳杜邦和喀拉拉邦的一个种姓，历史上大多以制造棕榈酒为业，在种姓制度里地位较低。

19世纪末，他们因为从事商业而提高经济地位后，对自己的低种姓地位不满，硬是游说当局在国民普查时将纳达尔人登记成了“刹帝利”。此举招致了原有的高级种姓不满，并引发一系列种姓冲突。此后，纳达尔人把更多精力放在了政治活动而非模仿高级种姓礼仪上，他们支持反婆罗门运动和正义党，并发现这种做法更有利于提升社会地位。

印度独立后，纳达尔人凭借对教育的重视和创业的传统，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因为印度宪法给予“落后阶层”诸多特权，他们又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游说政府把他们改回了“落后种姓”中。至今，纳达尔人仍位列印度中央和泰米尔纳杜邦的“落后阶层”名单里，享受着“落后”带来

的好处。

梦碎“卡累利阿共和国”



20世纪初，卡累利阿首府彼得罗扎沃茨克全貌。

1929年美国进入大萧条，众多人失业。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期的苏联号召芬兰人、芬兰裔美国人来新成立的卡累利阿共和国安家，史称“卡累利阿热”。苏、美工会租船把人从纽约带回来，苏联拒绝穷人，来者须带回成套机器设备。诱人宣传内容前，许多人卖掉了俄勒冈州和加州的房子，买贵重的新式电器和机械，拖家携口移民，或把钱寄到苏联。

现实很残酷，那里没有舒适的生活环境，也没有高工资，甚至连粮食都不够吃。他们一到列宁格勒就被政府无偿收走了带回国的贵重机械，许多人听从政府的意见上交了美国护照。没多久，大量移民不堪忍受恶劣的生存环境，步行穿越莽莽森林逃到芬兰找美国使馆帮助回国，后来边境被重兵封闭。待大清洗时代来临，很多人被枪毙，或被送入劳

改营。这场运动的失败，对芬兰、美国的左翼工人运动造成沉重打击。

秘密奏折制度的崩溃

清朝初年，康熙皇帝确立秘密奏折制度，在正式题本奏章之外，封疆大吏可在请安折中“将应奏之事，各罄所见，开列陈奏”，皇帝则以朱批一对一反馈，以达到“各省之事不能欺隐”的效果。雍正皇帝进一步将上秘密奏折的范围扩大到特准的道员、知府、副将等中级官员，经常要求各级官员在奏折中汇报上下级的行事和操守，作为考核升迁的参考，到了“凡有风闻之事，即行密奏”的程度。

雍正对奏折的保密要求极为严格，批示“密之一字，最为紧要，不可令一人知之”、“若不能密，不如不奏也”，在正式的题本奏章中也不准引用奏折和朱批的内容，对泄密的官员则给予申饬或者撤销其上奏的权力。到了乾隆年间，地方官员已经置保密要求于不顾，在上奏折之前经常相互串通，以求彼此无过。一次，乾隆皇帝发现云贵总督吴达善和云南巡抚刘藻对所属官员的评语大略相同，又抽出两人上一次的奏折，发现“亦毫无参差之处，殊属可异”，不禁感叹虽然督抚之间“贵乎和衷”，但“衷不可不和，而识见则不必尽合”，意见都商量好了再汇报，密折还有什么用？

平权法案曾加速“种族隔离”

平权法案被认为是美国黑人争取自由权利的重要一步，在此之前，美国南方的中小学校要么全是黑人，要么全是白人。上世纪60年代，教育部规定按比例招收学生，以实现黑白融合。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此举反而加速了种族隔离。

白人开始把孩子送往市郊和私立学校，因为家长们担心黑人学生的教育程度低于白人学生，在种族融合的班级，自己孩子可能会被耽误。到1984年的时候，美国最大的十个公立学校体系，有9个比平权法案出台前更加种族隔离化。

英国古代法院的神明裁判



反映残酷神裁内容的油画，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诺曼征服之前的英格兰法院存在很多奇葩的裁判方式，其中最让现代人感觉滑稽的大概要数神明裁判。

顾名思义，神明裁判就是把人断不出的案件交给“上帝裁决”。其形式共有四种：热铁审和热水审都是烫伤受控者的手，三日后观察伤口有无溃烂，无溃烂则无罪；冷水审，是把受控者丢进水中，沉下去表示被上帝接纳，是无罪，浮起来的就算有罪；最搞笑的是吞噬审，受控者被要求吞下一盎司的面包或奶酪一块，人们郑重地祈愿，如果有罪，面包就会哽住他喉咙。

陪审制出现后，古老的裁判方式逐渐式微。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宗教公会禁止教士参与神明裁判，这种裁判法才算事实上被废除了——因为没有教士主持，没人会把神明裁判的结果当回事。

一百万韩国人移民日本计划



1951年4月4日，朝鲜战争中的韩国难民。

1950年12月5日，平壤被志愿军收复，补给线过长的联军在志愿军重兵突袭下暂时严重失利。眼看汉城又要丢失，韩国政府开始着手撤退计划。12月24日，韩国驻日代表金龙周提出“百万人日本移民计划”。金龙周在内的很多韩国官员担心美国会放弃韩国，一旦美军撤回日本，韩国必然全境丢失。“如果真的发生了，那么为了保留反击的火种，必须要确保韩国的人才，最少要移民一百万人到日本。”金龙周说。

美国远东军方高层同意此方案，金龙周找了日本官房长官冈崎胜男，希望在九州岛北部借地安置一百万同胞。冈崎胜男很为难，考虑到在日朝鲜人早在战前就因意识形态撕裂分成两派争斗不休，再来一百万人该如何是好，此外，一百万人如何与周围的日本人相处，难道设置一个有治外法权的“韩国市”？冈崎推荐了首相吉田茂身边的两个亲信给金龙周，这两人传递了吉田茂的意见，他同意这项计划并认为这是日本向韩国赎罪的好机会。随着战线变稳定，这个议题不了了之。

日本学习西方喝牛奶

江户时代，日本开始从印度引进奶牛，但牛奶并不用于食用，而是做成奶酪给马治病。国门被打开后，日本人认为欧美人身材高大魁梧与

喝牛奶密不可分，当时稀罕的牛奶成为日本贵族的滋养补品。1869年，受美国乳品文化的影响，日本跟着使用牛奶制作冰淇淋，冰淇淋风靡全国。

1871年，日本报纸报道皇家成员每天喝牛奶两次，掀起全民喝牛奶的流行潮流。于是，大名、旗本、武士、公爵、子爵等阶层人员竞相投入到新兴的牛乳业中。顿时，奶牛饲育、牛乳榨取、牛乳买卖等环节快速成熟，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去海军省“上访”的日本愤青



1910年代，日本海军省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几年，常有日本愤青去海军省“上访”示威，当时海军因保守而被视为懦弱。标榜作家、农民身份外，“上访者”往往打着各种组织的旗号，如某新闻社、真正勤皇团、爱乡塾、圣战贯彻同盟、爱国妇人会茨城支部、召开茨城县打倒英国县民大会十三团体、县会议员有志等等。来者多在大幅宣纸上写誓言和请愿书，观点大同小异，通常用半文半白的语句表述“必须征讨英美”。

他们通常想进海军大臣和海军次官办公室，副官装着不厌其烦地接待，打发人离开。有人直接展开宣纸恐吓，声称“代天诛灭山本五十六（时任海军次官）”，并向还嘴的秘书或副官一阵臭骂。有来者对山本出席英国使馆举行的电影招待会极为气愤，副官说高松宫宣仁亲王也去了，对方大骂：“居然敢搬出金枝玉叶的亲王，你想借此掩盖自己的过失吗？”深受其苦的海军省人员，觉得这些人就如幕府末年尊王攘夷的志士，被俘虏时问及为何尊王，稀里糊涂答曰尊王就是尊王。

一场改变历史的戒毒



张学良率军进驻平津时期，“赵四小姐”赵绮霞的六哥赵燕生常与张学良玩耍。多年后，他撰文回忆张学良和赵绮霞染上鸦片烟瘾后的戒毒过程。张学良最初找了一个外国“名医”，该医生使用了自配的戒烟针，宣称一打就灵，其实是轻量吗啡针。立竿见影，鸦片瘾断了，吗啡瘾沾上了。赵燕生经常痛心地看到，妹妹和张学良每隔不久就必须打吗啡针，俩人的手臂和腿上遍布针眼，看上去很狰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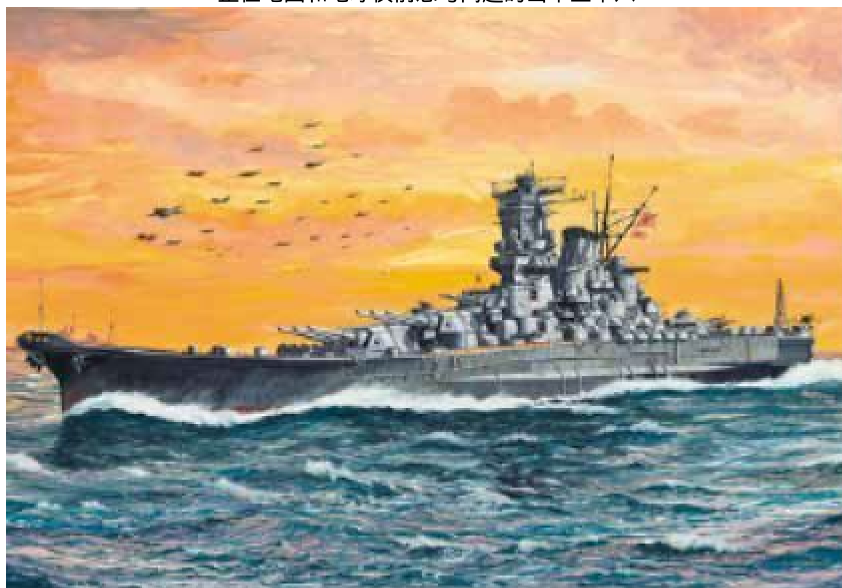
“九·一八”后，东北军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地盘。张学良在1933年带夫人于凤至和秘书赵四来到上海，上海的美国医生米勒帮助张学良戒除吗啡瘾，他使用了镇静剂、麻醉药、灌肠等手段。世事巨变，其弟张学铭在往后回忆张学良两次戒毒情况时感触道：“没有第二次戒毒的成功，我大哥就不可能第二次上任，也就不可能在三年后的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第三章 差点以为是段子

当“水变油”骗子找上日本海军



正在地图和地球仪前思考问题的山本五十六



背景是日本联合舰队旗舰“大和”号战列舰，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山本于1943年4月18日随座机被美机拦截击落而死，他生前的座舰“大和”号于1945年4月7日被美机围攻击沉。

1939年，一位议员、海军预备役大佐向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推荐一位“高人”，可以把淡水变成燃油。海军众人皆不信，山本为了戳穿谎言，让这位江湖术士过来实验。术士把装着水的玻璃瓶密封后放在水中加热，因油密度低于水，当瓶子上浮时，实验便告成功。他一向以这个流程来论证“水变油”的可行性。他在军令部、海军燃料厂做了多次实验，有成功，亦有失败，失败时他必然发癫痫倒地。

山本将信将疑，因日本海军迫切需要更多燃油，病急乱投医，他把术士请到海军省，事先详细记录实验所需瓶子的特征——气泡大小和位置差异。实验持续进行三天，一个瓶子浮上水面，但大家发现瓶子被换

掉了。就这样，骗术被当场揭穿，骗子及助手被警察带走。

二战日本不占领澳门与巴西无关



二战末期澳门俯瞰。

二战期间，日本占领英国殖民地香港，却没有对中立国葡萄牙殖民地澳门下手。曾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的刘成禺称，这是由于巴西政府照会日方，“如果日本人以武力入侵澳门，巴西就把所有日侨撵回本国”。日本政府担心300万侨民被遣返造成国内混乱，澳门才幸免于难。

事实上，1940年日本使馆统计巴西日侨只有20万人，经历反葡起义才获得独立的巴西也没必要为其张目，1942年日军更是毫无顾忌地占领了葡萄牙另一块殖民地东帝汶。日本学者宜野座伸治遍查史料未见照会原文，日本驻葡、驻巴外交官回忆也未提及此事。他认为日军不占领澳门一是没有必要，二是为了借助其作为情报和沟通渠道，日本陆军还设立了专门负责此事的情报部门“澳门机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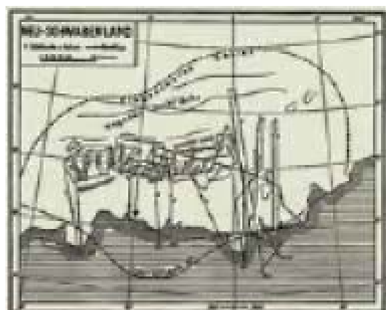
战后德国家庭一幕典型争吵

争吵带有太多时代痕迹。父亲曾是国防军军官，祖上两百年都是普鲁士军人。儿子雷纳自命是德国新人，痛恨祖上及父亲的一切，要跟他们撇清所有关系。姐姐布丽吉特骂弟弟：

在你之前，他们至少都是真正的男子汉。你们左翼除了刁难父亲，还有什么好做。想想你是怎样装饰自己的房间，这边是毛泽东的画像，那边是列宁的画像，桌上摆着马克思的半身塑像。后来，颈链上吊着“大

卫王之星”，再后来，肩上搭着巴勒斯坦披巾。从你房间里出来的那些末代嬉皮士只穿条内裤，半裸着上身，酒气冲天。我总想问问你，你这样，是不是为了做给我们看，让父亲知道你有多么的反传统？你为什么不搬出去住？你为什么不拒绝家里的钱？你为什么不离家出走，找个地方从零开始？你的反抗是由父亲付账的。你买的毛泽东的每一本小册子，都是由父亲供职的那家银行掏钱。甚至你抽的大麻，也离不开父亲。你从没赚过一分钱。

“纳粹余孽躲在南极”的谣言从何来？





纳粹的南极考察地图和水上飞机。

德国在一战中惨败，失去了广袤的海外殖民地，直接导致国内原材料的匮乏。纳粹想到了鲸鱼脂肪，当时生产人造黄油、酱料、肥皂时都需要鲸脂，德国只能用外汇以不菲的价格从挪威购买。德国遂建立捕鲸船队，准备大规模猎杀鲸鱼。1938年12月17日，“施瓦本”号考察船从德国启航，它携带两架水上飞机，前往东经20度和西经10度的南极地带。德国主要目的是寻找一个适合建立捕鲸站的地点，另有建立海军基地之意，军方希望远洋作战的军舰和潜艇可以在南极得到补给。

当船于1939年1月19日到达目的地时，发现挪威已于一年前宣示了

主权。德国以众击寡，一不做二不休扣押了挪威人，径直宣示主权。德国人将此地命名为“新施瓦本”，建立了一个临时基地，用飞机拍摄超过16000幅照片。二战爆发后，德国无暇再赴南极洲。待大战结束，战败国德国的领土要求全失效。不过挪威在1961年签订《南极条约》，便失去了对新施瓦本的管辖权。但纳粹余孽躲在南极地下基地的谣言一直被流传，有不少人说自己在南极见到纳粹的飞碟和潜艇，甚至有人造谣说英美的特种部队一直在尝试攻击冰川下的秘密基地，这成为诸多文学作品的原材料。

越南宗教崇拜孙中山

高台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越南兴起的一个新兴宗教。这个宗教认为，宇宙中至高无上的神是父神高台神（即玉皇大帝），他掌管阳；母神西王母，掌管阴。高台教主张“万教大同”，但却没有为伊斯兰教设定位子，它所称的世间五大宗教创始人是：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耶稣和姜子牙。古今中外诸多名人都被它供奉为圣人，包括圣女贞德、莎士比亚、巴斯德、列宁、丘吉尔和卓别林，孙中山更是在其总部门口被奉为“三圣”之一。

高台教曾经在政治舞台发挥作用，到二战结束时成员扩张到近百万，并拥有一支接受过日本人训练的军队。战后，它受法国资助，与共产党的越盟对抗；但是在吴庭艳政府统一越南南方的行动中，他们被打败了，实力不再如前。越共统一全国后，高台教受到严密监视，信众虽多，但已经没了政治影响力。

川江上贩毒手段千奇百怪



1929年到1938年，刘湘防区内，陈锦帆任川江水上缉私科长、处长，他见证了烟毒走私的种种现象。一条木船载六头肥猪，都用草绳捆住四脚和嘴巴，缉私人员发现有两头是死猪，进一步发现死猪肛门有用线缝过的痕迹，猪腹内装满用猪尿泡包着的烟土。

一条商轮上，缉私人员发现两条大鱼腹中各有一条装满精制吗啡的粗玻璃管。一条直航上海的轮船上，有大学生用一本空心的《辞源》夹带云南烟土，被茶房告密。一条木船船底下拖了一只密封的煤油铁桶，内有300多两烟土，这招时称“拖鱼雷”。船上的干粉灭火器全装了烟土，这也是常用的一招。轮船上的救生器具，偶尔被用烟土或吗啡来代替填充的浮木、海绵和木棉。

贩毒者的想象力非常丰富，缉私人员不能放过每一细节。太古公司“万通”轮上，有人在竹篙杆里藏吗啡并交给一艘划子，划子上的人说：“这是江安南竹篙杆，好东西。”恰好有检查人员是江安人，他检查发现的确是家乡竹子，但好奇为什么千里迢迢运到省外。他遂做好赔偿对方的心理准备，然后砍断竹子，结果大有所获。

事实上，刘湘自己就是大毒贩。由于鸦片生意利润极度丰厚，故地方军阀要抽取很高的税收，刘湘必然禁止他人从四川走私毒品到省外，这将减少他的财政收入。

一个铜钱引发的外交纠纷



清朝咸丰年间，广州的美国牧师为吸引人们进入教堂做礼拜，就想了一个办法，给进入教堂的中国人每人发放一个铜钱。这事儿传开后，一下子吸引了大量的城市贫民。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很快，这些以此为饭辙的贫民分成了两个帮派。一天，为了争夺这一枚铜钱，两个帮派居然大打出手。最后，这些人把美国教堂也给砸了。牧师大闹清政府

的衙门，同时把事情捅到了美国公使那里。这下子事情闹大了，成了一桩各国关注的国际事件。

美国公使伯驾，本是牧师出身，接到老同行们的报告后，他立即照会清政府，要求赔偿损失。清政府派出钦差处理此事。面对伯驾的要求，钦差进退两难：不赔偿，伯驾这边实在惹不起；赔偿的话，开此先例，以后各国都以此为例，那就得赔个没完没了。最后，他只好拖着。直到十年之后，实在拖不下去了，才赔钱了事。在这十年间，这件事一直是影响当时清美外交关系的一个重要事件。

蒋经国初恋情人是冯玉祥女儿

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期间，曾与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陷入热恋，并结为事实上的夫妻。

蒋经国跟冯弗能交往，他的朋友都不太赞同，因为蒋经国是共青团员，冯不是，他们都希望小蒋能一心追求进步，不要被感情拖后腿。冯弗能确实是名只知玩耍的小姐，连写给蒋经国的信中自述“我……真是没有出席（息）到极点了”都闹出一个错别字，但真正促使他们分手的还是政治。

“四一二”政变后，蒋经国发表声明：“蒋介石曾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到反革命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对于当时左倾的他，这番话应是出自真心。但不关心政治的冯弗能就不同了，1927年7月，蒋经国向校方交了一份自白书，批评冯思想有问题，指责她是国民党派来监视、影响、加工自己的，表态两人脱离夫妻关系。

当时，这份自白书没有公开，两人也没分手，左权还说蒋经国“得了相思病”。直到次年寒假，蒋看到了“事实的真相”，才决心与冯断绝关系。究竟“事实的真相”是什么，目前无从解答，可以确知的只有蒋经国的朋友对此十分高兴和欣赏，他的一名朋友写信给他说：“和冯结合无条件是错误的，希望她有一天会变成共产主义者……你说此后要少谈话，多读书，我以为固然也是一个消闷的方法，然而如果性的要求急，我以为你也不妨另找他人。”

国民党曾试图加入共产国际

1925年12月至1927年4月，中国国民党曾多次与莫斯科交涉，企图加入共产国际，独占与莫斯科的关系，这些交涉最终以失败告终，若非如此，历史走向恐大不相同。

1925年年底，胡汉民在莫斯科初次表达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意

愿。次年2月，他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支持，正式提出加入组织的请求，并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他的努力让共产国际把国民党视为了共产主义的“同情党”，并任命蒋介石为执委会的“名誉委员”。

对此待遇，国民党并不满足。1926年9月及11月，蒋介石委托邵力子，两次致信共产国际，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国民党应当与世界革命的总司令部保持联系”，如果不能直接加入，至少应做到双方互派代表。邵力子的建议获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远东书记处的同意，但经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讨论，还是被驳回了。此后，共产国际不再考虑国民党加入或互派代表的问题。

乾隆皇帝咏玻璃



乾隆皇帝老年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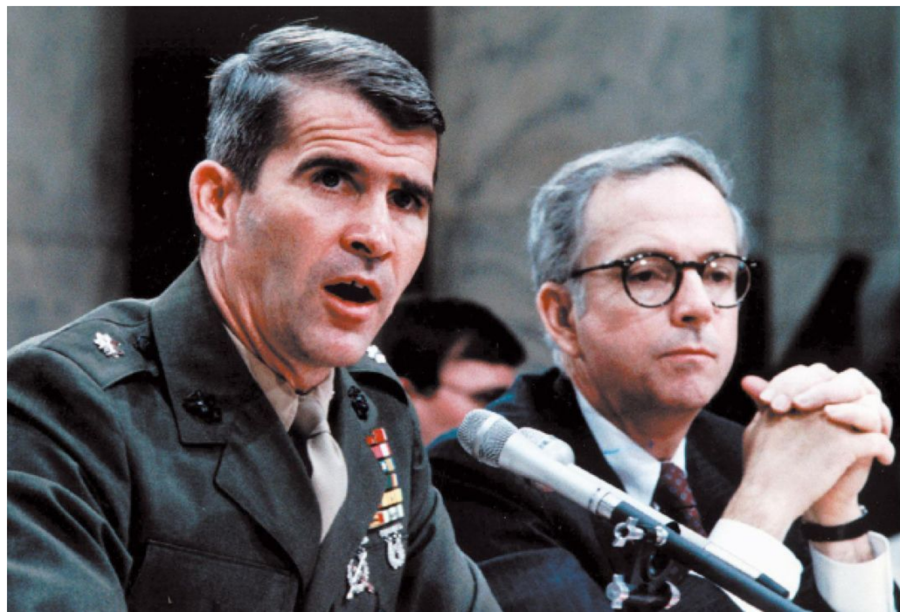
乾隆皇帝的御制诗中，有一首题为《镜喻》，咏诵玻璃镜：“青铜摩以旃，照形已无遗。近代泰西法，玻更新奇。然均藉人工，水银涂抹资。其未涂水银，素片玻璃辉。可以施窗棂，外物了然窥。……”这里的“玻”即玻璃，玻璃镜的原理在诗中都讲明了。

当时，玻璃生产尚不普遍，是皇室、贵胄才用得起的珍贵玩物。好写诗的乾隆，没有少为玻璃施展雅兴，他咏过玻璃盘、玻璃瓶，但最厚待的还是玻璃镜，为之写过好几首诗。皇帝很喜欢拿水晶、云母来对比

玻璃的光亮透明，如“水精（晶）云母羞精华”，又如“一般皎洁羞云母，四射光芒突水精（晶）”。他用的镜子是西洋进口的数尺大穿衣镜，价格不菲，诗中写道：“梯陵度索万里遥，价重京华等球壁。”

至于能分隔室内外又不碍视线的玻璃窗，乾隆更是非常喜欢，因为“西窗糊玻璃，全湖俯几席”，极利于室内观景。为此，他有一首题为《玻璃窗》的诗写道：“西洋奇货无不有，玻璃皎洁修且厚……内外洞达称我心，虚明映物随所受。风霾日射浑不觉，几朗彻无尘垢。”

一件中国大陆产军火的传奇漂泊



1987年7月14日，华盛顿特区，诺思（左）在律师的陪同下，就伊朗门事件的调查作证。

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陆战队中校奥利弗·诺思，因“伊朗门”事件而名噪一时。美国求助伊朗敦促黎巴嫩真主党释放美国人质，绕开国会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收益资金给尼加拉瓜的反桑地诺武装，被曝光后史称“伊朗门”。

当时中美洲受到苏联和古巴的插手，诺思在做报告时常放一套幻灯片让演讲更加生动。幻灯片上是一具中国大陆制造的火箭筒，它最初被送给北越，在河内打上北越军的序列号和印记。它随后被美军缴获，待1975年西贡易帜后又被北越军拾到，然后被送给古巴。古巴先将它运到格林纳达的仓库里，后给了桑地诺分子，桑地诺分子将它支援给萨尔瓦多的左翼反政府武装。最终，它被萨尔瓦多政府军缴获，送到美国人手里展示。

法国人庆幸“亡国”



萨特

二战结束后，萨特说法国作家和艺术家在纳粹占领期只有两个选择：合作或者抵抗。他当然声称自己选择了后者，并说：“我们的工作是

告诉所有法国人，我们不会被德国人统治。”但事实上，被认为有反纳粹意图的萨特剧作《禁闭》等，不仅很容易地通过了德国审查，甚至还有德国军官愉快地观看了首演。30多年后，萨特在接受采访时显得诚实了不少：“在1939、1940年，我们害怕死亡、痛苦，原因让我们恶心。那就是，一个令人恶心的法国——腐败、无能、种族主义、反犹、富人统治者只为富人着想，没人愿意为这个国家去死，直到，唉，直到我们明白纳粹比这更糟糕。”如其所说，在德国击败法国后，很多法国人非但没有因为“亡国”而沮丧，反而庆幸“腐朽堕落”的第三共和国灭亡了。

《魂斗罗》与台湾当局



1989年1月9日，训练中的尼加拉瓜反抗军Contra。

日本科乐美（Konami）公司制作的电子游戏《魂斗罗》家喻户晓。该游戏的名称来自于尼加拉瓜反抗军Contra的日文汉字转写，而该反抗军还曾与台湾当局有过往来。

1986年，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东亚事务主任席格尔敦请台湾当局“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代表”钱复，在华盛顿密见尼加拉瓜反抗军的领袖阿道夫·卡迭罗（Adolfo　Caldero）。席格尔请求台湾当局秘密捐款100万美元，替美国政府拯救这支被美国国会决议遗弃的反抗武装。当时，台湾当局与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还保持“外交”关系，刚刚延展了一笔900万美元的低息贷款给对方。但在白宫方面的要求下，蒋经国指示外围组织“世界反共联盟”向反抗军捐了款。以换取美方对作家刘宜良被杀一案的谅解，以及对台湾研发新一代战斗机提供技术支援的批准。

汉朝征收“剩女税”

西汉初年，由于秦末的连年征战，导致全国人口锐减，很多土地荒芜，无人耕种。为了鼓励大家多生孩子，以提供更多的劳动力，政府在

征税时，专门出台了针对大龄未嫁女青年的特殊政策。

据孝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颁布的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算，即算赋，是由商鞅创建的一种人口税，自15岁至56岁的男女成年人都要缴纳。汉承秦制，保留了这个税收项目。正常情况下，每人每年一算，120钱。但15岁至30岁未嫁的女青年，却要每人缴纳5算，即600钱。这实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可以想象，对于当年的不婚主义者是个多么巨大的打击。

“红军第一叛将”回乡受礼遇

龚楚当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军区参谋长，1935年投敌，被称为“红军第一叛将”。1990年，在大陆方面的动员下，他从香港回到了老家广东省乐昌县长来镇。为迎接龚楚，广东省统战部批准拨款三万元，为龚楚建了一座两层小楼。当时镇里人要打电话，只能去打唯一的公共电话，但为方便龚楚，政府特意牵了一根电话线，安在他的床头。在龚楚家里，空调、彩电、浴缸一应俱全。

龚楚住下后，分别给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去了信，说自己已经回乡，“敬请首长经常给予赐教”。不久，省里来电，转达“邓办”的意见，表示欢迎龚楚去北京，在人大或政协任职。龚楚得知后很生气：“我回来安度晚年的，不是回来要官的。何况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一身都是病，哪里都去不了，做什么官？”龚楚遂以一介百姓的身份，在家乡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九年。

古老的鼻再造术

在医学史上，古印度的鼻再造术恐怕是最令现代人惊叹的“黑科技”。

这种手术记载在公元前500年出版的古印度医学著作《妙闻集》里。针对那些因刑罚或战争失去鼻子的病患，古印度医生会算好所需的皮肤面积，从他们前额或面颊切割一块皮瓣，并使这块皮瓣仍保留一个小蒂与整体的皮肤相连，然后翻转皮瓣，使它覆盖鼻部，再迅速地缝合两个部分——鼻部与取下皮瓣的部位。皮瓣会在鼻部长成一个新的鼻子，鼻孔则是因事先插在鼻腔的两根管子而塑造成型。古印度人会用甘草等植物的粉末来消毒，并以浸有清洁芝麻油的棉花覆盖伤口，防止感染。

18世纪末，两名英国医生才在印度一名砖窑大师那里亲眼见识了这项神奇的手术，将它传到欧洲。这种再造术改变了欧洲整形外科的历

程，其现代版本仍被称作“印度方法”，因为基本原理并无多大改变。

苏联人被B-52吓尿裤子



B-52轰炸机

张如磉是越南共产党在南方的骨干，一度担任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司法部长，最终不堪忍受北方的歧视而跑到法国定居。在丛林里和越共游击队生活时，他认为种种困难都无法同美国空军B-52战略轰炸机的地毯式轰炸相比。该机群的投弹能震破一公里外的人的耳膜，不少丛林居民因此终身耳聋。弹坑在雨季能形成池塘，足以让游击队养鸭和鱼改善伙食，但也会淹死走路大意的游击队员。

张如磉记忆犹新的是，一个正在访问他们司法部的苏联代表团碰上了B-52的紧急空袭警报，警报解除后无人受伤，但苏联人都控制不住身体的颤抖，并尿湿裤子。他认为苏联访客不必脸红，因为身边的越南战友们都曾被B-52的轰炸吓尿过。

美国餐馆老板出卖朝鲜外交官



罗伯特·伊根

在美国新泽西州哈肯萨克经营卡比烧烤屋的罗伯特·伊根，曾与朝鲜驻纽约联合国的代表交好，他戏谑自称“金正日派驻新泽西的人”。伊根因关心越战后仍被扣留的美军战俘，擅自与越南驻联合国代表团联系，用请客吃饭等小恩惠成功笼络对方。朝鲜在1993年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跌入外交困境，朝鲜驻联合国代表团想通过中间人改善同美国的关系，越南官员推荐了伊根。

伊根请朝鲜官员吃饭、打猎、钓鱼、看球赛，提供烟酒和伟哥，双方顺利建立亲密关系，朝鲜驻联合国前副代表韩成烈跟他关系最好。双方的友情在2008年中断，伊根告诉美国媒体，他定时将自己与朝鲜人见面的信息交给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他还把所有朝鲜官员的头发样本提交给中情局。2010年伊根出版书籍《与敌人的就餐》，公布他跟朝鲜官员在一起的细节。

韩国流亡政府首脑靠当查票员养活



金九

上海公共租界开辟之后，公共汽车、电车查票员多雇佣“刻板且负责”的朝鲜人担任，总数长期维持在100人上下，占在沪朝鲜人总数的七分之一。1919年，志在推动韩国独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但因经费短缺，只能租住在弄堂里面办公。被誉为“韩国国父”的职业革命家金九，1926年担任临时政府首脑“国务领”时，每天在这些查票员家轮换着吃饭维生，晚上睡在临时政府的办公室里，自诩为“乞丐中的高级乞丐”。

这种状况一直到1932年才得到改变。“一·二八”上海抗战后，朝鲜人尹奉吉用炸弹袭击了日军在虹口公园举行的阅兵式，炸死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和居留民团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河端贞次。国民政府开始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接触并予以资助，金九才结束这一段困窘的时光。

奥斯曼土耳其苏丹也兼任过罗马皇帝



苏丹穆罕默德二世

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仍有罗马皇帝，一个是查理曼大帝所建立并延续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另一个便是东罗马皇帝，又称为拜占庭皇帝。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陷了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灭亡了东罗马帝国。欧洲便只剩下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罗马皇帝。不过，俄罗斯的莫斯科公国大公伊凡三世却趁机娶了东罗马帝国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亚为妻，于是自称是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自己的莫斯科是第三罗马。到伊凡三世的孙子伊凡四世，也就是著名的伊凡雷帝时，莫斯科大公正式自称“沙皇”，也就是罗马皇帝“凯撒”，欧洲又有了东西两个罗马皇帝。

而鲜为人知的是，灭亡东罗马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苏丹也接过了罗马的法统，自称“罗马人的皇帝”。穆罕默德二世在攻陷君士坦丁堡后，便自认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他诸多名号中，除了“海洋与陆地的权力与胜利之王”、“世界征服者”、“战争的雷霆”之外，还有“罗马人的皇帝”，这不仅是对那个千年帝国的尊敬，也是对自己治下希腊、巴尔干半岛等地的东正教徒的安抚。

当然，奥斯曼苏丹的罗马皇帝头衔，欧洲人是绝对不会承认的。

一出坦克选举闹剧

1995年，高雄市民进党竞选“立委”的候选人朱星羽，玩了一出非常吸引眼球的闹剧。他将报废的美制M18坦克歼击车改装、彩绘成宣传车，并开上竞选场。因为这款装甲车有履带和炮塔，外形酷似坦克，非专业人士很容易将其误认为坦克。更荒诞的是，朱星羽手持指挥刀坐在车上，他的助手们穿着战斗服，坦克发射了用报纸和爆竹制成的“炮弹”。炮声一响，现场的几百名警察纷纷卧地，一名警察被火花烧伤。

朱星羽表示，一位做废五金生意的朋友借给他这辆车，选举结束后即收回。2013年，无婚无育的朱星羽溺毙在一家汽车旅馆里。2014年2月，台湾拍卖网站上出现一辆M18，它的炮管和油漆颜色与朱星羽那辆相似，外界质疑是同一辆。台湾军方表示，军队报废物资处理皆有规定，战车必须切除炮管、拆除引擎、破坏仪表、拆卸履带、割除装甲。朱星羽开“坦克”上街时期，军品报废标准没有今日严格，但拆除武器系统是必然的，因此炮管在内的诸多部件都是临时拼装的“样子货”。

英国政府“阻挠”蒙哥马利修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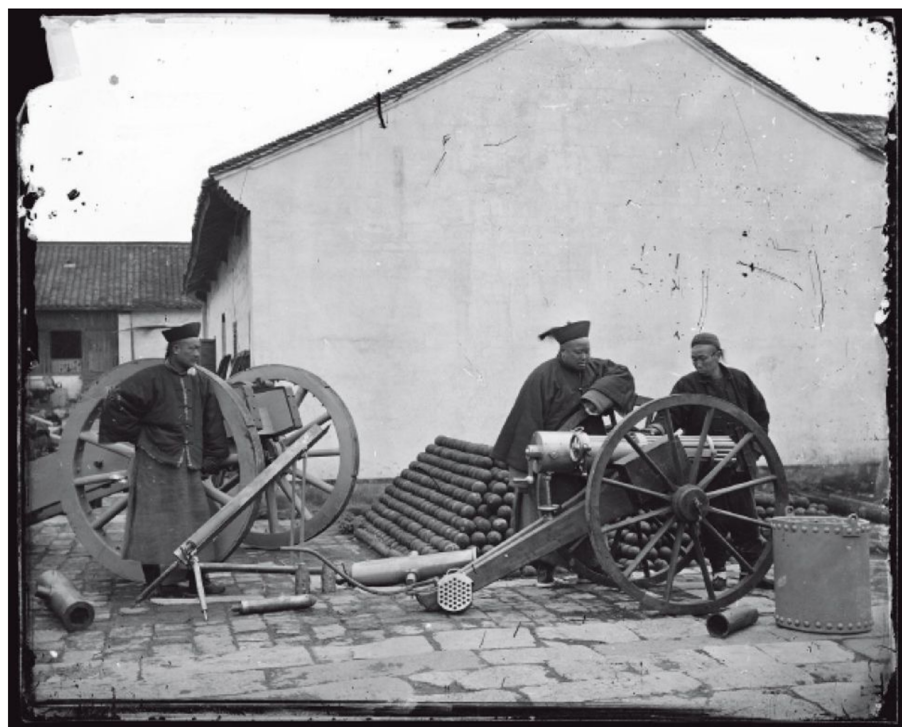
蒙哥马利

二战结束后，蒙哥马利计划将自己在汉普郡的一座磨坊改造成别墅。当时处于战后物资与人力匮乏时期，营造许可证被严格控制。蒙哥马利先向磨坊所在的乡区委员会申请，被上交至地区总办事处，遭到拒绝。蒙哥马利无奈，写信给卫生大臣求助。卫生大臣对蒙哥马利表示了同情，同时说这使他在法治上处于为难的境地。最后，蒙哥马利只好找到首相，说自己仅仅是想用积蓄建一所房子，不会动用多少人力、物力，甚至不无威胁地表示，如果政府不颁发许可证，“我只得把指挥车停

在磨坊小溪的草地上，住在那儿”。费了如此周折，蒙哥马利才算达到目的。至于修房子所用的材料，很多来自蒙哥马利帮助过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自治领。蒙哥马利后来在回忆录中慨叹：“我的一切身外之物都在战时被德机炸毁，要想英国政府准我用自己的积蓄建幢房屋，却遇到了困难。而自治领政府在得知我的困境后，则是立即尽力相助。”

第四章 爱科学还是“黑”科学

古代中国的火药配方是什么？



南京金陵机器制造局，1872年。由李鸿章倡导的金陵机器制造局诞生于1865年，是晚清洋务运动中开办较早、规模较大的兵工厂之一，其主要产品有枪、炮、弹药、火药、水雷等。

一般认为，火药出现于中国唐代。北宋《武经总要》第一次提到“火药”一词，但配伍颇为复杂：“晋州硫黄十四两，窝黄七两，焰硝二斤半，麻茹一两，干漆一两，砒黄一两，定粉一两，竹茹一两，黄丹一两，黄蜡半两，清油一分，桐油半两，松脂一十四两，浓油一分。”难以看出与近代火药通用配方（硝75%，硫10%，炭15%）之间的明确联系。

明初的《火龙经》是中国第一部提出硝、硫、炭为火药主要成分的著作，它应用了中医里的君臣佐使理论：“火攻之药，硝、磺为君，木炭为之臣，诸毒为之佐，诸气药为之使。”还据此给出了实践配方：“硝性主直，磺性主横，灰性主火。性直者，主远击，硝九而磺一。性横者，主爆击，硝七而硫三。”

美军密码天才破译日军电码

1942年5月5日，日本大本营海军部发布了“第18号命令”，命令联

合舰队于6　月上旬“与陆军协同，占领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西部要地”。没想到，此绝密计划被美军探知。这份功劳属于一个叫罗谢福特的天才密码专家。1942年5月中旬，罗谢福特发现日军无线电波发射频繁，这些电波表明日军正在筹划大规模的行动。

但攻击的目标是什么？通过研究破译的密码，罗谢福特注意到，日军反复使用了“AF”这个代号。罗谢福特推测，AF代表中途岛。为了检验推测的正确性，中途岛的美军被要求密令发送一份伪造的情报。情报称，岛上蒸馏厂已经倒闭，淡水缺乏。

日本人不知是计，很快将截获的情报传回了大本营。当然，日军传回的情报也被美军截获了，情报上明确写道：AF缺少淡水。至此，一切水落石出，AF指的正是中途岛。

晚清使臣将避孕视为“不孝”

1866年，斌椿奉命率使团游历十一国，所见所闻写成《乘槎笔记》一书。他在出国的船上，看到外国“妇女姿容美丽……每起，则扶掖登楼船，偃卧长藤椅上。而夫日伺其侧，颐指气使，若婢媵然”。丈夫服侍妻子，自然与斌椿脑子里的“三纲五常”格格不入。斌椿使团的翻译张德彝，也对西方礼俗很不理解，看到大街上男女牵手同行、宴会时男女杂坐，都极不以为然。至于避孕，张德彝就更难以接受。他在《航海述奇》中道：“闻外国人有恐生子女为累者，乃买一种皮套或绸套，贯于阳具之上，虽极倒凤颠鸾而一雏不卵”，遂引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话，将避孕视之为“不孝”。

瘟疫医生和鸟嘴面具



反映中世纪瘟疫医生的版画。

瘟疫医生是欧洲中世纪曾经存在的一种特殊职业。他们往往是未受专业训练的蒙古大夫，做不了手术，无法正常从医，反倒在瘟疫这种人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有了用武之地。这群人的地位不低，不但拥有解剖尸体的特权，若被绑架，所在社区还会愿意拿出数倍于普通人的赎金来赎回他们。

现代流行文化中时常出现瘟疫医生夸张的面具。这种面具是法国医生Charles de Lorme在1619年发明的，它与一个罩遍全身的防护服连为一体，只留两只眼睛透过玻璃观察事物，鼻部的呼吸器内塞满了干花、药草、香料和浸醋的海绵，用于防范瘴气——当时人们认为的瘟疫成因。瘟疫医生装备这套防护服后，看上去就像一个鸟人。

瘟疫医生的工作并非毫无成果，诺斯特拉达姆士就从他的防疫工作中总结出了及时清理尸体、多通风和注意饮水卫生等有效经验。现代外

科与病理学之父、解剖学家安布鲁瓦兹·帕雷就做过瘟疫医生。

编百科全书要理性客观中立

1987年1月，胡乔木带人修改百科全书军事卷“毛泽东”辞条。他在当时提出一个颇为惊人的建议：写百科全书这类东西，不要使用宣传性、颂扬性的词语，也不要使用党的文件、决议中论断性的语言，而要用客观陈述的方法，以保持释文的客观性和稳定性。胡乔木继而提出原则：“有关中国方面的内容，应当力求准确、公允、可信；外国方面的内容，要力求不出错误。”

胡乔木一年前就辞书中重要人物条目不用颂扬性评价语，写信给政治局常委，所有人都同意，可不再添上诸如“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用语。胡乔木的意见从此成为文献研究室撰写此类释文时的原则性要求、大陆各类辞书的撰写方式和统一体例。对人物条目释文采用颂扬性评价语言，始于苏联斯大林时代，大陆沿用此形式一直到1980年代。

蛋筒，冰淇淋发展的里程碑



1904年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现代意义的

蛋筒冰淇淋首次亮相。这是一叙利亚移民临时想到的主意。而由华夫饼做成的蛋筒，诞生于13世纪的法国，但仅起装饰作用。蛋筒冰淇淋极受欢迎，此前小贩用玻璃杯装冰淇淋，顾客在街边吃完后须归还杯子。

技术一直在进步，1909年美国上市了自动卷蛋筒的机器。1920年代，蛋筒完全实现机械化生产。1919年，科尔兄弟发明了冰冻蛋奶，他们将鸡蛋、奶油、糖装入冷冻机，机器会挤压出冰淇淋奶糕，正好进入蛋筒内。他们给首次实现机械化生产的蛋筒冰淇淋定价为5美分一个，一下子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卖出一万八千个。

成熟的蛋筒冰淇淋带动了整个冰淇淋工业的发展。1931年，全美蛋筒冰淇淋消耗量达3亿吨。大萧条时期，蛋筒冰淇淋依然热卖，同时为年轻人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正是由于美国人的创造精神，让原本由少数人享用的奢侈美食变成大众食品。

明朝如何失去火器优势

明朝晚期与后金的战争中，明军负多胜少，士气低落，在通州练兵的徐光启就想到用西洋大炮来扭转战局。他一面上疏力陈“可以克敌制胜者，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一面组织人员赴澳门购炮。澳门对北京来使受宠若惊，招募多人佐助明廷，购来的大炮也一度展现威力，在宁远之战中重创后金。

然而，明朝诸多守旧派不肯放下华夷之见，始终阻碍着徐光启的努力。天启三年，因为发生炸膛伤人，京营教演的葡人便被他们借机遣返澳门。后来因北京仿制工作进展缓慢，崇祯遣姜云龙赴澳门招募葡人帮忙，又被礼科给事中卢兆龙四道奏折中止，姜还遭革职。1631年的吴桥兵变更成为明清火器优势逆转的转折点，发生叛变的，就是明军火器最为精良的部队，事后，叛将孔有德、耿仲明投靠后金，部队的主将孙元化、张焘则被问责处斩。

与明朝不同，后金对火炮异常重视。皇太极亲自出城十里迎接携带火器的孔、耿叛军。松锦战后，后金缴获明军大量火器，还获得了锦州的制炮厂，整编汉军八旗时，孔、耿与后来投降的尚可喜三部编为了独立的炮兵部队。关外明军从此陷入“茫然无恃”的火器劣势。

为枪支远游英国的毛利酋长

1820年，在英国开拓新西兰为殖民地之前，毛利人酋长洪义远渡重洋来到了英国。这位不速之客在伦敦和剑桥待了五个月，其面部的刺青在英国人间引起了轰动。英国人盛宴招待他，送给他许多礼物，连英王

乔治四世也接见了他。双方握手时，洪义得体地说了一句：“乔治王先生，你好！”英王也回应他：“洪义王先生，你好！”会面后，洪义毫不客气地问乔治讨要伦敦塔里的一套锁子甲，英王送给了他。

不过，洪义并不是为了见识外面的世界才如此奔波，多年前，与他敌对的一个部落靠几支枪打败了他的部落，促使他专为搜集枪支出游，企图用枪在毛利人中称霸。一回到悉尼，他就把收到的礼物都换成现金，买了三百支滑膛枪以及火药、子弹。他的成果打破了毛利人势力的均衡，许多部落都被他拉进更为残酷的争端。

洪义一生追逐权力，很擅长与白人打交道，具有天才的学习能力。他甚至协助白人语言学家发展出毛利语的文字，也正因为他的影响，书面毛利语带上了新西兰北部口音，通常发音是“f”的地方都被写成了“wh”，因为洪义的方言就是这么读的。

古代国家是怎么禁烟的



日本江户时期著名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的作品描绘了旅途中的两位女子在马背上抽烟的情形。

米哈伊尔·弗奥多洛维奇是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一位沙皇，也是第一个厉行禁烟的统治者。当时法律禁止使用烟草的行为，最严重者可判死刑，政府专门设立烟草法庭，审理此类案件。最常见的刑法是撕裂吸烟者的嘴唇，如果被告有家产的话，则没收充公，流放到西伯利亚。而波斯人惩罚烟草商的办法是，用熔化的铅灌入他们的喉咙。

奥斯曼帝国的穆拉德四世对禁烟措施亲力亲为，最为用心。他经常装扮成破烂乞丐，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向路人讨根烟抽，一旦有人上钩，就被抓住砍头。在他统治的14年，被钓鱼执法的有2.5万人。

烟草传到日本后，也遭到了抵制。在1606年到1616年，政府发布了五次戒令，对烟民先罚款，再逮捕，最后没收全部家产。但是吸烟的风气屡禁不止，连幕府将军的保镖都可以在主人面前公开吸烟，1625年统治者不得不废除禁烟条例。

苏联说：“第一架飞机是俄国人发明的”



莫扎伊斯基发明的飞机的模型。



说起飞机的发明者，人们耳熟能详的是莱特兄弟。这对美国兄弟在1903年12月17日，制造出了人类历史第一架飞机并试飞成功。

这种说法让俄国人不服气。苏联时代，他们一直声称，制造出世界第一架飞机的，是俄国人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莫扎伊斯基。这位沙俄时期的海军上校，在1881年11月3日便制造出了飞机，并获得了发明“空中飞行器”的俄国第一项专利权。1882年7月20日，在靠近圣彼得堡的红村，莫扎伊斯基进行了飞机的首次试飞。也就是说，莫扎伊斯基的飞机比莱特兄弟的飞机早了整整二十二年。

不过，莫扎伊斯基的飞机是蒸汽机驱动，莱特兄弟的飞机是内燃机驱动，莫扎伊斯基的飞机显然未能成为日后飞机的始祖。

官方生育观念的骤变

1949年1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儿童保育事业的发展》，指出“人民政府明令禁止溺婴堕胎”，并把堕胎与溺婴、卖儿女相提并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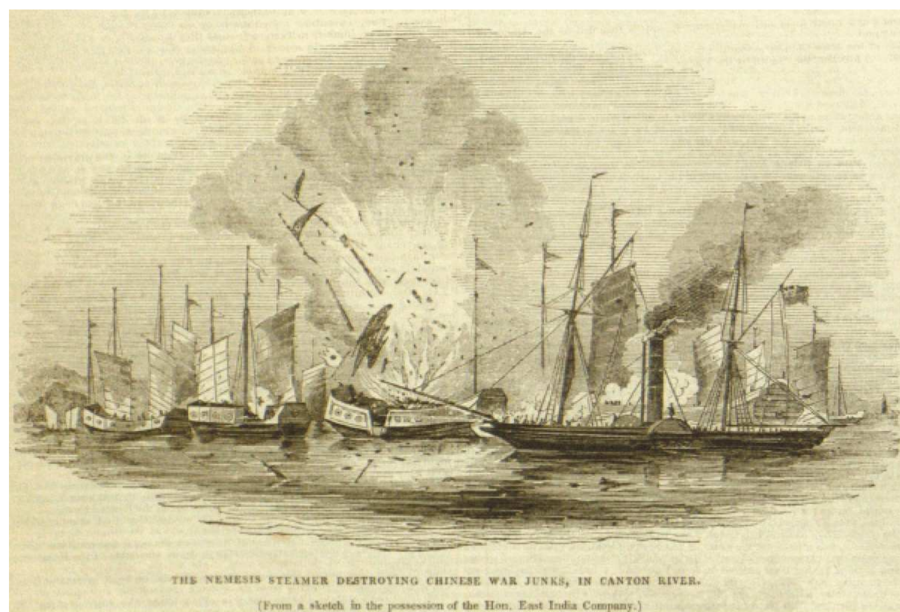
认为是旧社会妇女儿童处境悲惨的证明。1952年，《文汇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一名“为了生活”堕胎的女教师，说她“为了追求个人享受，竟残害下一代”，且明言堕胎在“新中国是绝对不容许的”。

节育在建国初的话语里也同样不受欢迎，1951年，《新民晚报》发表文章《反节育》，批判日本的节育运动，称生育是“为未来美好的社会远景奠定坚厚的基础”，所以应该对节育“予以否定”。1953年，避孕用具被禁止进口。

1954年底，中央态度转变，又开始“赞成节育”，并于次年3月指示卫生部“宣传避孕”。媒体舆论也随之反转，1957年，《文汇报》更发文称帝国主义鼓励生育是因为资本家“需要产业后备军”，歌颂“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可以公开讨论宣传避孕”。对堕胎的评价也开始转变，改称为“人工流产”，允许自愿选择，卫生部也宣布“过去限制人工流产的办法有缺点”，“产生很多流弊”。

然而，这个节育宣传时期也没能持续太久。1958年，毛泽东提出“人多力量大”的口号，积极主张生育控制的文章再度迅速从报纸上消失。

中国人最初如何理解蒸汽机



描绘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蒸汽船的版画。

1793年，英国遣使马戛尔尼到华访问，随行带有一座瓦特的蒸汽机模型，不过他却没有把这座模型送给乾隆皇帝或任何清廷高级官员。结

果，中国人真正见识蒸汽机运行，已经是中英开始交战的道光年间了。

当时，中国官员无法理解蒸汽如何用作动力，而误以为推动英国人疾行快船轮子的是火焰。1840年6月，两广总督林则徐向道光皇帝报告英军舰队有三艘“车轮船”，“以火焰激动机轴，驾驶较捷”。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的钦差大臣耆英，受邀到英国蒸汽船的轮机室里参观，亲眼观摩了蒸汽机的运转，仍然只是向皇帝汇报说“大约按运钟表之法，巧借水火之力”，而未能描述真正的机器原理。

然而，1840年代初的广州与澳门已经有中国商人学会了蒸汽机技术。1842年，广州行商潘士荣就捐造了一艘蒸汽船，由于广州官员报告这艘船航行不甚灵便，道光皇帝下令不必继续此项试验。耆英在1845年左右也一度从澳门找了一位美国人来造蒸汽船，可惜这名美国人在1847年死亡，他的造船工作也没能完成。

苏联重工业腾飞靠欧美



马格尼托戈尔斯科钢铁厂

大萧条时代，苏联趁机引入大量西方工业技术，由此建立起成系统的重工业。马格尼托戈尔斯科钢铁厂、库兹涅茨克钢铁厂和扎巴罗热钢铁厂是苏联三大钢铁厂，均由美国援建。苏联最大汽车厂高尔基汽车厂是福特汽车公司援建的。苏联四个拖拉机厂，有三个是美国、德国援建的。苏联的重型机械厂、水电站也都是由美国、德国和英国提供设备和技术。

1928-1941年，苏联启用的新设备中有1/4以上是进口的。技术进口占到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口额的80%左右，如1931年，苏联进口机器设备数量占世界设备出口数量的1/3，90%左右的进口数额是机器设备。苏联热衷于聘请外国专家做技术指导，1932年在苏联重工业部门工作的外国专家有6800人，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聘请570名美国人和50名德国人指导安装。

信仰基督教的红军师长



邓允庭

1928年2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攻破湖南郴县，建立苏维埃政府和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委任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本地进步人士邓允庭担任师长。时任县委秘书的曾志回忆，县委书记夏明震代表组织发展邓允庭入党的时候，邓回答“我相信共产主义，也愿意加入共产党；但我也相信基督教，我不是迷信，而是相信其中的道理。共产主义讲为人民大众谋利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和基督教讲平等、博爱是一致的。所以我不放弃基督教”。上井冈山后，邓允庭曾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副师长、湘赣边特委委员、后方留守处主任，1931年4月被指认为“AB”团成员，被杀死在一个山头上，时年52岁。

谁教会了新移民种植印第安玉米



版画描绘了1620年乘“五月花”号帆船而来的英国清教徒在鳕鱼岬登陆后与印第安人接触的情形。

搭乘“五月花”号的英国移民定居北美不久，与印第安人发生了接触，遇到了他们的第一个印第安翻译斯昆托。斯昆托教给了移民们大量对生存有益的知识：如何种植印第安玉米、哪里可以捕鱼、在哪儿找到日用品……

此前，斯昆托的命运坎坷而复杂。早先，当地爆发瘟疫，他成了少数幸存者；之后被欧洲人抓到，准备卖到西班牙当奴隶；他在途中逃了出来，辗转到了伦敦，被一个英国商人收留，雇佣到纽芬兰等地做工；最后，一位名叫德摩尔的船长带他回了老家。

斯昆托人品并不好，他帮助英国人的初始动机是为了狐假虎威。他向其他印第安人吹嘘与英国人的关系，宣称白人有用疾病攻击人的异能，骗当地人以为他可以左右英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或和平，借此向他们索贿。英国人发现后，对他有些鄙夷和提防，但并没有终止与他合作。

去世前，斯昆托请求英国人的总督为其祷告，让他可以进入天堂，“到英国人所信的上帝那里去”，还把自己的遗产也送给几位英国朋友作为纪念。英国人评价说：“他的死是一个重大损失。”

早期美国的铸币失败



费城铸币厂冶炼室

1792年，《铸币法》规定在费城建立一座铸币厂，并规定美国从此以金银复本位制为基础发行金属货币：十美元面额的金币、一美元的银币以及更小面额的辅币，金银比价被规定为1:15。

因为忽视经济规律，《铸币法》几乎是一推行就失败了。1796年，欧洲黄金相对白银的价格上升了，美国的金币一铸造出来，马上就被运到欧洲套利。而美国的银币因为铸造质量较高，也被装箱运往加勒比地区，在那里换成不规则的、失去光泽的、更加笨重的西班牙银币，接着又运回美国换取黄金或新的银币。

结果，直到19世纪中期，美国人都没有自己的金属币流通，只得使用外国硬币，甚至宣布某些外国硬币为法定货币。这倒也对实际的经济运作影响不大，因为各州特许的私人银行纷纷发行纸币，到内战前大约有一万种纸币在美国流通，美国人就靠着这看上去很不靠谱的支付体系，保持着经济的快速增长。

即将消失的咸海



2008 年



2013 年 9 月

咸海曾是世界第四大湖，然日益干涸的它即将从地图上消失。从1960年开始，它的水域急剧缩小，含盐量急剧上升，不同年代的卫星图片充分展现了咸海的地理变迁有多么可怕。湖面的萎缩严重影响到周围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大面积的盐土沙漠形成了独特的盐尘暴，盐尘暴吞噬了大片良田和牧场。

这巨大灾难与苏联的农业政策失误密不可分。1918年苏联提出“白金计划”，即在里海区域大规模种植棉花换取外汇。1950年代，苏联把全国分18个基本经济区，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为中亚经济区，主要种植棉花；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单独经济区，主要种植水稻和小麦，并发展畜牧业。里海的水靠阿姆河、锡尔河流入，1940年代苏联在这两条河上兴建大量水渠用于农业灌溉。从1960年开始，里海的淡水流入量年年激烈递减，同时人类活动的排污增多，最终导致局势无法挽救。

加州农业的神奇崛起



1942年6月，在建中的沙斯塔水坝。

“阳光地带”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西海岸的狭长地块。在西海岸的低矮山脉和东部高大的西拉内华达山脉间，是全长724公里的中央谷地，它让加州成为美国农业第一大州。

1945年前，中央谷地以半沙漠地带为主。夏季干燥炎热，冬季暖和，但雨量大易引起洪涝。州政府想兴建大规模水利工程，从加州最长的河流萨克拉门托河和三角洲地区引水，但遇上大萧条，最终在罗斯福新政期间成功实践。联邦垦务局投资建设“中央谷地计划”，工程产权归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有。1945年，时为世界第二高的沙斯塔水坝竣工，它是整个工程的最关键处。从它出发向南沿着萨克拉门托河，有20座水坝，还有500多英里的河流和水渠，这个水利系统造就了42000平方英里的露天温室。

此外，二战后美国的化肥工业变成熟，机械进步使得世界最大蓄水层——奥加拉拉蓄水层的水能被抽取用于灌溉。这使得加州的农业产量连年飙升。

第五章 军事儿

保定军校的奇葩教官

北京政府被直系曹锟、吴佩孚控制时，遭直皖战争兵灾而刚复校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苦于教员不足，应急吸收一批跟不上时代的旧式教官。他们年纪大，学术思想极度落后、精神萎靡，其言行成为学生们的笑话。

一个叫徐廷彦的兵器教官，上课时沉默不语，只在黑板上写笔记，学生编顺口溜“一上讲堂三不管，粉笔用了七八根，笔记写了几黑板”。筑城教官蔡玉标遇到学生请教就回答：“你不明白，你才几天不明白？我早就不明白！”学生继续问：“教材上的公式从哪里来的？”他回答：“坐洋船从外国来的。”

特种部队与驴



特种部队在电影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现实中却常被后勤运输所困扰。二战期间，英国特种作战先驱温盖特在缅甸组织“远程渗透”打击日军时，便抱怨决定成败的不是人，而是驴：一是要有足够数量的驴，二是驴要受过足够训练，不会听了枪炮声就乱跑。

20世纪60年代，英国特种空勤团（SAS）在阿曼山区打击叛乱分子时依然为驴烦恼。时任小队长的“特种兵上将”德拉比利艾尔回忆，作战部门发现阿曼的驴子要40英镑1头，索马里只要3英镑，便从那边买来200头配属给SAS使用。但是索马里驴子个头太小，只能驮载50磅的货物，还只吃谷物。而当地驴子的驮载量超过索马里驴子一倍，平常只吃遍地可见的耶枣叶即可，两相比较得不偿失。更令官兵难以接受的是，索马里驴子不会爬山，到1000英尺高度就赖在地上不走了。

一头倒霉的空降驴



1945年1月28日，美军第82空降师的士兵在雪地里拖着沉重的装备行军。

二战时，针对西西里岛的糟糕交通，美军82空降师在进攻前用一头驴做实验，验证驴能否随伞兵一起空降，以便在落地后给部队驮运物资。这头倒霉的驴在登机时就很不顺利，它被飞机引擎声吓得不敢上前，飞行员关掉引擎，一群人又推又拽把它塞进机舱。刚启动引擎，驴就乱踢乱咬，当飞机到达预定空降区域时，它横躺在地上死活不站立，最终被人强行拽起来拖向跳伞口。它被推出机舱，但着陆时因四脚直立

而摔断了三条腿，士兵们用步枪结束了它的痛苦。

事情未完，一军官欲利用这尸体让手下感受刺刀扎进血肉之躯的那一刻。用帆布包裹的尸体被挂在公厕里，成千上万苍蝇围着尸体打转。士兵们挨个刺杀，几百刀下去，驴已经变成血肉模糊的一团，很多人不禁呕吐起来。

韩国的苏式武器优于朝鲜



T-80U坦克

朝韩在建国一刻起分别倒向苏联、美国阵营，军备建设分别是全面苏式化、美式化。待两国都建立起程度不一的自主军工体系后，武器装备依然可视为清一色的苏式、美式。这格局在苏联解体后被打破。

韩国同苏联在1990年9月建交，翌年向苏提供10亿美元银行贷款、4.7亿美元商业信贷，没想到年底前苏联崩溃。俄罗斯继承苏联的债务，但无力还债，还欠更多利息。韩国知还款无望，俄罗斯又无像样的工业产品能在国际市场上得到认可，除了军火。两国在1995年达成代号“棕熊”贸易协定，用武器来抵押贷款。这计划进行顺利，韩国在2003年出于外交利益释放更多善意，免除利息在内的6.6亿债务。在韩国陆续获得的先进俄制军火里，海军装备主要有3艘气垫船，空军装备主要是41架卡-32直升机，陆军则有一堆T-80U坦克、BMP-3步兵战车。这些俄制装甲车辆经常扮演假想敌部队，不过真正的敌人——朝鲜军队的顶级装备却是落后两代的T-62坦克和BMP-1步兵战车，还破旧不堪。

你用原子弹，我用地道战


床下洞


路边洞


墙下洞


房前洞

1970年代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会见外宾时，往往会强调中国的备战工作，尤其是挖防空洞运动。抽取两位领导人颇具代表性的讲话内容如下：

抗日战争时农村可以搞地道战，现在城市为什么不可以搞地道战？在市里，这房子跟那房子统统打通。在地下，学生可以上课，也可以躲藏，也可以打枪，也可以进攻。我们准备苏联从北面打进来占领黄河以北，美国从南面打进来占领长江以南，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后占领东部青岛和上海地区，印度趁机占领西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打到最后，把侵略者统统消灭在中国领土上。我们下了这样的决心，所以每家挖地洞。

尤其是苏联要打，让你们打进来，我们防御。我们还在继续挖洞，全国二百多个城市都挖洞。你用原子弹，我就用地道周旋。我们挖地洞是防御，挖了地洞我们心里就比较安全了。正因为我们挖洞备战了，苏联才不敢动手。

北京修地铁是为了打仗

1953年，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向毛泽东汇报："北京建设地下铁道是需要的，有助于解决交通繁忙问题，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今天，考虑以地下铁道作为防空之用也有必要。"毛泽东回答："不光你们要修地下铁道，以后天津、上海、沈阳也要修，很多地方都要修。现在你修二十公里、三十公里算什么嘛，你要一直修到天津。"

北京地铁一号线开工于1965年7月，其目的如周恩来所说，"北京修建地铁，完全是为了战备。如果为了交通，只要买200辆公共汽车，就能解决。"国务院将地铁列为重要战备工程，代号"401"。出于安全考虑，地铁上方修筑了80cm—100cm厚的防爆层，预计能承受100架飞机带100颗炸弹的地毯式轰炸。

北京地铁修建的时候，中国老百姓并不知情。1969年建成通车后，因其被定义为战备工程，也不对公众开放，只能凭介绍信参观乘坐。直

到1981年，北京地铁才对外运营。

抗战时期的液体燃料



二战中，为飞虎队战机添加燃料。摄于1943-1945年。

用纯酒精充当燃料，或在汽油中掺入一定比例酒精，是石油危机后出现的环保措施。鲜为人知的是，早在抗战时期，中国就曾因为油品严重短缺而被迫以酒精作为主要液体燃料。

战争期间，石油制品进口不易，政府在西部尝试的油田开发也不太成功，酒精越来越多地替代了汽油的角色。起初，只是掺20%-30%的酒精到汽油里，后来，一般交通车辆干脆烧起纯酒精来。酒精需求量激增，1940年1月，资源委员会提出“扩充酒精工业办法”，鼓励民营业者参加，多设小规模酒精厂。

到1945年，酒精在液体燃料使用量中所占的比例已稳居80%以上，有时甚至超过90%；其中，军事部门使用了约90%的量。大部分酒精是由民营工厂生产的，质量参差不齐，国营工厂优质酒精的使用权总是需要争取，如运输统制局就请资源委员会将资中酒精厂制程变更，生产无水酒精来供给空军使用。

美国独立战争的财源



筹措足够的资金是赢得一场战争的关键，新生的美国也不例外。为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美国政府使用的财源并不光彩——它的手段是印刷纸币与没收亲英派财产。

这两个手段是现实条件制约下的仅有选择。当时，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的《邦联条例》并未授予中央政府征税权，靠“无代表不纳税”理念而组建的新政府，自然不能随意征税。至于向外国借钱，刚刚宣布独立的美国也没有足够的财务信用。无奈之下，美国发行了“大陆币”来支付产品和服务。起初，大陆币与金银正币的兑换比价为1:1；1777年年初，比价变成了3:1；1778年年末，就跌到了10:1；这种势头到1779年的发行高峰更加无法遏制，比价变成了50:1。到1781年1月，大陆币已经比五年前贬值了100倍。

而那些拒绝接受大陆币，向英国人出售货物的人，需要面对可能被没收财产的威胁。战后，贫穷的政府用土地来补偿被欠薪的士兵，其中一些土地就是从亲英派那里没收得来的。

超高速核潜艇闹剧

陈右铭在退休前是解放军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文革期间担任“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为制造核潜艇立下巨功。他在工作中顶住种种压

力，克服诸多乱象，不惜得罪海军政委李作鹏。

钱学森从国外资料上看到，核潜艇的速度可到70节。面对钱学森提供的科技情报，李作鹏决定要向这项指标看齐。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核潜艇迄今最快航速是45节，还是苏联的一款不成熟、试验性质的产品跑出的纪录。陈右铭直言钱学森是空气动力专家，并不了解舰艇设计。“为什么做不到？那钱学森为什么说能达到？他不懂，你懂？他是专家！”李作鹏骂道。“我能当艇长，能操纵舰艇，钱学森能操纵舰艇吗？”陈右铭现场顶撞上司。极度尴尬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出来打圆场。文革后，李先念与陈右铭开玩笑重提此事。

对抗火炮的裸女“阴门阵”


李自成进北京

鲁迅散文集《朝花夕拾》记载了一段他与保姆阿长的对话，提到太平天国运动时，阿长被“长毛”掳去，叫她裸身站在城墙上对抗清军的大炮。据阿长说，她们女人脱了裤子，一排排站上城墙，“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可能是关于“阴门阵”对抗火炮最为有名的一段记载。裸女“厌炮”的迷信源远流长，最早的应用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的杨应龙之乱：叛军派妇女裸身持箕扇动，并丢掷牛羊狗头来施邪术叫明军大炮打不中；明军则以泼洒狗血来破除之。到明末大乱，这种战术运用更频，李自成围攻开封时就以之压制城头炮火，作为回应，明军叫僧人裸身站在城墙叫骂，以阳压阴。

“阴门阵”最为血腥残忍的应用也发生于这一时期。张献忠围攻安徽滁州，掳获数百妇女，并不直接逼她们摆成“阴门阵”，而是先行奸淫，而后斩首，孕妇更被剖腹，尸体倒埋土中，只露出下体对向城墙。如此景象，连久经战争的明军士兵也都“回首不忍视”。

陈毅谈美械武器不符合国情

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后期开始获得美援，但多方意见反映，除了无线电、迫击炮等几种装备外，美械不如国械和日械实用。美械的威力发挥，须建立在强大的后勤补给上，而中方后勤不足、物资匮乏、运输能力低下。中国的多数道路和桥梁不足以支撑重炮和坦克、甚至卡车的通行，铁路是主要的机动方式，马驴骡甚至挑夫也很重要。此外，美械带来枪炮口径混乱的麻烦。美国在战后一度实行武器禁运，使得美械得不到补给和维修保障。

国共战争期间，陈毅总结作战经验说："美械使火力增强，但火器复杂，干部无法掌握，不能灵活机动，消耗弹药甚多，缺少运输工具，供给不上。野战能力很弱。美械化害多利少，最多不过利害相等。"

军事医学意义重大的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时期，日军的战地医院。

日俄战争，是人类有史以来战死军人数量多于病死数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日本陆军野战部队约8%的人死于敌人火力，2%的人死于疾病。日军扭转了战争史的伤病模式，之前200年里，军队通常会因疾病损失至少25%的战斗力量，即便是获胜一方。战后，西方国家的军队卫生人员争相去日本学习经验。

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日本竭尽所能将军事卫生学和疾病预防做到最好。日本采取很多拿来主义，如沿用了普法战争中德国的卫勤保障和伤员后送体系，德国的这一体系学自美国南北战争，学习传承的过程随科技进步都做了改良；外科治疗，日本沿用英国在布尔战争中的经验。日本的最大创新，是第一次将卫勤保障计划制定在作战体系内，所有军

官均要学习卫生学和卫勤保障的课程。这一切革新，有力帮助了日本取胜。

国军的山寨装甲汽车兵团

抗战结束后，美军在印度帮国军训练的7个装甲兵营回到了国内，但只有两个营已经配备武装，剩下五个营只是空有技能，并无装备。国府用抗战时残存的苏、意、法制老式轻坦克装备了其中一个营，又派三个营到北平接收了日军装甲车，但还剩下一个营拿不到任何战车。

1946年6月，因为东北地区战况激烈，该营奉命改编为“装甲汽车兵团”，可是仍无装备又如何是好？很简单，土法炼钢，干脆由沈阳兵工厂把原有的一批美军GMC10轮卡车以及部分道奇卡车加装钢板，再在车顶装上7.9毫米马克沁水冷式机枪两挺，就变成了“装甲汽车”。

这种“装甲汽车”重达9吨，每车乘员7人，不但火力贫弱，枪塔无法旋转，也没有无线电装备，全靠旗语通信。而解放军在此时已从苏联手中接收了不少日军的47毫米战防炮，对付国军的山寨战车毫不费力。最终，这批在印度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专业装甲兵几乎全部葬送在了东北战场。

北洋时代海军忙于讨薪



“楚泰”号

南京政府建立前，海军的最重要任务是讨薪，通常是某军阀开出一张不菲的支票，几艘军舰就投奔过去，随后奔向出更高价者，叛变无常。1922年1月6日，因北洋政府欠饷一年，“楚泰”等7舰前往两淮盐务

汇集转运的重镇扬州十二圩截留盐税。然盐税被举外债的北洋政府抵押给列强，故各国纷纷抗议，英国军舰前来监视。海军总司令蒋拯强硬通电："海军此举得之则生，弗得则死，誓必达目的而后已。"最终解决，财政部出20万元，江苏督军齐燮元出30万元。

1923年，驻沪的舰队宣布"独立"并高举"联省自治"旗号，实则是一定程度上投靠皖系对抗直系，但经费仍未解决。海军这次玩得更大，拟占领福建沿海地区收取税款，一度占领厦门并设立闽厦警备司令部。该部海军翌年北上，与直系控制的海军在上海海域对峙，双方为保存实力而未开战，在电报往来中直言，若搞垮对方，陆军就不需要你也不会再给你钱。

西路军被俘电台人员立大功

西路军失败后，许多人被马家军（民国西北地区马姓地方军阀部队的总称）俘虏。意外的是，红军的电台技术人员受到了马步芳的礼遇，因为西北苦寒之地缺各种技术人才。于是，6名红军俘虏来到了马步芳设在西宁市的电台总台。台长张之俊告诉报务主任熊维邦，这些共产党部队的报务人员经过九死一生来到我们这里，军人应互相照顾。张之俊同情这些红军，尚有他个人原因，俘虏之一的刘玉庭曾和他一起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共事过。

马家军很信赖这些红军，当天就把6人安置在报务房隔壁的平房里。第三天，6人穿上了电台工作人员的蓝色制服，就可以随意在城里走动。不久，红军报务员曾庆良在街上看见了自己的妻子，她也是马家军的战俘，经过张之俊帮忙，夫妻又得以在一起生活。尽管受到很大恩惠，但6人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开始偷听延安发布的明码电报新闻。1937年4月初，马步芳得知李先念率西路军残部左支队突围的情报，拟电报令部下火速堵截。熊维邦让曾庆良去发这份电报，曾庆良借故扣下了电报。李先念部成功脱险，张之俊怕受牵连就不上报是曾庆良误事，但从此不让红军战俘进报务房。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6人回到了延安。

军校生进京拉洋车求复校

1920年夏，直皖战争爆发，皖系的第15师向直系投降，被收容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里。此时学校无人，第八期学生已放暑假，第九期尚未入学。该师发生哗变，洗劫了军校并焚毁部分建筑。政府无暇筹集复校经费，开学日期过后几个月，学校一直无法复课，学生们万分焦急。

第八期工兵科学生张煦光，想了个破罐子破摔的公关办法，他身穿

军校制服去北京拉人力车，并大呼招揽顾客。毫无疑问，“军官学生拉洋车”成为各家报馆的绝佳新闻。多家报纸还刊登了张煦光递上的一份自述，大意是：“本人在保定军官学校读书，志在报国。现在学校遭到兵劫破坏，无处安身，来到北京。因为生活无着，随身行李典当一空，仅有一身军衣不愿舍弃。为维持生计，拉洋车度日，是自食其力的行为。国家培养我们青年是为国家的前途，虽说军校现在停办，将来一定继续开学。我忍受目前的困难等待开学，是应该的，学校若不能开学，我还要继续拉洋车。”舆论施压下，军校于1921年10月开学，张煦光功不可没。

军中造反派的一幕闹剧

文革对解放军的正常建设造成巨大冲击，在一种迫击炮的列装上都能见到荒诞故事。67式82毫米迫击炮在1968年就定型，军委指示尽快批量生产装备部队，以取代老旧又笨重的53式同口径迫击炮。时值动乱高潮，极左分子以“革命”的理由反对武器更替，他们认为这有悖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他们倡导“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节约精神。

至于53式迫击炮重量大、携带困难，极左分子认为这纯属思想问题，只需要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来克服，红军长征时扛着更笨重的迫击炮照样跋山涉水。有一个造反派出身、火箭式提拔起来的师职干部，发动属下士兵开展一人扛一门53式迫击炮向党表红心的练兵活动，向军内走资派证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能够克服一切困难”。为增加难度，他将比赛场地定在青藏高原，结果重负不堪的士兵走了几百米就严重缺氧被紧急抢救。经此血泪事故后，再没人敢阻止新迫击炮的列装。

抗战时被俘的日军大佐

坊间传言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俘虏的日本军官最高只是少佐，这个说法并不正确。军令部长徐永昌在1944年4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敌驻汉口特务机关长冲野海军上校（即大佐）于飞宁之际经过安庆对岸被我击落，俘解来渝”，供述了日本海军舰船的损失情况和生产能力，并称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之理由，系中国战场已不能速决，更不能再发动日苏战争，而南洋方面资源丰富，故有此举”，并称“现在华日军多属老弱”、“对中国作战皆牵制性质”，徐永昌则评论“此人所言十之八九如同梦语”。

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记载，中国方面

1944年末扩建的重庆日本战俘营里，收容了“某某海军大佐、中野海军军医大佐等较高级的军官”，可以佐证徐永昌日记的记载。

一战的最后一天



1918年11月11日早上5时，德国代表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宣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空前残酷战争的终结。但这并非战争的句号，由于协议将具体的生效时间定在了当天11时，一战还有六个小时才会正式结束。

这明知战争即将告终的最后一天，双方军队却并没能在和平等待中度过，仅在英联邦方面，就有863名士兵死于战争最后一天。这些牺牲部分缘于传令系统的滞后，也有部分是因为指挥将领的刚愎武断，他们自认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夺取败军的阵地和城镇，以增添部队的荣耀，甚至只为早点洗上热水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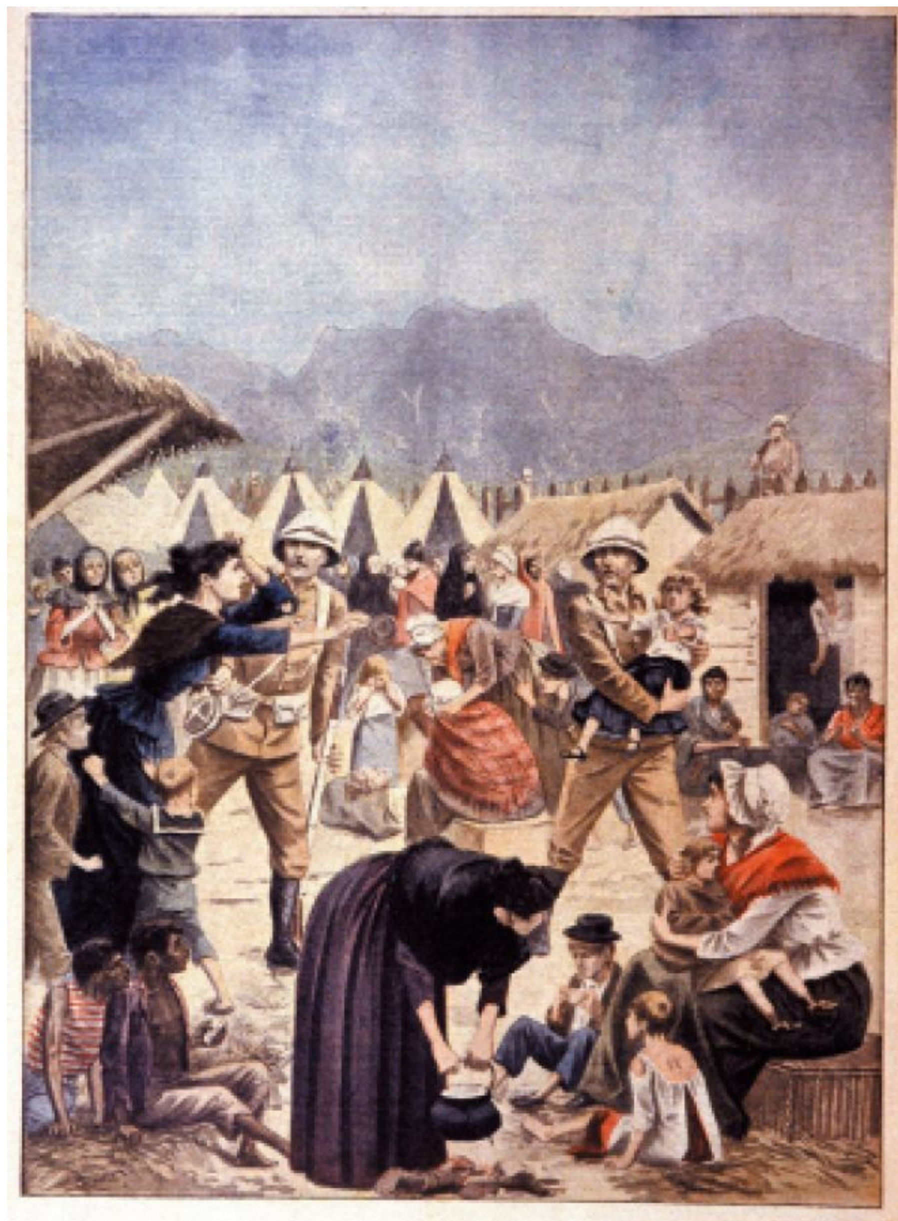
最后一名阵亡的协约国士兵来自美国，当他向敌方阵地发起冲锋时，对方已经知晓停战一事，向他摆手招呼无果后开枪反击。他中枪了，倒地身亡，时间是当天10点59分，他实实在在地死在了和平的门槛上。

清军炮弹被英舰弹回

第一次鸦片战争出现不可思议的一幕，清军炮弹击中英国军舰，英舰无恙，反将炮弹弹回到清军一边，清军因此出现伤亡。

1842年5月11日，两江总督牛鉴奏折："我兵用炮击中大船正身，反将炮子碰回，毙我守炮之兵。提臣见此光景，顿足长叹，自言事不可为。俄而被炮子击中左胁而毙。"原来是清军炮弹重量不够大造成，当时英舰侧面船板都是为了防护最重的实心弹而设计的。以小窥大，可见当时欧洲的战争水平与清朝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清军失败是必然的事，即便有百个林则徐亦无济于事。

慈善家如何拯救英布战争中的难民



第二次英布战争期间，英军借口“加以保护”，将大批妇女、儿童和老人监禁在集中营里。

第二次英布战争期间，南非布尔人的游击战给了不可一世的英军以沉痛的打击。为切断游击队的后勤和兵源，英军借口“加以保护”，将大批妇女、儿童和老人监禁在集中营里。

1900年底，慈善家艾米莉·霍布豪斯从英国来到南非，考察布尔妇女、儿童的处境。她说服了南非的军事当局，让她进入几个集中营参观。艾米莉被她见到的景况惊呆了，她发现布尔人住在拥挤的帐篷里，没有足够的口粮，没有足够的器皿来煮沸和保存清洁水，更没有足够的肥皂来洗衣洗澡；营养不良和糟糕的卫生情况造成了超高的死亡率，成千上万人死在集中营中。

艾米莉将所见所闻写成报告发回英国，尽管英国政府和众多媒体都对她抱有敌意，她的呼吁还是获得了公众关注。在受到反对党强烈谴责后，英国政府终于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按艾米莉的要求调查那些集中营，最终使那些令人发指的弊端得到制止。

宋朝军队的纸盔甲

宋朝军队有一部分盔甲是用纸制成的。据《武经总要》所载，甲制“有铁、皮、纸三等”，纸甲是其中最低等的。

虽然看上去很不可思议，但其实纸甲的发展也经历了晚唐、五代至宋的几十年战乱检验。唐懿宗时，河东节度使徐商“襞纸为铠，劲矢不能洞”，可谓是纸甲的开端。如此的“防护能力”怕是有不少吹牛成分，但纸甲在五代时期却真被用于了实战，后周淮南起义的“白甲军”，便因“操农器为兵，积纸为甲”而得名。

纸甲最大的优势是便宜，制造很快，因此被大量用于防城弓手、乡兵等非正规、防护要求较低的部队。宋仁宗康定元年就曾一次性造纸甲三万，给陕西防城弓手使用。到宋高宗的绍兴二年，还出现了“私造纸甲五领者，绞”的严厉法规，可见纸甲多少还是能在战争中发挥一些作用的。

赞比亚军队把文革“三战”电影当教材



解放军陆军军官马法贤，在1970年代初被派到赞比亚军队做顾问。他回忆，按照中国国内流行的做法，解放军顾问团给赞军放映了电影《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好评如潮。一位赞军士官的发言很有代表性，他称《南征北战》是世上最好的电影，教人如何战胜强大敌人的作战方法和战斗精神，他不忘夸奖解放军是世上最强的军队，打仗方法巧妙神奇。他进而宣布要忘记过去学的英国帝国主义的那一套战略和战术，因为都是骗人的说辞。

更多的赞军官兵喜欢这部电影，是被影片中军官和士兵打成一片、官兵着装一样、行军时军官为士兵扛枪的情节打动。不过，当年经受过英军训练的一批赞军军官，通常对解放军的做法和经验不以为然，对政治教育更是抵触。

苏联希望八路军干扰日军北进

延安和共产国际在1940年底建立了直接的通信联络。1941年秋末，德军前锋已达莫斯科郊区，苏联考虑到日本从远东进攻的可能性，希望八路军能在危急时刻起一定的牵制作用。斯大林再三来电报询问延安能抽调多少兵力、扩充多少部队。延安回复，组织几个师容易，只是缺乏武器，不能发挥应有的力量。对方回复，可以打通同外蒙古的通道，八路军去边境地区领取装备。延安认为此举不妥，部队在蒙古开阔地带补给不易，隐蔽困难。

莫斯科不久后问，若日苏战争爆发，希望八路军在长城一线干扰日军后方。延安未做肯定之答复，只说见机行事，尽可能向长城一线发展，然而担心缺乏装备的部队因为集结过多而被日军一网打尽。八路军最终相对加强了长城内外的部署，而日军在同年年底开启了太平洋战争，便不可能再向苏联宣战。

工商业是战争的最重要支柱





尚在东北作战时，解放军东北野战军这样教育士兵要节约弹药，时任后勤部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的讲话概述如下：

我们造炮弹，一颗山炮炮弹要二百斤高粱米，一颗野炮炮弹要三百斤高粱米，一颗榴弹炮炮弹要四百斤高粱米。所以打一炮就等于打掉一

个中农全年的收入，打一千炮就是打掉了一千个中农的收入。一颗子弹等于十二斤高粱米，一颗手榴弹相当于二十多斤高粱米。而在山海关以内，弹药造价是关外的四到五倍。

由此可见，工农业产值对比明显，工业输血才是获得战争胜利的首要保障。经历伪满时代后的东北，是当年中国最完善、最大的工业基地，它不仅让林彪部队成为解放军四大野战军中的最强者，也为解放军获取最终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目标故宫，中国军队首次空袭



张勋

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便激起全国各派势力的联合讨伐。7月11日，南苑航空学校奉国务总理段祺瑞之令派飞机轰炸。飞机是法国制造的双座教练机，挤在一起的三名机组人员是校长秦国镛、教官姚锡九和鲍丙辰，他们都曾留学法国。此机除了教学外只能作观测用，需要乘员从机舱里用手往外投掷手榴弹。轰炸目标是辫子军在丰台的阵地、张勋在南河沿的住宅、紫禁城乾清宫。

飞机慢速低飞，炸弹威力很小，根本谈不上精度。好在飞机在当时中国是新鲜东西，对地轰炸这般“高大上”军事行动能严重打击对方士气。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里记载，飞机扔下三颗手榴弹，一颗

落在隆宗门外炸伤一名轿夫，一颗落在御花园里炸坏水池一角，一颗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瓦檐上未起爆。“我正在书房里和老师们说话，听见了飞机声和从来没听见过的爆炸声，吓得我浑身发抖，师傅们也是面无人色。”

华约组织里最有价值的间谍



苏联时代波兰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司的库克林斯基上校，11年里不求分文地为中情局提供了华约组织5.8万页的情报，多数为俄文。里根时代的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赞誉他为“从海参崴到易北河之间最有价值的情报人员”。

库克林斯基生于1930年，在16岁时参加波兰人民军。时值联合政

府时期，他按传统在天主教堂宣誓，誓言并未包括忠于苏联和波兰人民政府。他业务能力出类拔萃，晋升顺利，随后深得华约总司令库利科夫的欣赏，且在北越时结交了克格勃高层朋友，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因此对他青睐有加。拥有远大前程的他，在接触高级情报上有诸多便利，他提供的最高价值军事情报是苏军各指挥机构的具体信息，以便美国发动斩首行动。因此他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美苏战略，撬动冷战格局。

1981年他出逃到美国，1984年波兰缺席判处他死刑，1997年他被恢复名誉，1998年他回国受英雄待遇，2004年他在美国去世。波兰在2014年上映讲述其故事的电影《华沙谍战》。

格朗嘉宾眼中的蒙古帝国



收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绘于1310年的作品，描绘了蒙古骑兵烹饪与饮食的场面。

13世纪，蒙古帝国在草原崛起，东征西讨，疆域横跨欧亚。蒙古人向波兰、匈牙利发起的攻击令罗马教廷感到担忧，于是派出格朗嘉宾为使节，前往蒙古刺探这个未知的敌人，并考察与之讲和、结盟及向其传教的可能性。

根据自己的出使经历，格朗嘉宾写了一份报告书。他认为欧洲人不可能与蒙古媾和，因为成吉思汗命令蒙古人征服全世界，而对他们唯命是从将意味着“无可容忍的奴役身份”、“灵魂堕入地狱”。唯一的选择是与之作战，对此，格朗嘉宾似乎毫不畏惧，他认为蒙古“人数微少而且在体质方面也较低劣”。他评价道，蒙古人的优势在于置之死地的英勇和40年连续作战的经验；而欧洲人在装备方面有所长，应利用好弩炮、护甲等，但最重要的是要联合起来。

格朗嘉宾的报告第一次向中世纪欧洲提到了中国，但他对中国极不了解，误以为南宋位于海上，还以为中国人“拥有自己的圣人，崇拜唯一的一尊神，敬重我主耶稣，信仰永恒的生命，但从不举行任何洗礼”。

国民党军的骆驼兵团

民国时代，甘肃河西走廊以北地区“干燥少雨、寒暑剧烈、植被稀疏、人迹罕至”，一直有土匪四处流窜，打劫商旅，但沙漠地带不仅步兵难以机动，连骑兵都因草料不足无法长期战斗。1947年，国民政府为了巩固沙漠边防，确保玉门油田的安全，决定以骆驼代替马匹，成立了“陆军独立骆驼兵团”，该团编制官兵3586人，骆驼、马匹4000余头，设四个驼兵连及炮兵、重机枪、通讯、卫生等连，还设置了骆驼研究室、驼兵试验队、放牧队等机构，研究骆驼的鉴别、饲养、繁育、放牧、使役、调教、训练等科目。

骆驼兵团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便随着国军的崩溃于1949年9月在甘肃酒泉起义。随后，该团被改编为解放军第3军骆驼骑兵团，第一次战斗已经是1950年进入新疆围剿乌斯满武装集团了。

天安门背后的秘密防空

1949年10月1日，华北军区政治保卫部三科科长张鼎中参与了保卫天安门阅兵的工作。他筹备防空，除了对驾机参加阅兵的飞行员做严格政审外，还要指挥负责现场防空的高射炮部队。当时，解放军在天安门城楼以北、端门西侧部署了4门高射炮，用汽车和木板围起来做伪装。

敌机一旦来袭，高射炮及时捕捉目标尤为重要，然炮阵地因城楼阻挡而无法观测天安门前的空域。他们采取了一个土办法，典礼中站立在城下东南角的杨成武一旦发现敌机，就举起一米见方大的红旗；站在城楼上东北角的张鼎中见到杨成武的信号，便也举起红旗；端门西侧的高射炮立即开火。杨成武交代，一旦敌机到来或者我方飞行队有人朝天安门俯冲，务必做到旗举炮响，炮响机落，一定要保证中央首长和民主人士的安全。

整个典礼中，张鼎中神经高度紧张，最终相安无事。因任务属于高度机密，他一直守口如瓶，直到在2013年出版的回忆录里才公布往事。

英勇的解放军朝鲜战士



不仅解放军中有很多朝鲜族战士，文艺工作者也不乏朝鲜人，《解放军进行曲》的作者就是韩国光州人郑律成。

国共战争东北战场上，有大批朝鲜人加入解放军，在辽沈战役的黑山阻击战中曾发挥重要作用。开国中将刘转连回忆，他任师长的10纵29师有个成建制的朝鲜步兵营，黑山阻击战时团长卢发来提着一捆手榴弹赶赴前线指挥，士兵们和他说话都听不懂，通过翻译才知道是“你提的手榴弹交给我们投就行了”的意思。

战斗激烈时，该营营长的通讯员都抱着手榴弹冲向敌群同归于尽。开国少将贺庆积回忆，他任师长的10纵28师83团8连在黑山阻击战中连续打退国军六次进攻，获得了“钢铁连守得顽强攻得勇猛”锦旗，第一排获得“英雄排”称号，这个连共127人，其中有77名朝鲜人，包括一人荣立三个大功、被授予“阶级硬骨头”称号的班副崔长哲。

海外的中国军人墓地



韩国中国志愿军墓地。

缅甸的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公墓和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公墓是海外中国军人墓地中最著名的两组。近年，分布在南亚到太平洋诸岛之上的其他中国军人海外墓地也陆续被人熟知。

巴布亚新几内亚拉包尔的中国抗战将士墓地曾在2008年底震动两岸，收葬者多为被日军押来做苦工的国军俘虏，其中还包括数名淞沪会战后退入租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闯入租界俘获的“八百壮士”成员。2009年，台湾军方在当地举行了招魂仪式，将忠魂牌位迎回台北忠烈祠。在印度兰姆伽也有一处驻印军墓地，收葬了战车训练班少将副主任唐铁成等因病或事故死于此地的官兵。在越南、老挝等地的中国军人公墓则属于60年代“抗美援越”、“抗美援老”的解放军军人。在韩国坡州，还有韩国政府修建的志愿军无名军人墓地，2014年已经有437具遗骸移交中国方面。

廖耀湘的勋章胜孙立人一筹



爵士司令级大英帝国勋章（K.B.E）

1942年，新38师师长孙立人因在印缅战场作战有功，获得英国颁发的司令级大英帝国勋章（C.B.E）,一时传为佳话,甚至有人称之为“现代史上第一位以军功获得外国勋章的中国人”。其实并非如此，早在1941年，英国就向参加香港保卫战的中国海军中将陈策授予了更高一级的爵士司令级大英帝国勋章（K.B.E）。

大英帝国勋章只是英国勋章体系中位阶较低的一种。日后与孙立人同在印缅战场作战的新编第6军军长廖耀湘，获得过比大英帝国勋章位阶更高的爵士司令级巴斯勋章。美国人对孙立人、廖耀湘战功的态度也与英方出奇的一致，他们授予廖的是金叶自由勋章，授予孙的则是低一级的银叶自由勋章。

“刺廖案”险些将国民党元老一网打尽



1925年8月20日，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亡，史称“刺廖案”。

案件发生后，国民政府派蒋中正、许崇智、汪精卫组成特别委员会进行查办。苏联顾问鲍罗廷于廖仲恺遇刺第二天，向委员会提交一份罪犯名单，上有邹鲁、胡汉民、谢持、邓泽如等国民党元老，要求立即拿

办。委员会问：“毫无证据，怎样拿办？”鲍罗廷回答：“政治上只问政见同不同，不问证据有没有。”

虽然鲍罗廷强烈坚持，但委员会中蒋中正、许崇智二人竭力反对，抓捕行动才没有最终实施。

“九·一八”事变中的帅府

“九·一八”当晚，在隆隆炮声中，守卫少帅府的侍卫副官长谭海唤醒所有卫兵，他嘱咐：“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绝对听我指挥，你们上岗待命，等我请示副司令再做决定。”焦虑的谭海整晚守在电话前，一次次向正在北平顺承王府的张学良处报告情况，并请求指示。张学良未给明确命令，只是令保护好府内的武器和贵重物品。众人将武器埋在少帅府东南角地下，并将各机要室的门锁上，集中所有钥匙。翌日上午10点，日军来占领帅府，谭海通知卫兵交岗，并告诉大家：“现在分散以后尽快到北平顺承王府集合。”

“我将公馆贵重物品及武器安排好了。”谭海到北平后立即向张学良汇报，“武器全埋在院里，各屋的东西，我将门都锁好，将各门的钥匙带来了。”张学良顿时怒骂：“不是人，什么东西。”卫队成员们第一次见张学良发这么大的火，此前张学良一直尊称谭海为叔叔。

第六章 文化圈不文化的事儿

文化人的思想检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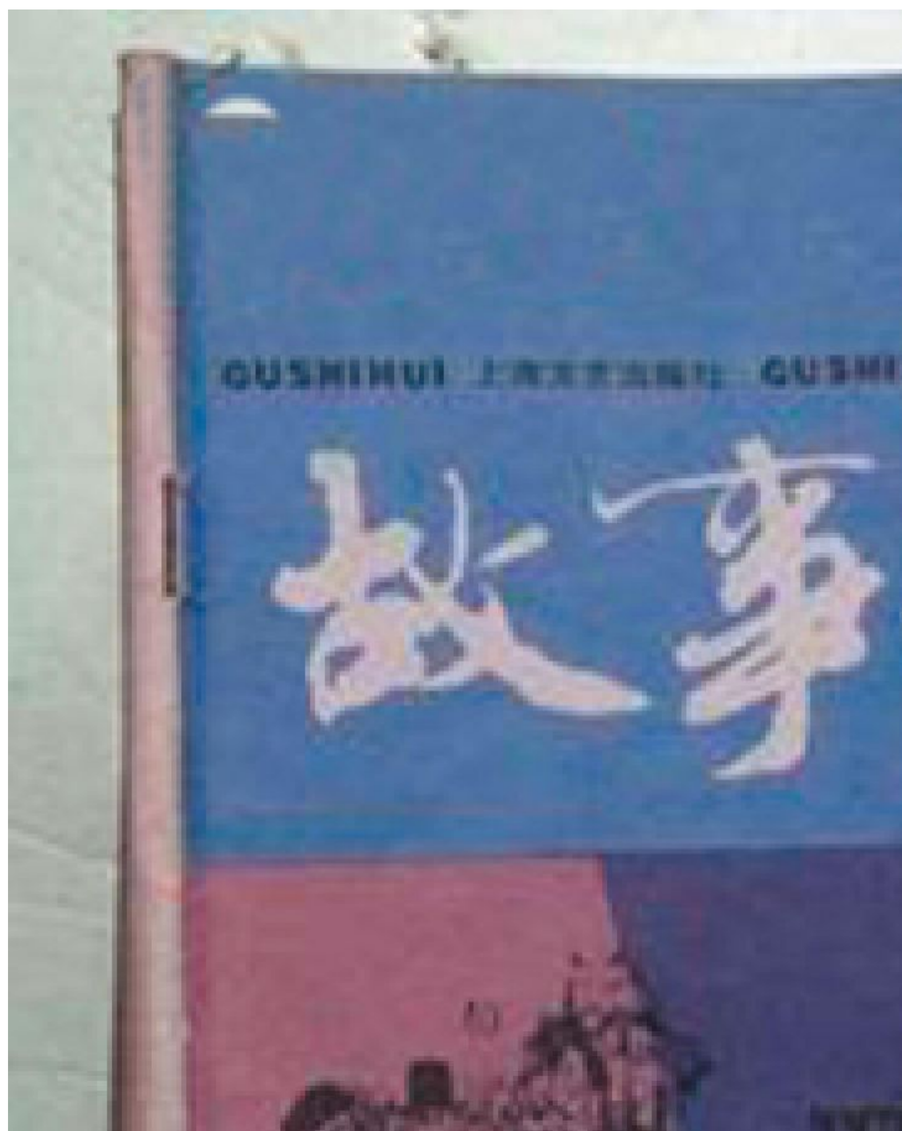
1938年，民国西康省委员长刘文辉全家照

谭其骧留有两册笔记，内容是1952年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思想改造运动，记录了多位教授交代的长篇“罪行”，和组织给予的“意见”。如周谷城交代，在旧社会“讲究衣着服饰，衣服穿旧了就扔掉，太太看到了又捡回来。口袋里当票一大把，却经常上馆子吃饭。太太要教书，还要烧饭洗衣，很辛苦，我不体会。”谭其骧检讨“思想问题”，“前几天听陈毅市长和舒同主任报告的大会上打瞌睡，主要原因是上一天晚上为了赶文章睡得太迟，人太疲倦，会场上又禁止吸烟，所以精神不支，但归根结底，还是重视不够。”

在学术方面，胡厚宣说自己，“认为政治与学术应分离，纯学术，有意无意倒向反动，走学术救国道路”“不肯参考吕振宇、范文澜等著

作，想独出心裁，堆填材料……解放后，理论没有学好，因而未能与马列主义结合，或太生硬……”

《故事会》的诞生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脍炙人口的杂志《故事会》，是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创刊的。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社会主义教育，应面对阶级斗争形势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全力支持大讲革命故事的活动，将革命故事视为占领农村文化阵地的得力武器。1963年前后，上海郊区农村首

先兴起编讲故事热，最终成为在城乡同时进行有组织的群众文艺活动，故事员们在工农兵群体里积极活动。为帮助故事员解决故事脚本的匮乏，1963年7月《故事会》在沪创刊，至文革爆发时共出版24期，还将许多故事单独印成册在部队、农村、工厂发行。

汉朝的鹰鸽辩论

汉武帝时期，朝臣曾进行过两次对匈奴政策的辩论。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135年，匈奴使者到长安请求和亲，大行令王恢认为匈奴“率不过数岁即背约”，劝皇帝“举兵击之”；御史大夫韩安国则持相反意见，他指出“千里而战，即兵不获利……匈奴……迁徙鸟集，难以而制”，主张和亲。最终，“群臣议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亲”。

两年后，豪商聂壹通过王恢向汉武帝建议，趁匈奴亲汉，诱骗他们进入马邑，设大军伏击。韩安国把之前的理由再讲了一遍，仍强调匈奴在战略及战术上都难以制服；王恢针锋相对，声称以中国之盛，击败匈奴只需要“遣百分之一”，认为伏击战的计谋极好，“单于可擒，百全必取”。

这次辩论的结果拉开了汉匈鏖战的大幕，实际上，武帝用兵决心已定，辩论只是形式而已。尽管马邑之围被单于识破，计谋失败，也只是断送了主战大臣王恢的性命；皇帝对战争的爱好再也无法停止，汉王朝从“蓄积岁增，户口寝息”走向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1949，一份进步报纸的转型

知名报人徐铸成回忆，《文汇报》停刊前最多有近20名地下党，报纸在上海易手时复刊，仅剩一名候补党员。然复刊后颇有坎坷，报纸的旧习气多遭组织上批评。徐铸成他们通过广播得知解放军攻下长沙，翌日刊登此新闻，被指责是资产阶级办报纸的抢新闻陋习，因为新华社尚未发正式公告。

刊发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时，毫无政治经验的编辑擅自加章节小标题，遭严重批评。经此二事后，报纸人员加强学习新时代的办报经验和方法，徐铸成称其为“当时必经之‘改革’”。同时，因为对新的政治陌生，徐铸成在写社论时亦感到困难，所幸得到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夏衍、副部长姚溱的很多细致帮助，方才逐渐适应新时期的办报。至1950年年初，《文汇报》销量达到十万份。

桂冠诗人的苏联观



1962年8月，诗人聂鲁达与夫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周边散步。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智利人聂鲁达以恣意汪洋的情诗闻名于世，他对待苏联的态度像对待爱情一样，变幻无常又始终如一。聂鲁达曾经因歌颂斯大林的诗歌获得斯大林文学奖，苏共二十大之后又把斯大林称

为“冷酷的人”。苏联入侵捷克的时候，他歌颂“苏联是我的母亲”。索尔仁尼琴被迫害，在他看来“只不过是玩笑”。至于对待核武器的态度，更像是恋爱中阴晴不定的小女生——美国的氢弹可耻，但苏联的氢弹“像太阳一样光辉灿烂”。

晚清的新式学堂生活

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汉开设“两湖学堂”，课程既有论语、周礼、尚书，也有数学、地理、测量、化学及体操等科目，所聘请教师梁鼎芬、杨守敬等均为一时之选，张之洞称赞“皆为海内绝学”。而学生的待遇尤其优厚，每人宿舍有两间，一间书房，一间卧室；每月可以领膏火银四两，每月考试时，成绩列“超等”的，可以得到奖金十二元，连“平等”的也能得到八元奖金。学生张知本回忆“当时米一石只售数百文钱，故学生生活极为优裕，甚至可以赡养家眷”。而考试的计分体系最为独特，以四分为最高，因为张之洞认同宋代学者邵雍对司马光“君实九分人也”的评价，认为学生能够达到司马光的一半，“即足为当代佳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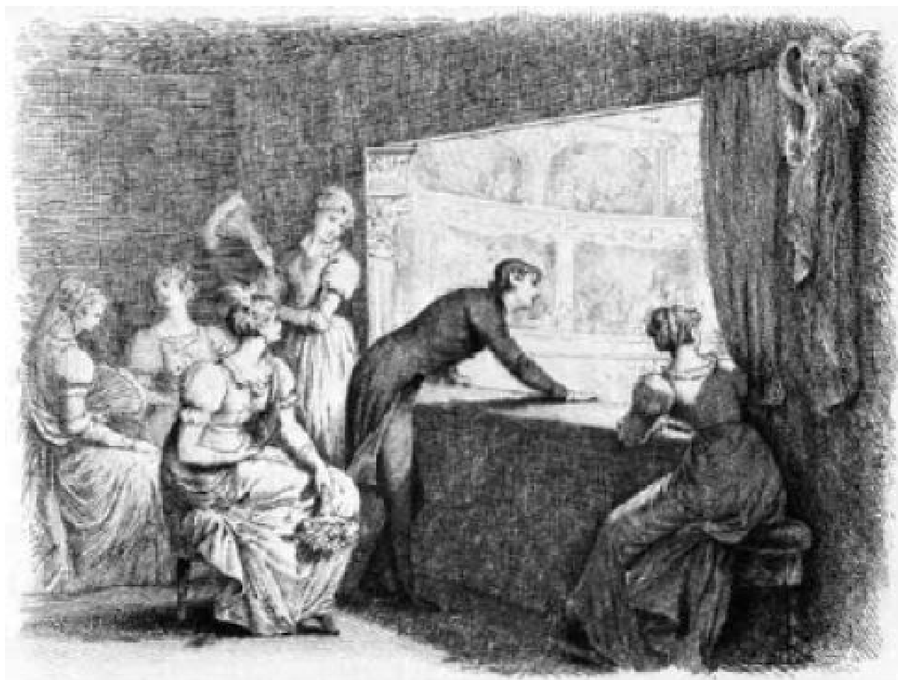
青帮大佬与国学大师的交情



青帮大佬杜月笙与国学大师章太炎交情不浅。本来，二人云泥之别，不会有什么交集。但事情就怕凑巧，章太炎有一个侄子，正好居住在法租界，他与一位颇有背景的人士发生了房屋纠纷。他求章太炎帮他出头。章太炎早就听闻过杜月笙的大名，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杜月笙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杜月笙也早就知道章太炎的大名，很快就把这事给摆平了。由此，杜月笙就和章太炎有了交情。

杜月笙原名杜月生，章太炎为其改名为镛，号月笙。并引经据典："《周礼》上讲，'东方之乐谓笙'，笙者生也；'西方之乐谓镛'，镛者功也，故取名为镛，号月笙。" 后来，杜月笙要修建杜氏祠堂，章太炎不惜以国学大师的身份，亲自为杜月笙修订了杜氏家谱，可见二人交情之厚。

《红与黑》故事来自一则轰动新闻



《红与黑》插画：于连在剧院包厢中，露出半个身子。

法国作家司汤达在其名著《红与黑》中，塑造了于连这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其实，这个人物并不是司汤达凭空虚构的，而是有其原型。不仅仅是于连，《红与黑》的整个故事都不是司汤达编造的，而是来自于当时一个引起轰动的新闻事件。

事件的主角叫贝尔德，是一个神学学生，他先后在米修和歌东先生家里担任孩子的家庭教师，但他相继诱奸了米修的妻子和歌东的女儿。事情暴露后，他被解雇。他的理想是做一名牧师，所以需要继续学习，但由于其不佳的名声，没有哪家神学院愿意接收他。理想破灭后，恼羞成怒的贝尔德病态地认为自己的处境是由那两个家庭造成的，于是，他决定"报仇"。一个星期天，趁着米修的妻子正在做礼拜时，贝尔德开枪将其打死，然后又举枪自杀。可惜，枪伤没能让他毙命。不过，他也难逃一死——最终，法庭判其死刑。

日本也流行过各种指南书

《农民工进城防骗手册》、《农民工进城赚钱秘诀》、《如何带病赴宴》、《写得像郭敬明一样好》、《怎样嫁个好老公》、《怎样对付打小报告》等中国大陆出版的指南书，种类繁多，题材让人哭笑不得。在网民把这些书当笑料传播的同时，他们也许不知道，当年日本也有过指南书炙热的时代。

《速记术讲义录》、《新发明珠算速成讲义录》、《警察、看守培训讲义录》、《普通文官培训讲义录》、《小学教员培训录》、《接生学讲义录》、《不为人知的有前途的职业介绍——针灸学院讲义录》、《新式袖珍英语讲义录》、《矿业讲习录》……这些书都是日本大正时代用于帮助想当“有资格的劳动者”获得工作资格。大正时代，是自元禄时代后第二个阅读大众化的黄金期。

除了职业基础知识书外，还有各种养生学、成功学、心灵鸡汤的指南书大行其道，有些书实用性很强，有些书仅书名就让人哭笑不得。如《嫁人文库》、《妇女职业介绍》、《发迹东京》、《独立自营事业成功术》、《成功秘诀之小学徒读本》、《健脑记忆法》、《发明制造包点》、《礼法与婚姻法》、《予人好感的谈话术》、《年轻男女书信写作法》、《男女东京游学指南与学校评价》、《股票投机秘传》、《催眠秘术讲习录》、《中学、女校、师范学校及其他学校的入学应试法》等。

大正时代的日本经济发展迅猛，城市化建设扩张剧烈，产业升级制造出更多崭新的工作机会，现代政治理念的普及让妇女加速走向职场。迅速的时代发展让人眼花缭乱、措手不及，故走捷径、直接帮助解决最迫切需求的各路指南书，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随兴编出的爱丽丝梦游仙境



1907年版《爱丽丝梦游仙境》插画。

《爱丽丝梦游仙境》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为出色的童话及绘本，它原本是作家查尔斯·路德维希·道奇森送给一位小姑娘的礼物，而这位小姑娘——爱丽丝·李德尔就是童话主角爱丽丝的原型。

1862年7月，道奇森在靠近牛津的一艘游船上旅行，同游的有牛津大学副校长亨利·李德尔的三位女儿。为了消磨时光，道奇森编了一个"越荒诞越好"的故事，讲给女孩们听，他挑选了最疼爱的爱丽丝做主角，而船上其他游客则被他变成了鸟类，道奇森自己是一只装模作样的渡渡鸟。后来，这个故事以《爱丽丝的地底冒险》为名被记录下来，道奇森精心绘制了童话的第一个绘本，作为圣诞礼物和"夏天的回忆"送给了爱丽丝。这个手绘本相当精致，爱丽丝被画得很成熟，道奇森照搬了前拉斐尔派的风格来描绘这位女孩。

制作这份礼物的同时，道奇森自己也意识到了童话的潜在价值，他改编了原版故事，将长度扩张了一倍，加入了三月兔等经典角色，并选中政治讽刺画家约翰·坦尼尔来绘制书中的插画。坦尼尔是个要求严格的人，第一批印刷的2000册书因他嫌弃印刷质量而遭废弃，图书的正式发行也因此拖到了1866年。随着《爱丽丝》的走红，这一批"次品书"变成了收藏家竞逐的珍品，现在在稀有图书市场，一本1865年版的《爱丽丝》能卖到几十万英镑。

《西行访问记》：中译本出版早于英文原著



1932年初，海伦·福斯特·斯诺采访上海市长吴铁城（右一），时值“一·二八”事变期间。

海伦·福斯特·斯诺，是埃德加·斯诺的前妻，继丈夫在1936年成功采访红军领导人后，她于1937年春走访了延安。通过这趟远行，她写了《续西行漫记》和《革命人物传》两本书。后者记录了她和红军领袖的谈话，有朱德、徐向前、萧克、贺龙、罗炳辉、项英等人。此前红军高层尚未向别人详细聊过自己的生平经历，此书可算是红军领袖们的第一部集体自传。

出于对外宣传的迫切需求，《革命人物传》在美国的出版事宜尚未落实前，书稿就到了共产党的译者手里。中译本改名为《西行访问记》，1939年4月由上海译社出版，译者署名华侃，为报人汪倜然的笔名。此书英文版本姗姗来迟，直到1952年以《红尘》为名在英国出版，1971年增订版改名为《中国老一辈革命家自传》在美国出版。1994年9月，它在中国第二次出版，改名为《西行访问记：红都延安秘录》。

《包法利夫人》的遭遇



法国画家Charles Lucien Léandre为包法利夫人所作的插图。

现在我们都知道，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大作。但这本书刚刚出版时，却没有赢得评论家们的青睐。他们要么对之大加嘲讽，要么干脆置之不理。当时，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一本叫作《范妮》的小说（现在，这本小说早已被时间淘汰）。不过，读者对于《包法利夫人》十分喜爱，随着该书在大众中引起的反响越来越热烈，评论家们才不得不改弦更张。

与此同时，又一个坏消息传来：该书的作者和出版社受到了起诉，罪名是有伤风化。在法庭上，公诉人从书中挑出了许多段落，声称：这些描写太过色情。现在看来，这个起诉是多么的可笑，因为《包法利夫人》中关于情爱的描写实在是保守得很。但在该书出版的19世纪，大概已经算是露骨了。好在最终的结果不错，福楼拜请了一位得力的律师，他当庭反驳道：这些段落的描写都是出于文学的需要，必不可少，而且小说的主题是积极向上的，女主角爱玛因为自己的不检行为而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审判员们的文学修养不错，他们接受了被告律师的观点，当庭宣判无罪。

柏杨抓住了《厚黑学》的精髓



民国奇人李宗吾，因为写了一本《厚黑学》，被世人称为“厚黑教主”。由于他的厚黑理论独树一帜，妙趣横生，引来很多后世学者的研究。历史学者柏杨就是这些研究者中的一员。柏杨到底研究得如何呢？从他的《李宗吾之学》一文中可以略作窥测。 在文中，柏杨写道——在全部《厚黑学》和传记之中，有两点值得大书特书，读者先生不可不知。其一，他（李宗吾）曰：“大凡行使厚黑之时，表面上一定要糊一层仁义道德，不能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凡是我的学生，一定要懂得这个法子，假如有人问你：‘认识李宗吾否？’你就要板出最庄严的面孔，说道：‘这个人坏极了，他是讲厚黑学的，我不认识他’。”……

由此可见，柏杨先生的研究可谓抓住了《厚黑学》的精髓。



《魔戒》作者原来是学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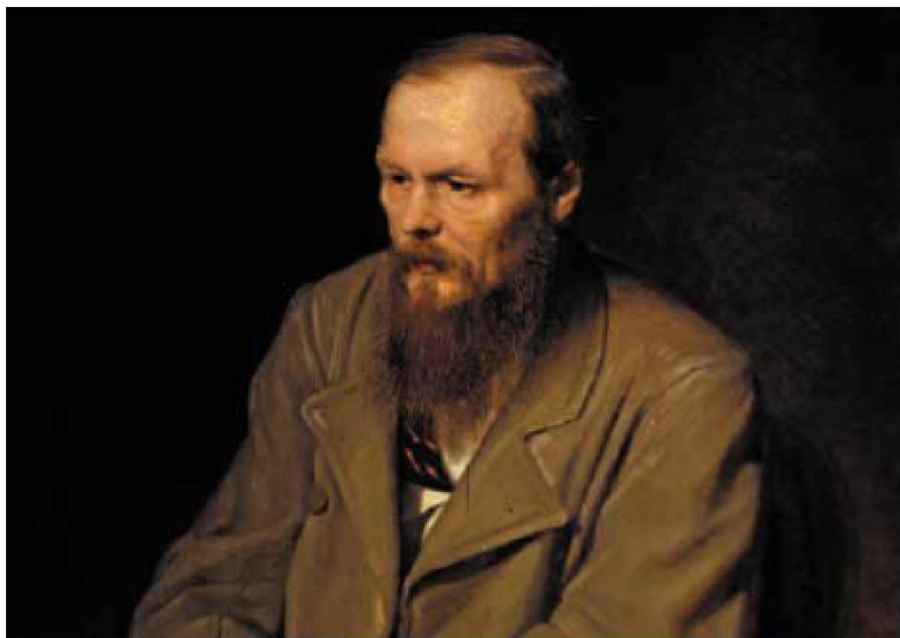


约翰·托尔金写出了广受读者喜爱的《魔戒》，是奇幻文学的泰斗级人物，然而作家只是他的副业，其本职是语言学教授。母亲从小教他英、法、拉丁、希腊四种语言，中学时代托尔金是学校辩论队的顶梁柱，他还可以用地道的希腊口音表演古希腊戏剧。

上大学后，托尔金深入研究古英语、芬兰语、冰岛语、中古威尔士语，他所著的《中古英语词汇》是语言学的重要作品。1918年他参与编写《牛津英语词典》，接触了英国及北欧的各种神话和民间故事。2年后，托尔金当上利兹大学的英语高级讲师，1925年回到牛津工作，成为该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当时他才32岁。

更令人惊讶的是，托尔金在十岁时，就开始自创语言。《魔戒》系列一共有15种语言，精灵所讲的昆雅语十分完备，拥有严格发音、语法的词汇表，一句“我爱你”有34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赌瘾极大的文豪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时是个赌瘾极大的人，只要口袋里有钱，他必定要坐在赌桌旁。输光后，他就会给朋友们写信借钱，借来的钱也输光后，他会把手头一切值钱的东西都典当了，并且搬到更便宜的公寓去住。即便这样，有时候还是输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他曾经在赌桌旁宣称：“一个小时之内，我将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他的赌术实在不怎么样，除了输还是输。

最终改变他命运的，是写作。《罪与罚》的出版获得成功后，有出版商愿意每月寄给他二百卢布，让他创作一部新小说，在杂志上连载。这部小说就是后来的《白痴》。但《白痴》没能让对方满意，他又创作了《永久的丈夫》，之后又创作了《群魔》。正是这部《群魔》改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命运。1871年，在妻子安娜的说服下，由安娜自己出版了《群魔》，结果大获成功，之后，安娜又推出他各种版本的作品，获利丰厚。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总算实现了财务自由。但诡异的是，这时他对赌博好像已经没什么兴趣了。

杜月笙的朋友圈

杜月笙15岁开始闯荡上海滩，因缘际会，终于成了沪上闻人。飞黄腾达后，杜月笙决定在老家盖一座杜氏家祠。1931年夏天，家祠落成，杜月笙举行了盛大的开祠盛典。

听到消息后，杜月笙散落在各地的友人，纷纷派人送来了贺礼。其

中最多的是牌匾，其次是联、屏、幅，还有古董器玩、旗伞花篮，甚至礼券现金，琳琅满目，不一而足。

尤其需要说一说的是杜月笙收到的牌匾。当时的社会名流，上到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王正廷、实业部长孔祥熙，各省主席以及曾经的北洋军阀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吴佩孚、张宗昌、张学良等，下到淞沪警备司令、警察总监，都送来了牌匾。当时一家日本报纸这样写道，“足以见杜月笙在各界中伟大声望之征象。”

编造与慈禧艳遇的英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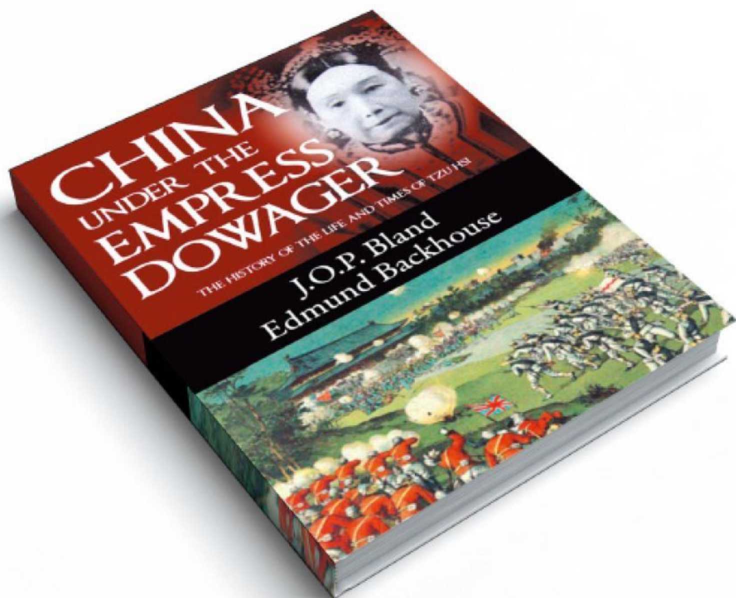
四十幾歲時的埃蒙德·特拉內·巴恪思男爵 (1873-1944)
Sir 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

清朝深宫如万重帘幕，叫外人难窥实情，即使是实际掌控中国半世

纪的慈禧太后，也很少与西方人会面，让他们只能以猜想、打听为主的形式去了解这位晚清一把手。

然而，在众多西方人中，竟有一位声名并不显赫的英国人拜克豪斯，用两册回忆录详细“回忆”了他与慈禧的多年亲密接触：他在戊戌变法当年来到中国，并在义和团动乱中挽救了600件宝物、25000卷图书。两宫回銮后，他通过大太监李莲英，归还了这些皇家文物，其中就有慈禧喜爱的精致玉雕。看到宝物失而复得的慈禧大为欣喜，亲自接见了拜克豪斯，还赐予爵位。此后，他与慈禧接触渐多，终在荣禄死后与她发生关系——太后虽年过七旬，精力依旧旺盛，甚至在得知拜克豪斯的双性恋身份后，要李莲英为他们安排了一次多人游戏。

根据后世历史学家研究，拜克豪斯的回忆录纯属虚妄之谈。然而他与《泰晤士报》记者合著的有关慈禧及晚清史事的专著，却长期被西方引为权威，他的妄想症当然不会限于其回忆录，因此，当拜克豪斯被证明是骗子后，西方知识界一片哗然。



儒释道象征都被带到台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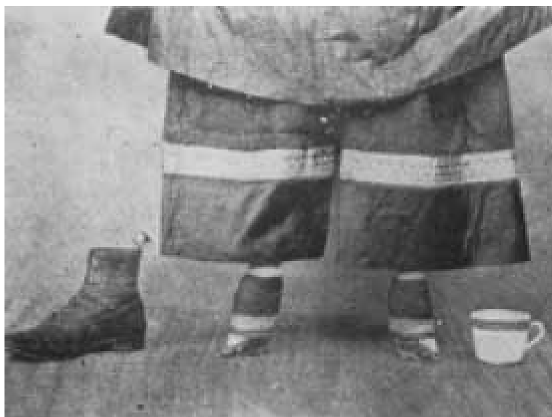
1949年国民党迁台，人们都认为只有大量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以及故宫文物被带过去了。其实除了这些物质之外，如中国儒释道三家的象征这种非物质遗产也迁台了。

孔子的孔氏家族从宋仁宗时受封“衍圣公”，此后历朝历代均由孔家嫡系继承，可谓“万世一系”。民国时，改“衍圣公”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1949年，孔子第77代嫡孙孔德成随国民政府迁台。2008年，孔德成病逝，其长孙孔垂长接任“奉祀官”。

汉传佛教迁台的著名人物，有临济宗41世及曹洞宗47世法嗣白圣法师，华严宗高僧智光法师，净土宗高僧道源法师等，目前享有盛誉的星云法师也是在1949年前往台湾。而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的七世章嘉活佛也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在台湾重建中国佛学会。

道教“正一道”的张天师自东汉时开始传承，宋朝后北方道教以全真教为尊，南方道教以正一道为长。张天师自元世祖正式册封为神官，由张家世代传承。1949年时，第63代天师张恩溥迁台。张恩溥于1969年羽化，目前在台湾的是第64代天师张道祯。

晚清教会如何反缠足



晚清来华传教士对中国社会泛滥的吸鸦片、缠足、赌博、溺婴、养婢女、嫖娼、纳妾等陋俗多抱有强烈的批判心理，他们创办的《万国公报》及其前身《教会新报》，也成了他们鼓吹社会改良的舆论阵地。有趣的是，这些教会报纸在宣扬陋俗之弊时，往往会入乡随俗，创造许多符合中国人心理的说辞。其中，对女子缠足的反对尤为典型。

《万国公报》搬出形形色色的理由来证明缠足有百害而无一利。除了引用儒家经典进行新解，还广泛使用中医理论。如谓缠足不利生育：“心怀伊郁，饮食未能消化，动转未得快然，加之寒暑不调，就冷贪凉，则白带经闭，与经血妄行，诸症因之又渐而入，安能受孕成胎？”说缠足女子纵然生子也难健康，因她们“多坐而少走动，血气不舒，易生疾病，产子甚难，其身多软弱，生子女亦软弱。”

迎合传统之外，《万国公报》也迎合了正在萌生的中国民族主义。如将中西对比，“今中国男不得女助，他国男女皆口勉同心”，称缠足女子无法为国家奋起出力。华人基督徒甚至还创造了一个符合汉民族主义的传说，将妇女缠足归咎于“辽金元等北寇掳掠”，汉人“不得已而举爱女之双足忍苦缠之，谓犹胜于被掠北行”。

文革沪上小报胡编新闻盈利



文革时上海有四类报刊，一类报刊是公开发行的，二类是工总司、红代会等市级群众组织和主要高校的群众组织办的；三类是各局系统和广大基层单位的群众组织办的；四类是小群体编印的“地下报刊”。后三类报纸属于群众报刊，为占据市场，擅长假借权威、装作通达四方、热衷揭示“幕后”，第四类尤甚。

1967年7月10日政宣组披露检查第三类报纸的情况，指责某些报刊传播政治谣言“为美蒋张目”。典型如《文革通讯》称美国派遣2千至3千间谍到香港专门窃取我文革情报；《红卫兵通讯》称“台湾消息：蒋匪一雷达系统设施移至我沿海。”另有报刊编写马路新闻迎合低级趣味，如“刘亚楼之死”、“陈丕显与雪茄烟”等。

第四类报刊的伪造新闻做法最恶劣，如每期印数在2万到3万的《前锋通讯》十分关注“部队动态”，捏造“广州白云机场的空军已取消休假，珠江舰队已调往虎门”。特殊年代，这些胡编乱造军事新闻和党史野史的报刊都能赚到不少钱，足够让一个小团队改善物质生活。

汉初“黄老之学”治国并非无为而治

教科书在提到汉朝初年时，总是说从汉高祖刘邦开始，一直到文帝、景帝，统治者们都是奉行着“黄老之学”治国，讲究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这才有了“文景之治”。直到汉武帝“独尊儒术”，黄老治国的局面才结束。

其实，这是教科书为了省事而向学生们传递的错误信息。汉朝初年，虽然经过秦末大乱而百业凋敝，人口锐减，确实需要休养生息，但汉朝从高祖直到景帝，一直受到来自军吏大臣、诸侯藩国以及北方匈奴的挑衅和威胁，即所谓“反者九起，几无天下者五六”。仅有清静无为是根本不足以维系政权的。黄老之学也就是黄帝、老子之学，老子之学自然是清静无为，而黄帝之学其实是法家刑名之学，来自于战国时期的齐国稷下学宫，其经典是《黄帝四经》。汉初诸帝，用黄帝刑名之学来应对政治斗争，用老子无为之学来安抚百姓，这才维持了政局的平稳，也使得百姓能够休养生息，积蓄了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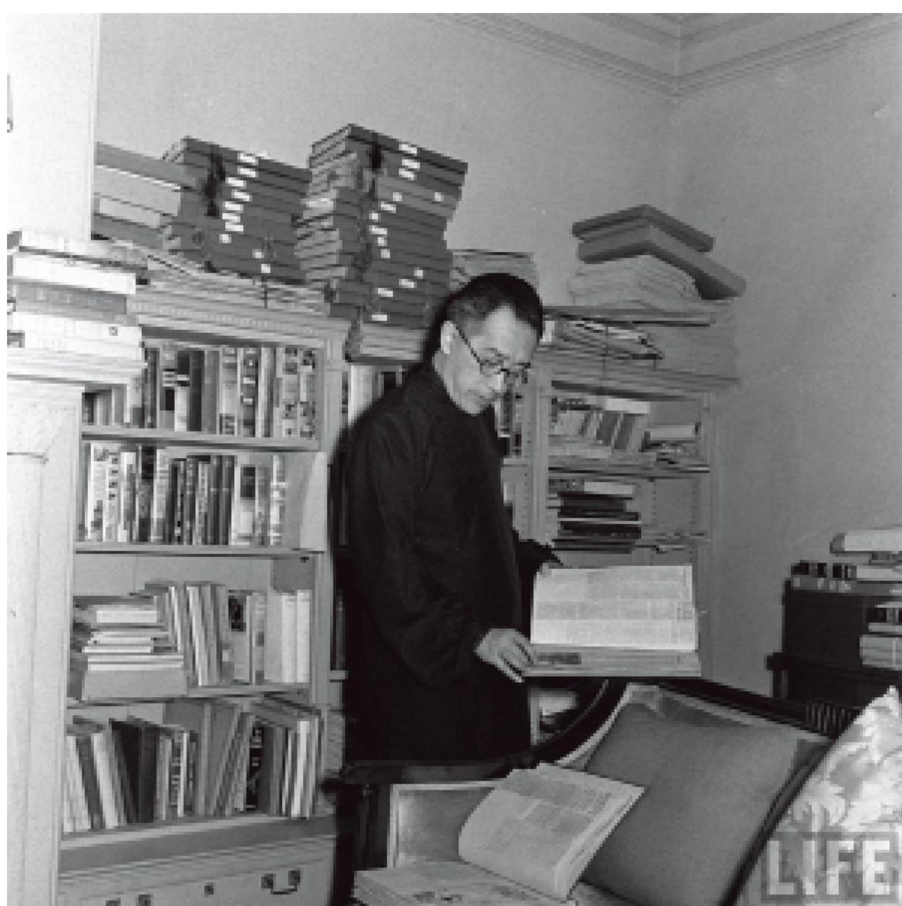
汉武帝之后，所谓独尊儒术，其实是用儒家学说代替了老子之学，而法家刑名之学仍是治国方略的组成部分。也就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鲁迅母亲与日本儿媳

鲁瑞与二儿子周作人关系不好。她说：“羽太信子是日本人,老二让着点可以,但过分迁就了。”信子到了北平,做了当家主妇,什么事都得听她的,闹得全家不得安宁。后来信子将家人也接到八道湾同住,生活日本化,买东西只去日本商店。“九一八事变”后,羽太信子不仅把“周宅”门牌摘下,换上“羽太寓”三个字,还挂起了日本国旗。鲁瑞见周作人对此心安理得，不由叹道:“八道湾里只有一个中国人了。”

鲁迅逝世的消息传来,鲁瑞对人说:“得知老大已经过世,我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悲痛到极点……我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老二说:‘我苦哉!我苦哉!……’老二实在不会说话,在这种场合,他应该说：‘大哥不幸去世,今后家里一切事,理应由我承担,请母亲放心。’这样说既安慰了我,又表明了他的责任。”鲁瑞气愤地说:“难道他说苦哉苦哉,就能摆脱他养活我的责任吗?”

胡适如何评价毛泽东诗词



胡适

1958年，历史学者何炳棣将毛泽东的两首《沁园春》译成英文发表。胡适看到后，批评说:“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不无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中国文学史的班呢!”“毛的那两首词里的有些句子，还不配称为‘薛蟠体’呢。”何炳棣回击道，毛词在修辞、气魄、意境方面都不无可取之处。两人为此争执了起来，最后胡适只好承认，毛泽东“是一个有力的散文作家”。何炳棣不肯罢休：“既然中国20世纪文艺复兴之父都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他怎么会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诗人呢?”言罢，两人不禁哈哈大笑。

一年后，胡适又看到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在日记中说，“看见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叶。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

七天时间建起一座大学



1958年，河南遂平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该公社的红专综合大学是当年教育革命的典型模范。

1958年是中国高校“大跃进”的一年。刘少奇在给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指示中说：“县办大学，将来势必每个县有一所大学，准备十年达到这个目的。”仅仅一年的时间，全国高等学校的数量从1957年的200多所上升到1000余所，新办高等学校800余所，在校学生人数比1957年增加三分之二。

比如黑龙江的鹤岗大学，只用七天就办了起来。大学由市委书记处一名书记任校长兼党委书记，6个系主任由有关单位的负责人担任，如文教局长担任文学系主任。两天之内腾出市第二招待所作校舍，桌椅板凳则由各机关、厂矿企业支援。学校一般教师采取“大学生教大学生”“专职教员和兼职教员”的办法解决，专业课教师则由医生、工程师、化验员等担任。在办大学的过程中，除了制作校牌时花了一元七角钱外，其他一分钱也没有花。

革命小说也被打成“反党”



马识途

1962年，马识途到北京去看望老领导钱瑛。钱瑛一见面就问：“你写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出版了没有？”马识途说，还在等最后定稿。“还好，还没有付印，你千万不要拿去出版了。”钱瑛解释说，“可不得了呀。康生告发了习仲勋，说他支持一个作家写的《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一下就挖出一个西北反党集团。康生说‘以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本是康生说的，由于毛主席同意康生的话，就说成是毛主席的话，要普查反党小说，可紧张了。”

马识途不解地说：“我写的是革命小说，你是清楚的呀。”钱瑛道：“那个作家写的《刘志丹》也是革命小说呀，哪个不知道刘志丹是革

命英雄？结果说是习仲勋反党集团支持写的反党小说，把一大批西北地区的老同志都网进反党集团里去了。没有人敢说话。”钱瑛最后警告说：“看来写小说很危险，写革命小说一样危险，所以青年出版社为我出版的《俘虏的生还》刚印出来，我回北京马上就叫出版社全部销毁。”

直到1966年，马识途的《清江壮歌》才终于出版。不久，文革爆发，这本小说又被作为“大毒草”进行了批判。马识途本人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坐了六年半的牢。

妹尾河童的妻子与女朋友

妹尾河童是日本著名舞台设计家，他和茂子婚后的第五年，开始采用契约式婚姻，规定每年结婚纪念日那天，双方要确认是否再过一年，如果要继续的话，河童会对茂子说：“往后一年拜托了。”茂子则回答：“那我也拜托你了。”一旦一方表示不想继续，那么他们的婚姻就宣告结束。

这场婚姻能够维系的关键，是茂子的宽容。妹尾河童在婚后依旧不断交女朋友，但从不对妻子隐瞒，有时和别的女孩子约会，还会打电话回家：“今晚我不回来了，在她家过夜。”第二天，河童到家后，会不好意思地对茂子说：“你辛苦了！”茂子会回答：“你更辛苦了！”当河童将女朋友们带到家里来时，茂子甚至会为她们下厨。

河童同样珍惜与茂子的婚姻，他常常对自己的女朋友说，“你不可能代替茂子的位置的。”

作者：赵新宇 王戡 陈祥 启风 巫解 柳展雄 班布尔汗 杨津涛　编辑：段宇宏 陈祥

更多精彩文章详见： 亚马逊传送门 或 微页面传送门